

北伐名将
抗日功臣

黄琪翔将军传

孙炜
著

目 录

序·刘晓峰·····	005
第一章 梅江上游的小山村·····	010
第二章 军校岁月·····	019
一、少年军人·····	020
二、成名之战·····	032
第三章 北伐战争的先锋·····	042
一、先头部队·····	043
二、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	053
三、攻克武昌城·····	063
第四章 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	076
一、北伐河南·····	077
二、八一南昌起义·····	087
三、主政广州·····	097
四、张黄事变·····	107
五、广州起义·····	120

第五章 追随邓演达和福建事变	134
一、孙中山的奉安大典	135
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诞生	145
三、营救邓演达	153
四、一见钟情郭秀仪	161
五、“临委会”总负责人	169
六、福建事变	177
七、将军的新婚	191
第六章 抗日战争中的黄琪翔	206
一、南京的邀请	207
二、淞沪会战	217
三、军委会政治部	237
四、军训部次长	252
五、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264
六、宋美龄与郭秀仪	279
七、枣宜会战前夕	290
八、枣宜会战	303
九、在第六战区的日子	322
十、中国远征军	334
十一、滇西大反攻	354
第七章 坚决不打内战	374
一、参与解决边疆问题	375
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383
三、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	394
四、回国述职	411
五、迎接新中国	427

第八章 参加新中国建设·····	440
一、开国大典·····	441
二、北京的初春·····	449
三、重返农工党中央·····	458
四、黄琪翔夫妇与齐白石的交往·····	472
五、慰问西藏·····	487
六、国家体委副主任·····	499
七、整风运动·····	512
八、著名的“右派分子”·····	520
九、天安门观礼·····	532
十、李宗仁归来·····	542
第九章 文革中含冤辞世·····	554
一、文革风暴·····	555
二、魂兮归去·····	574
第十章 百年余辉·····	582
一、为黄琪翔平反昭雪·····	583
二、郭秀仪为两岸和平大业奔波·····	590
三、郭秀仪的晚年·····	593
四、百年余辉·····	596
后记·黄向明·····	599

序

新版《黄琪翔将军传》书稿送给我，仔细阅读后，感到本书要比旧版的《黄琪翔传》脉络更清晰，史料更详实，内容情节细腻，受知匪浅。同时也深深地感到，寻求历史人物的真相，摸清历史事件的本源，保存历史发展的真迹，对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明年是黄琪翔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此书的出版也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读新版《黄琪翔将军传》，使我对黄琪翔先生一生经历有了新的了解，对他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精神有了新的认识，对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有了新的评价。黄琪翔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英杰，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是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诤友。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站在时代的前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其一生的经历，诠释了理想、信念、事业、权利、爱情、奉献等在人生坐标中的位置，体现了一位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所展现出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激励我们后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沉着勇敢、发奋进取。

黄琪翔先生，字御行，1898年9月2日生于广东省梅县水车

圩一个农民家庭。因祖先世代务农，迫于生计，其父远赴南洋做小本生意，借获微利以维持家小生活。黄琪翔自幼聪慧过人，深得族叔的厚爱和器重，一直资助入学读书。他童年时在村塾就读，1910年在梅县务本中学读书，其后到广州进优级师范附中求学。他勤奋好学，经常抒发定国安邦的宏图大略，族叔每每听到后，都十分高兴，料定日后必成大器。1912年黄琪翔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其先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役学校，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在学习期间，他刻苦专研，成绩优异，为师友所期许。正可谓：天资聪颖，少年立志报国。

黄琪翔先生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1922年辞去保定军校分队长职务，回到广东参加革命。在东征、南征中，他屡建军功，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在北伐战争中，率部克平江，取汀泗桥，下贺胜桥，直捣武昌，一路势如破竹，战功卓著，为北伐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誉，得以从团长升为师长，被誉为常胜将军，显示了革命军队的锐气，谱写了国共合作战无不胜的历史篇章。“二次北伐”黄琪翔先生擢升为第四军军长。据他自己回忆说：“在北伐战争中，我和共产党员的关系是好的，和叶挺的独立团也是完全能够合作的。通过同共产党员共事合作，在政治上接受了启蒙教育，开始懂得打仗和政治的关系，看到了共产党员在军队里所起的作用。”初步奠定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基础。正可谓：北伐名将，战功赫志向明。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摆在仁人志士面前。黄琪翔先生在德国与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相会，回顾大革命历程，有所领悟，对邓演达的革命主张完全赞同。1930年8月，邓演达先生在上海举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推翻南京独裁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黄琪翔先生力予赞助，并参加会议，担任干事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委员，成为我党的创党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邓演达先生被害后，黄琪翔先生身负艰危主持党务，支持淞沪抗战和察哈尔抗战，带领同

志组织参与福建事变，主张反蒋、联共、抗日，被选为福建人民政府委员。闽变失败，他流亡德国，积极参加进步组织，开展反蒋抗日活动，曾遭到德国法西斯当局的拘捕。1935年，他拥护中共的《八一宣言》，力主联共抗日。他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同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选举黄琪翔先生为总书记，宣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思想武器，以反蒋联共抗日为党的总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农工民主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历程。正可谓：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黄琪翔先生先后任第九和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参加指挥“八·一三”淞沪会战，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1938年1月，经组织同意，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同周恩来副部长合作共事，扩大团结抗战的影响，被国民党右派所不容，同年7月被调任为军训部次长。此后，他历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他以司令部为家，延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转战各地，屡建功勋，大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在徐州会战中，黄琪翔参与作战方针的拟定工作，为台儿庄大捷起到了谋略上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枣宜会战中，他沉着指挥，英勇杀敌；在被迫弃守枣阳时，他满腔悲情，在黑板上挥泪书写下了“还我河山”四个坚挺大字；他在张自忠追悼会上致词时屡次哽咽不能成声，泪流满面，悲痛心情，实出肺腑，与会官兵，尽皆感泣；在调离襄樊之日，群众挥泪告别，依依不舍的情景，在国民党统治区，是罕有的现象。黄琪翔曾说：“作为一个军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绝无保留地贡献出一切，是天经地义的。”正可谓：抗日杀敌，立马驰骋疆场。

黄琪翔先生和郭秀仪女士于1934年7月在德国结婚。从此夫妻二人虽历经了千辛万苦，但守得住恩爱，至死不渝，留下隽永记忆。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召开成立

大会。郭秀仪女士作为发起人之一与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17人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担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征募部副部长。为了筹集资金，郭秀仪到处奔走，积极组织参与募捐和宣传活动，并主持了汉口的献金台，亲自到街头宣传募捐。她经募了现款20986元，募捐总数仅次于宋美龄，她个人认捐资助难童442人。她和数千名中国妇女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拯救、收容和培育了战争难童3万余名，为了民族和祖国的未来，为抢救和培养下一代呕心沥血，用实际行动谱写了妇女爱国运动的光辉篇章。也因此成为3万多名保育生的妈妈。抗战期间，黄琪翔先生转战南北，多在前线指挥作战，她亦以战场为家，随同工作，不避危险，组成战地服务队，救死扶伤，鼓舞士气，安定民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黄琪翔先生和夫人郭秀仪因在抗战中的表现，双双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黄琪翔并获授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最高奖章总统自由勋章。正可谓：夫妻恩爱，比翼共展齐飞。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琪翔先生日益看清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真面目，不忍外患甫除，又同室操戈，为避免同共产党作战，曾公开声明：“从此退伍，绝不参加内战”。后在国内和平无望，内战即将爆发之际，他出任驻德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以此回避内战。1948年10月，黄琪翔回国述职，面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他认为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民心丧尽，以成败局，即拼死挣扎，也只能延长战祸，使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中。在中国人民决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他拒绝出任国民党战略顾问，毅然出走，化装潜往香港，公开宣布同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与在香港的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积极从事迎接全国解放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召开新政协的活动。1949年8月，黄琪翔先生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来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新中国的建立。正可谓：反对内战，走向光明道路。

回首革命战争年代所走过的道路，黄琪翔感慨万千，正如他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中所指出的：“20

多年来，我在政治圈里摸索着。我有时鼓舞，也有时彷徨。革命的发展，是那样的错综和复杂，要看得清楚，把握得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现在，我深深相信，在毛泽东旗帜之下，中国是确定的走上了光明伟大的前程了。”正可谓：追求进步，不辞千辛万苦。

建国以后，黄琪翔先生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参加政治协商和国是讨论，以实际行动拥护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为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为新中国的司法和体育事业，付出了辛勤劳动。1957年黄琪翔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受了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但他从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从没有动摇对长期合作共事的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和爱戴。正可谓：肝胆相照，荣辱真情以对。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黄琪翔先生的一生，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帝爱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他为人正直豁达，光明磊落，谦虚谨慎，温文尔雅，识大体，顾大局。他的思想品格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黄琪翔先生等老一辈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进入新时代，践行新思想、锚定新目标，开启新征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刘明峰
2024年12月8日

第一章

梅江上游的小山村

黄琪翔于1898年9月2日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名叫水车镇木莲塘的小山村。此时为清光绪二十四年，即夏历戊戌年七月十七日。

这一年，光绪皇帝刚刚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改革决心，也就是“百日维新”的开始。可是，这场试图挽救大清王朝命运的变法，自不待言地遭遇到慈禧太后的镇压，连光绪帝本人都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变法遂告失败。百日维新的骨干分子“戊戌六君子”，即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均被押赴位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问斩。大清帝国最后一线变革的曙光就此被扑灭，大地依旧一片黑暗。

谭嗣同（1865—1898）临死之前，在监狱的墙壁上挥笔写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此豪迈看待死生，他似乎已经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精神召唤，坚信改朝换代的日子已经不远。

这一年，与黄琪翔同年出生者，有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陈诚、高树勋、郑振铎、朱自清……他们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就是因其生逢乱世。历史不仅赐予了他们奋斗的特殊空间，也因为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而作下了难以篡改的历史注脚。

黄琪翔也是如此。

黄琪翔出生于这个黑暗血腥的年代。他的家乡那时是一处穷乡僻壤，距离帝都北京十分遥远。人们无法保证自己和家人一日三餐能够填饱肚子，为了摆脱穷苦命运，父老乡亲已经习惯了背井离乡去闯荡世界。

广东梅县，现已改名为梅州市，¹是我国著名的华侨之乡，也是客家人聚居地之一。

客家人的祖先本是中国内地的中原人，在遥远的古代就移居来此，最迟在南宋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客家族群。客家语是当地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人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普通家庭生育的子女常常超过十位，而这里的地质构造比较复杂，主要是花岗岩、喷出岩、变质岩、砂页岩、红色岩和灰岩等六大岩石，构成了台地、丘陵、山地、阶地和平原五大类地貌，所以人多地少的现实，使得生活在农耕社会里的人们养家糊口极为艰难。于是，人们竞相走出贫瘠山区，漂洋过海，奔向全世界各个角落去谋生。

黄琪翔的家族世代生活在这里，艰难度日。黄琪翔出生的具体地点是在梅县水车墟木莲塘的一间平房老屋。

黄琪翔的父亲黄富霖（1870—1926年之前），很小的时候就学做生意，跟着大人跑南洋，做些小买卖。他主要涉足的地方是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因为小买卖谋生不易，后来改做“水客”营生，就是替那些远去南洋谋生的同乡带信、捎钱，或捎带物品，然后收取些许报酬。当然，这样的收入仍然不能致富。黄家所有的财产只有“旧屋二间，尝田五担，折合一亩余”。²

母亲刘桂五（1881—1965），是梅县畚坑大湖洋村人，却出生在广西。原因是她的父亲刘应华公是诸生（秀才），曾经在桂

1 梅县的历史久远。早在南朝齐（479—502）即从海阳县分出部分地方置程乡县，辖境包括今梅县区。北宋开宝四年（971）为避赵匡胤祖父之讳，取梅江之名而称为梅州。2013年10月，国务院同意梅州市梅县撤县设区，从此，梅县结束了县治，改设梅县区，为梅州市辖区。

2 1928年广东民政厅《公报》创刊号。



1898年9月2日，黄琪翔出生于广东省梅县水车木莲塘村的这间老屋。

林任县丞，也就是替知县打杂的底层官员，母亲是随眷。刘桂五出生在桂林，在家排行第五，故取名“桂五”。在刘桂五4岁的时候，父亲客死异乡，刘桂五就随着母亲回到了故乡。¹

刘桂五小时候缠足。由于父亲去世，她随母亲回故乡后，少了束缚，去掉了缠足布，成了“自由”脚。这对刘桂五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客家人的习惯是男主外，女人在家操持家务，还要下田种地，缠了小脚如何干农活呢？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5岁的刘桂五嫁入黄家。两年后黄琪翔出生，他成为家中的长子。母亲刘桂五一辈子生育了10个儿女，²但是很不幸，黄琪翔的两个弟弟早年夭折，五个妹妹很小就去做了人家的童养媳。到了母亲刘桂五晚年，只有黄琪翔和妹妹黄月英、黄景新3人仍健在。

客家人十分重视养育儿子，无论家境多么贫困也不会把儿子送人。而那些呱呱坠地的女孩就没有这么幸运。据黄琪翔最小的

1 黄琪翔的表弟刘凌云说：“早年先祖父在桂林为官，姑妈（刘桂五）出生于任所，排行第五，故取名‘桂五’。”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9月版《流金岁月》，p205。刘凌云文章《永远的琪表哥琪表嫂》。”

2 王大鲁、刘青云著《黄琪翔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p1。



黄琪翔的父亲黄富霖与母亲刘桂五合影。

妹妹黄景新回忆说：家里女孩多男孩少，几个姐姐叫秀兰、玉兰、聚兰。兰字与“拦”谐音，就是希望将女孩拦住，多生育男孩。黄景新小时候也曾被送出去做人家的童养媳，但她的命“硬”，几次送出去都因八字不合而作罢。黄景新最终没去做童养媳，是因为大哥黄琪翔从军校毕业，开始了军旅生涯。黄家的生活水平随之有所提高。黄琪翔对父母表示：这个小妹不要再送人了，要接她出去读书，从此改变了这个最小妹妹的命运。黄景新后来与国民党二级上将张发奎的胞弟张勇斌医生结为连理，生育了6个子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年近百岁的黄景新至今记得小时候的事。她说：三伯父黄兴霖做米粉生意，常常会留些米粉给她吃。因为家里穷，她感觉这些米粉非常美味。

黄琪翔在1937年写下《母亲为国人祝福》，文中说：“在大家庭中，我的母亲辈次最低，年纪最小，吃的是稀饭和白薯，穿的是又破又烂的衣服。她得刻苦的工作着，从来没有懈怠过，

也没有任何怨言和不满。她好像下意识地认识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似的，笑容永远充满在她的脸上，得到一家大小的爱护和同情。她希望我能够读书成名，将来过个好日子。”¹

读书成名，不光是母亲对黄琪翔的期望，也是父亲黄富霖对儿子的企盼。黄富霖之所以没让儿子走自己的老路，因为他深知无论闯南洋做生意还是做水客，都是一条太过艰辛的道路，甚至有性命之忧。他希望自己的独子，能够沿袭着千百年来的传统道路，读书致仕，走科举之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因为在黄琪翔开蒙之际，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没有消亡。清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取消科举考试，那时黄琪翔已7岁。

黄琪翔的童年曾在村塾读书。黄氏宗族在当地人口众多，有祭奠祖先的祠堂。孩子们到了五六岁就可以去祠堂读书识字，只需给村塾先生缴纳微薄的束脩。开蒙教材是《三字经》，然后是《论语》、《孟子》之类的旧学。

13岁的黄琪翔第一次离家，前往七十余里之外的梅县私立务本学堂上学。这次离家求学，仰赖于族伯父黄锡铨先生的推举。黄锡铨是中国现代史中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梅县私立务本学堂的创办人之一。梅县私立务本学堂就是如今著名的梅州东山中学前身。黄锡铨在当时是家乡最为广闻博识的学者、教育家和思想家，方圆百里的乡亲都非常敬仰他。黄琪翔早年入学读书的费用，就是黄锡铨赞助的。黄锡铨女儿黄甘英说：“我父亲黄锡铨资助他入学读书”，“有一段时期（黄琪翔）一直住在我家就读。”²

黄锡铨（1852—1925），字钧选，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大立乡茶山村人。清同治十年（1871年），黄锡铨以品学俱优举为贡生，居乡执教。光绪六年（1880年），黄锡铨29岁，应邻

1 香港中国文化馆2003年出版、魏中天主编《我的母亲》丛书第九辑，p5，黄琪翔文章《母亲为国人祝福》。

2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18，黄甘英文章《怀念兄长黄琪翔》。

乡大埔县何如璋（时为清朝驻日本公使）之聘，前往驻日公署主事文案。在日本两年有余。时驻日大使黄遵宪（1848—1905）编修《日本志》，黄锡铨是其得力助手，协助黄遵宪完成了这部名著。

光绪八年（1882年），清廷派黄锡铨驻美国旧金山任总领事署副领事，随后调往纽约任正领事，黄锡铨时年34岁。光绪十二年（1886年），黄锡铨被调往中美洲秘鲁任二等参赞代办公使事。光绪廿八年（1908年）冬，柯逢时（1845—1912）奉调广西巡抚，因知黄锡铨著有兴山利说，故携与俱往。甫抵广西，即命黄锡铨改办统税局，管理梧州税务。后因柯逢时与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和，相互揭发对方而同时丢官。黄锡铨留任，主办外交、实业、洋务、农工商矿诸事，继任的诸巡抚对他信任有加，视其如左右手。入民国后，黄锡铨当选为广东总督署参事会议绅，在广州就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月初七，黄锡铨卒于北京寓所，享年74岁¹。黄锡铨的祖屋“资政第”，位于梅县水车镇灯塔村叶子坑6号，是当地有名的建筑，至今保存完好。

黄琪翔来到务本学堂读书时，正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清皇朝被推翻，广东的新军反正，举国欢腾。当时的人们思想比较混乱，认为满清政府是鞑虏，专门欺压中国人，所以庆幸满清政府垮台，但还有一些人则取笑孙中山是“孙大炮”，说他梦想成立的中华民国是在吹牛。而更多人听说了汪精卫谋刺宣统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事迹，认为汪精卫是盖世英雄，都非常佩服他。

剪辫子是当时最受人瞩目的时髦之举。你革命不革命，首先看你的脑袋。如果你后脑壳上还拖着一条辫子的话，说明你还是顶着一颗封建的脑瓜子。黄琪翔回忆说：“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才十三岁，拖着旧社会留下来的短小辫子在梅县县城的中学读书。革命的风潮把我那条清朝政府作为统治中国人民象征的绳索剪掉

1 黄锡铨的女儿黄甘英（1921—），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第四、第五届副主席。黄甘英是黄琪翔的堂妹。

了。我心里觉得十分难受。”¹

当黄琪翔从县城回到乡下去探望父母时，父亲黄富霖更是十分恼怒和失望。黄富霖伸出颤抖的手指，训斥儿子道：“你居然敢剪掉了辫子，以后就没有做官的希望了！”父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晚清时，大凡剪掉辫子的人都是革命党，为反抗清朝的封建统治而进行革命暴动和暗杀，被逮捕的话，肯定是要被杀头的，更别提去做清朝的官员了。黄琪翔信奉父亲的教导，他说：“我自己也觉得确实是个损失。”²这说明黄琪翔在辛亥革命之际，与他父亲的旧观念一样，并没有接受到革命的新思想。不过，剪掉辫子之后，他并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还获得了一种新鲜的体验：脑袋不仅轻松了许多，最大的好处是头发里再不会生虱子。

一年后，黄琪翔考入广州优级师范学校附中。黄琪翔回忆：“次年，我到广州，进了当时的优级师范学校的附中。初以为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或者升学，或者回到乡下当一名小学教员，也就不错。因为我觉得当个教员，究竟要比劳动人民的生活好些，也免得受耕田种地之苦。”³在黄琪翔后脚跟刚离开务本学堂，而叶剑英的前脚就跨进了这所学堂的大门。叶剑英当时的名字叫叶宜伟。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912年）的春天。

进入广州优级师范学校附中后不久，族伯父黄锡铨回到了故乡，见到黄琪翔，跟他畅谈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而且，他还热情鼓励黄琪翔去报考广东陆军小学。

黄锡铨阅历丰富，视野开广，又熟谙政治。他对这位晚生说：“天下大乱，必将走向大治。中国老百姓要想安居乐业，需要建立强大的政府，而这需要有忠诚于革命的强大军队作保障！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能出人头地。”

1 黄琪翔《我的自述》。这份材料是黄琪翔本人于1969年6月8日至6月28日间亲笔撰写的回忆文稿，由其后人珍藏。作者在写作此书时获其后人允许摘抄。特此注明。下同。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黄琪翔《我的自述》。

黄琪翔非常敬仰这位族伯父，于是听从了黄锡銓的建议，决定去报考广东陆军小学。广东陆军小学校址在广州的黄埔。

黄琪翔辞别了父母，然后踏上前往广州的泥泞山路。清清的梅江水波浪翻涌，自上而下奔流不息。而黄琪翔的家乡位于梅江的上游，所以他前往军校的身姿正好背对着他的家乡、他的父母双亲。

在那个旧时代，社会上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被迫去当兵，混饭吃。然而黄琪翔投笔从戎，却是满怀着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梦想。

第二章 军校岁月

一、少年军人

广东陆军小学，原名广东陆军小学堂，也就是在这一年（1912年），改名叫“小学校”。别看它是一座小学，确实大名鼎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开办，地址位于广州黄埔平岗乡武备学堂的旧址。招生的要求比较高，必须要高小毕业生，或初中一年级学生。学生进入学校后，学期为3年。民国年间许多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均出自这个学校。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民国元年，学校由广东省政府接办，学生的待遇依旧优越，诸如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制服费等，一概全免费，每个学生每月还有两块钱的零花钱。校长是翁式亮先生（1880—1938）。他是老同盟会会员，后来一度追随陈炯明，脱离了孙中山的指挥。学校的其他教员也全是广东人。

黄琪翔跑到招生点一看，有点吃惊。他没有料到报考陆军小学的人居然会这么多，共有3000人，而录取者仅120人，说明入学考试的竞争压力很大。考试的内容分为三场：第一场是体能测试；第二、三场是笔试。第三场笔试写议论文，题目叫《吴起为将与士卒同甘苦论》。

为了均衡学生的来源，学校还规定了每个县考生的录取名额。据张发奎回忆说：该校“明文规定每个县可录取1人，大县倘若有人录取，名额可增至2人。始兴县有30多人报名，可是南雄

县报名人数很少。始兴县的同乡便希望我以南雄县籍报考，使他们减少阻力。可是我拒绝了。”¹ 控制学生来源的做法，似乎是为了防止同乡学生们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

前去考试的时候，黄琪翔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说：“如果能考上，就可以免费读书，并一直到军官学校毕业，就可以派到军队里做带兵官。我抱着莫大的希望去应考，结果竟被选上了。这是我作为军人的开始，也是我一生命运的开始。”²

学生入校后，学校按照年龄依次分班，16岁的学生分为一个班；15岁的被分在另外一个班，他们被统称为第六期学生。³ 依照学校的规定，学习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外文、算术、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气象学、生理卫生学、图画、音乐、国语、野外要务等。每期学生须学一门外语（日、英、德）。术科有徒手教练、持枪教练、单兵教练、班排队教练、野外演习、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刺杀、剑术、射击等。他们的同学中还有一位是朝鲜人。

据《广东陆军小学第六期生同学录》⁴ 载，16岁的班级有37位同学，教职员是翁式亮、陈国伦、陈樾和江庆祥四人，学生有张发奎、黄其祥、薛仰岳、叶挺、吴奇伟、缪培南、陈芝馨、李振球、邓龙光、李汉魂、简作桢、陈公侠、朱晖日、韩汉英、林挺华、罗梓材、炼凤韶、李江、陈克华、罗策群、温克刚、林湘、谭在汉、梁殿枢、叶显、王超、邓挥、刘尚霖、冯秉权、侯文俊、赵成欣、丘兆琛、陈勉吾、曾泽寰等，他们学的外语是德语；15岁的班级有余汉谋、黄镇球、叶肇、张达、徐景唐和华振中等，他们学的是日语。

学校对学生的年龄以及姓名审查得并不严格，比如黄琪翔，当时才14周岁，虚岁也才15岁，也被编入16岁的德语班。再

021

1 《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p006。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据杨资元、冯永宁著《邓演达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p9。张发奎、叶挺、薛岳为第七期学生，黄琪翔也应是第七期。但民国十八年版《广东陆军小学第六期同学录》刊录他们是第六期学生，从此说。

4 民国十八年版《广东陆军小学第六期生同学录》，清风桥文茂印务局承刊，p23。

比如张发奎，他的本名叫“张发葵”，入学前曾在粤军模范团当副班长，没能及时请假去学校报到注册，就叫亲戚华岳高帮忙代办，结果注册官把他的名字写成了“张发奎”，与原名有一字之差。

黄琪翔入学的名字叫“黄其祥”。张发奎后来说：“黄琪翔的姓名同现在相比，音同字不同。”薛岳的名字当时叫薛仰岳，后来他在广州法租界被捕，警察登记姓名时他故意漏了“仰”字，于是就成为了今天的这个名字。

第六期学生兵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由学校直接来投考军校，其中只有五六位同学当时已是军人，是穿着军装来报到的。虽然年纪一样大，他们感觉自己像老资格，高人一等，神气活现。他们是张发奎、薛岳、高汉宗、方颐与谭在汉等。

黄琪翔说：“我进入陆军小学以后，受的是相当于普通中学课程的教育，加上军事训练，以及（学习）所谓爱国思想的精神、讲话等等。学校的生活待遇，比我过去的生活大大提高，吃的是每顿四菜一汤，穿的有呢料、布料（制服），都是按各人量身、精工定做的。这个学校，实质上是贵族学校。这个制度也是从清朝政府时代原班接受下来的。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着培养它的接班人而设置的。”¹

军事科目的训练，主要是操练，还有使用来福枪学习射击。军事理论的学习则是读《孙子兵法》。管理还是很严格，学生犯下轻微的错误，就要被记过，三个小过积累成一个大过，三个大过会被开除或者关禁闭。有些不守规矩的学生要在课堂里罚站一个小时，或者背负全部装备在操场上罚站3个小时。

黄琪翔去读陆军小学时，年纪太小，父母不放心，于是父亲黄富霖独自跑到广州去探望。当时家里很穷，黄富霖平时舍不得花钱，也很爱惜衣物。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后来听婆婆刘桂五回忆说：父亲黄富霖去看望儿子，连鞋都不舍得穿，把一双布鞋夹在胳膊里一路走到广州，直到学校大门口才把鞋子穿上，然后再去见儿子。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民国三年（1914年），黄琪翔结束了陆军小学生活，顺利毕业，然后全班被转送至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学习。这个学校也被称为湖北第三陆军中学。¹他们这届学生毕业后，广东陆军小学随即停办。第六期学生与第四、第五期学生一起转到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读书，邓演达就在其中。

邓演达（1895—1931）是第四期学生，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1911年毕业。到了武昌后他才与黄琪翔和张发奎等相识，然后成为好朋友。邓演达是一位极富激情的青年，政治素养出色，许多人都仰慕他的人品和学问。黄琪翔比邓演达小3岁，后来成为邓演达坚定的追随者和得力副手。他们的友情就肇始于此时。

黄琪翔从小到大一直是在军校里度过的，是公认的优秀学生。他平时举止中规中矩，完全按照军校的规定去学习和生活，而且他“聪颖过人，学习成绩优异，为师友所期许”²。但张发奎、薛岳等人与黄琪翔不一样，他们在读军校之前就混过社会，阅历



1912年至1914年间，广东陆军小学部分同学张发奎（前排右一）、许志锐（后排左二）等合影。

1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册“黄琪翔”条，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p447。

2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册“黄琪翔”条，p447。

多一点，思想也活跃。在国民党人苏璋接替了翁式亮成为陆军小学校长之后，张发奎、薛岳等人就加入了国民党。他们都想着尽早去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于是抽签决定谁先去参加革命，薛岳中签。薛岳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张发奎与黄琪翔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期间，俩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的心得。那时候他们知道了拿破仑，非常敬佩他，于是背诵了拿破仑许多关于军事的箴言。

黄琪翔对拿破仑说的话奉为圭臬。拿破仑说：“战争的第一、第二、第三项需要的都是金钱。”黄琪翔举一反三地说：“如果没有金钱，我们就不会来读军校，不能够掌握军事知识；如果没有金钱，部队就招不到兵；如果没有金钱，部队就没有枪支弹药，就没有战争所必须的这些军用物资和士兵，就没有办法去革命，去消灭军阀。”

张发奎信奉拿破仑的另一句话。拿破仑说：“胜利取决于最后五分钟的坚持。”张发奎说：“敌我双方作战主要是靠人的意志。我们能够读军校，敌人也可以读军校；我们有枪炮，敌人也拥有枪炮。真正战争的输赢，取决于军人的意志。是比谁的意志更坚定，毅力更顽强，最后的胜利就属于他们。”

他们的争论没有胜负，可是他们各自所坚持的军事理念却在以后的岁月里得到了应验，如同一语成谶。黄琪翔在抗日战争中，曾是陈诚的副手，在第六战区主管粮食转运和保障工作，尤其是在1945年3月，黄琪翔改任中印公路警备司令部司令期间，负责战争物资、输油管道以及边疆事务的管理，均有出色的表现。而张发奎的大部分时间，则作为主将冲杀在战争的前线。

民国五年（1916年），黄琪翔从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然后保送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校址在河北保定市，前身为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保定陆军军校的教学条件极优，实弹射击有打靶场，骑马训练有马场，炮兵训练有炮场，工兵则有土木作业场、

架桥作业场，连爆破演习都有安全的场所。黄琪翔的专业是炮兵科，使用教学的大炮，主要由日本或德国制造。他对德国的军用枪炮特别有好感，因为德国制造的军械，在当时属于世界上最先进的军火。

民国八年(1919年)，黄琪翔从保定军校顺利毕业，完成了他七年一贯制的校园军事教育和训练。



1919年黄琪翔的保定军校毕业照。

黄琪翔早年并不关心政治。他说“‘食其禄，忠其事’，就是我脑子里的‘指导思想’”¹，所以一门心思放在学习军事理论和技能训练上。他渴望自己有“业绩”，将来成为一名优秀军事将领，因为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人不是一个好士兵。”他钦佩拿破仑。黄琪翔在自己撰写的生平中说：“在漫长的七年岁月里，是中国和世界大局激烈变化的时代，其间，国内（发生了）以反（对）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斗争，‘五四远动’；国际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的十月革命。但这些大事，我对它（们）都无认识。我专心一致（志）。 ”²他就是想要学好过硬的军事本领。

保定军校由北洋政府主办，学生也归北洋军分配。黄琪翔从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军政府下辖的边防军第一师炮兵

1 1956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头条文章，黄琪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启发了我》。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1919年黄琪翔任北洋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第三营中尉排长。

团第三营任中尉排长。第二年，保定军校因缺乏优秀的师资力量，就把黄琪翔从部队里调了回来，担任学生分队长，后来成为队长。黄琪翔回忆说：“我认为人活在世上总应该好好地做一点事情，为了自己，也为了家庭，应该干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业绩’。至于究竟做什么事情才有意义以及为谁做事情，我都没有考虑过。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参加了段祺瑞的‘边防军’，不久，又回到保定军官学校任教职。”¹

就在黄琪翔返回保定军校担任炮兵分队长的那一年，遇见了浙江处州府青田县人陈诚（1898—1965）。

陈诚之所以能够读保定军校，得益于乡贤杜志远先生的举荐。杜志远原名杜特，是陈诚父亲陈希文的同科秀才。杜志远的儿子杜伟回忆说：“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老朋友，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念他年纪还轻，便把他带往北京，报送投考保定军官学校。又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我父亲向主考官魏宗翰疏通，总算以备取的名义勉强入学。”魏宗翰是当时的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保定军校主考官。杜伟的回忆存疑，因为陈诚当时已经有了浙江第十一师范、体育专门学校的文凭，而且，陈诚的同乡同学富文也证实，陈诚是保定军校正式录取的

1 1956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头条文章，黄琪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启发了我》。

学生。不过，陈诚从杭州来到北方，确实是跟随杜志远而来。陈诚自己回忆说：他从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后徘徊省城，思再入他校，以求深造，因家庭经济困难，进退维谷。适邑中前辈杜志远先生当选国会议员，北上过杭。余往谒。杜先生为请于先父，挚余同行。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分隶炮科。”陈诚入校的时间是1919年8月8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生一共638人，炮兵科97人，人数仅次于步兵科。

1920年黄琪翔回到保定军校当炮兵科分队长的时候，陈诚就成为了黄琪翔的学生队员。第八期学员中，陈诚、罗卓英和邓鸣汉三人的个头最矮，所以列队时按个头排在队伍的最末位。

陈诚与黄琪翔的交情就是在此期间建立的。陈诚后来常对人说：“黄琪翔是我的老师。”黄琪翔也撰文写道：“陈诚就是那时候在我队里的学生，我和他有所谓师生的关系，因此建立了以后政治、生活中的关系。”¹

黄琪翔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高潮到来，跟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代。这些大事，我在当时也是毫无认识的。直到1922年，北洋军阀政府已面临总崩溃前夜，财政危机严重，到了不能发给保定军校经费的程度，断绝了员工的工资来源，于是我才决心回到广东，参加到当时属于孙中山系统的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充当少校参谋”²，即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少校参谋。³

黄琪翔脱离北洋政府来到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粤军，根本原因是为了摆脱经济拮据的状况，能够赡养自己的母亲。他说：“我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初出来在北方做事，那时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认识，是很模糊的，既没有什么大志，也不懂得应该怎样去做人。我想：不管如何，有了差事，能够寄几个钱给我的母亲，也总算完成了我做儿子的责任。可是，正当北洋军政府没落的前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册“黄琪翔”条，p447。

夜，大人先生们尽管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小职员几十块钱的月薪则连赊带扣，自己生活都维持不了。我不得已回到广东，做了几年事，生活是相当改善了。”¹

按照粤军当时的规定，新兵每月饷银是 10.50 元，列兵是 12 元，下士 14 元，技术军士 20 元，上士 24 元，而黄琪翔是少校，每月的饷银是 160 元。黄琪翔可以拿出一定的饷银寄给家里，以补贴家中的生活。问题是粤军的财政也很紧张，所以尉官要扣下 10%，而校将级军官要扣下 20%，所以黄琪翔每月的薪水实际收入是 128 元。尽管如此，也不是每月都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孙中山曾经为此大伤脑筋，他总在想方设法筹措军饷。

其实，孙中山在民国六年（1917 年）成立大元帅府时，手中并没有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源于旧军阀的馈赠。民国七年（1918 年），当时广东省长朱庆澜被陆荣廷等排挤出局，便将自己的部队 20 个营交给孙中山改编，国民党由此组建了粤军。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孙中山曾说：“只有革命党之奋斗，而无革命军之奋斗，革命不能成功，须成立好革命军，革命事业始能成功。”此言讲明了党指挥枪的道理。

此间，黄琪翔也受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说：“我有机会读到孙中山先生的一些革命的演说和著作，也知道了有关孙先生的一些动人的革命事迹。从这些著作和事迹里，我认识到孙先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终生怀抱着救国救民的志愿。这种崇高的志愿，作为一个年轻的军人的我，当时在思想上才开始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孙先生的革命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的挫折和失败，但在每一次的挫折和失败后，他不仅不灰心，并且更坚强地组织革命力量继续进行革命斗争。”²

孙中山的重要助手邓铿（1886—1922），是一位具有远见卓

1 香港中国文化馆 2003 年出版、魏中天主编《我的母亲》丛书（第九辑），p6，黄琪翔文章《母亲为国人祝福》。

2 1956 年 10 月 31 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头条文章，黄琪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启发了我》。

识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他挑选一批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组建独立排，不久又扩编为连，并亲自加以训练，这就是粤军第一师的萌芽。

民国九年（1920年），在与桂系旧军阀的作战中，邓铿选拔精壮青年八十余人组建督战队，任命张发奎为队长。同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职，邓铿奉命成立大总统府警卫团，陈可钰为团长，李章达为中校团附，邓定远为少校团附。薛岳为第一营营长，叶挺为第二营营长，第三营营长即为张发奎。这三位营长都是黄琪翔的陆小同学。

1922年3月，粤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邓铿被暗杀后，梁鸿楷（1887—1954）接受孙中山任命，正式担任粤军第1师师长，嗣兼广州卫戍副司令。第一师的参谋长是李济深。因此，黄琪翔最初来到粤军第一师师部当少校参谋，他的师长是梁鸿楷。

此时，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北伐，出师广西，以消灭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因政见不合，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6月中旬，陈炯明授意部属叶举炮轰总统府。孙中山旋即命令前线北伐军班师回粤讨贼。

早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之前，张发奎就已经离开了学校，回到粤军。1917年7月，孙中山来到广州，于同年9月10日正式就任大元帅职。张发奎成为孙中山的便衣队队员，其实就是警卫，后来才成为了营长。1922年9月，张发奎时任第一师二团三营（辎重营）营长，随同孙中山也回到了广州。

黄琪翔回忆说：“1922年我回到广州以后不久，在国民党系统中发生了所谓孙（中山）陈（炯明）之争。当时孙中山率兵北伐，军至江西，陈炯明在后方宣布脱离孙中山独立，使孙中山不能不从江西撤退，北伐遂告失败。张发奎原与我在陆军小学时代为同学，他这时在第一师任辎重营长，也随着孙中山回到广州。因张发奎之约，把我从第一师司令部调充他的辎重营（任）副营长。这就是我和张发奎同事的开始，一直到大革命失败以后，我



张发奎

们才告分手。”¹据《第四军纪实》载：1922年9月，张发奎由始兴回归广州，该营被编为第一师辎重营，张发奎为营长，黄琪翔为营副，下辖4个连，由谢秀、袁良、缪培南和苏德燊分任连长，不久后又改编为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的第三营。²

黄琪翔以上的回忆与张发奎所述的内容有所不同。张发奎说：“1922年9月，我带领部众回到了广州。我

这个单位并入辎重营，梁鸿楷任命我接替何迺英出长该营。原任副营长黄琪翔留任，此时他改成现在的名字。”又说，“当我们准备发难陈（炯明）时，我担心黄琪翔不可靠，乃请求梁鸿楷打发他走。我担心黄氏不可靠，一直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他确实是个有才华、有学问、有教养的人，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是一个勇将，但他的私生活却一塌糊涂，耽迷于享乐。我想他可能知道我要他离开，但这不影响我和他的友情。他加入了沈鸿英之子沈荣光（1892—1946）的部队，我委任朱晖日接任三营副营长。”³

事实上，黄琪翔与张发奎的合作，确有一个由相互熟悉到相知信任的过程。毕竟，他俩自1916年分开之后，已有六年的时间，相互之间没有通过音讯。

民国十二年（1923年）四月，张发奎因为清剿沈鸿英的战事而得到晋升，担任第一师独立团团团长，缪培南为团附，朱晖日、苏德燊分任营长。张发奎回忆说：“1923年8月，我团移驻江门。那时沈荣光吃了败仗，黄琪翔失了业，我让黄（琪翔）回来充任副团长。”“很快我病倒了，由于不注意饮食，我得了胃病。在那些日子里，我不碰白兰地，只喝廉价的广东酒。我请病假回广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1949年3月怀远书局《第四军纪实》，p18。

3 《张发奎口述自传》，p034。

州，把团长权柄交黄琪翔暂代。”¹到了8月，独立团归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卓仁机（1890—1972）指挥，奉命讨伐贼军。10月2日，第一旅克河源，17日敌发动三路反攻，19日第一旅左翼失利。张发奎的胞弟张贵斌阵亡，连尸首都没有找到。

张贵斌是张发奎的二弟，早年过继给人家，约在1923年初投奔大哥张发奎参军，此时张贵斌已经结婚成家。不曾想，张贵斌参军没多久就战死沙场。受此打击，张发奎从此以后再也不允许他的兄弟们参军了。

曾是黄琪翔下属的李以勳将军²，对黄琪翔初到粤军时的经历是这样记载的：“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领导国民革命。在整顿粤军中，张发奎是粤军第一师独立团团长，黄老（黄琪翔）应张邀任该团团附。同年夏，参加讨伐沈鸿英的清远战役和围攻肇庆城战役；十一月，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柏塘战役。当时粤局极乱，内有盘踞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部，阳奉阴违，东有陈逆叛军的进犯，南有邓本殷的扰乱。为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急需扫荡叛逆统一粤局。黄老时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陈铭枢）第一团（团长张发奎）第三营营长，参加第一次东征，在攻击兴宁神光山战斗中立下大功。待第一次东征胜利后，东征军在前敌总指挥蒋介石指挥下歼灭滇桂军刘、杨两部于广州。一九二五年七月，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粤军第一师扩充为第四军，张发奎升独立旅旅长，黄老升任第二团团长。”³

以上资料均可证实，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黄琪翔出任粤军第一师独立团的团附，团长是张发奎。黄琪翔和张发奎两位老同学这才终于挽起手来，开始在枪林弹雨中共同浴血奋战。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037。

2 李以勳（1912—2004），广东电白人。毕业于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二期，曾参加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福建事变”任警卫营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团长、副旅长、副师长、代师长。在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等战役中表现不俗，立下战功。抗战胜利后升任121军中将军长。1949年率部在福建起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3 《传记文学》第74卷第一期，p33。李以勳文章《怀念黄琪翔将军及简述闽变经过》。

二、成名之战

诞生于1921年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6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撮合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成为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组成的革命联盟。在这次大会上，选举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共产党员也出现在国民党的军队之中。

也就是在1924年1月，在国民党改组之后，黄琪翔加入了国民党。¹

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北伐战争开始，当时孙中山任命许崇智（1886—1965）为“建国粤军”总司令。10月，改组后的

1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册“黄琪翔”条，p447。

粤军第一旅旅长是陈铭枢（1889—1965），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张发奎，第二团团长蒋光鼐。黄琪翔此时已是第一团第三营的营长。

黄琪翔第三营随同张发奎第一团驻扎在台山、四邑一线。张发奎自述：“我是行伍出身的，打过许多场仗，但都是些糊涂仗，士兵们头脑笨拙，我自己又粗心大意。有时打胜仗，有时打败仗。当团长时，我不注重练兵；战事沉寂时，我沉湎于声色与美酒。简言之，我是专横的，急性子的，染上了各种嗜好。我性情暴躁，活像个军阀。”¹作为张发奎的部下，黄琪翔隐忍的性格使他能够与其顺利相处，并赢得信任。

此时“建国粤军”发动了救平广州商团的作战。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1884—1944），是英国籍的中国商人。他本身是买办阶级，被时人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平时与陈炯明相互勾结，这样就成为了孙中山领导护法政府的潜在敌人。广州商团极为富有，他们有自己的武装，甚至还拥有一批重武器。孙中山借机向商团借武器，但是遭到了拒绝。恰在此时粤军得到消息，商团从国外订购了一批武器，于是将其充公没收，并在10月中旬对商团展开战斗。粤军击败了商团，清除了商团对孙中山政府的威胁。

不甘失败的陈炯明已被赶出广州，此时又趁机率兵前来反攻，因为广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能控制广州的话，谁也无法赢得广东的领导权。原因是：首先，广州是珠三角的核心地区，这里是广东最富裕的地方，也是历届军政府开支的金库；再者，它是中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城市，谁控制了广州，就相当于掌握了合法的外贸特权；再次，广州是当时最繁荣的商业城市。此外，从地理位置上看，广州与香港和澳门比邻，进退自如。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41。

1925年1月15日，孙中山的护法政府下令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东征军总司令，粤军第一旅的任务是增援东征军，开拔到广东的东江地区。3月19日至20日，东征军在兴宁与陈炯明部展开激战。

东征军何应钦率领第一教导团和王伯龄率领的第二教导团包围了兴宁城，由于兵力不够，请求增援，于是张发奎把黄琪翔率领的第三营调拨给他们。张发奎自己则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去攻打20里之外的神光山。

在人们与黄琪翔的交往中，怎么看他也不像是一位勇猛顽强的军人。黄琪翔的长相太过俊美，言谈举止又温文尔雅，一般人都认为这样的人，很难适应残酷的军事战斗。他与张发奎的风格完全不同。张发奎的粗鲁、暴躁与豪气，符合人们对传统军事将领观念的认识，所以说他是天生的将军。但是，黄琪翔在军事上的才干，在这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中得以充分展现，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张发奎回忆说：“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陈铭枢命令我派一个营去支援第一、第二教导团包围兴宁城。我派第三营营长黄琪翔，我自己则率领两个营进攻20里外的神光山。经过几番激烈的夜战，我军在神光山伤亡惨重。拂晓时，我从山顶望出去，但见山脚下聚集了大批俘虏。我询问士兵们，哪一支部队俘获了这么多敌军？他们喊道：‘第三营。’我几乎不能相信，因为黄琪翔在兴宁作战。”¹

原来，黄琪翔率领第三营赶往兴宁后，怎么也找不到教导团的踪影。回头看，神光山方向已是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感觉神光山这边形势吃紧，于是黄琪翔赶紧率领第三营又杀了回来。哪知道在半道上与叛军陈炯明下属的王其祥旅狭路相逢。黄琪翔立即指挥全营冲杀进去。而对方的士气很低，又不摸进攻者的底细，以为碰上了粤军的主力部队，结果一开打，见粤军十分凶猛，便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42。

一个个举枪投降了。黄琪翔立即把俘虏排成了队，押解过来。敌军旅长王其祥，与黄琪翔的名字在读音上一模一样，所以人们戏称这一仗是“黄琪翔打黄琪翔”，成为当时的笑谈。

粤军部队编制采用的是三三制，即一个营有三个连，一个连有三个排，一个排三个班，一个班是九个人，再加上营部的指挥人员，黄琪翔的第三营总兵力即使在满员的情况下，也不到三百人，可当他们统计缴获的敌军枪支时，光是步枪就有一千枝。这个战果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黄琪翔率领第三营战胜了人数超过自己达三倍之多的敌军。

与此同时，由于陈铭枢部顶不住陈炯明部队的优势火力，而正与陈炯明主力林虎部交战的蒋介石部突出在前，结果被林虎的部队合拢过来，蒋介石的部队被围于惠州五里亭的山顶，形势非常危急，稍有差池便有灭顶之灾。

陈铭枢紧急命令张发奎团前往解救、增援蒋介石。这时何应钦第一团开始向五里亭冲锋，而黄琪翔率领的第三营刚刚归队，于是立即加入了战斗。他们像一把锐利的钢刀，一下子撕开了敌军的战线，搅动了战场的格局。

这样一来，林虎的部队受到上下两个方面的夹击，乱了阵脚。张发奎的第一团趁势攻克林虎的司令部，拔了林虎的军旗，大获全胜，蒋介石因此脱险。教导团也趁机攻占兴宁城。敌军全线溃退，跑到潮州和汕头方向去了。

神光山一战，黄琪翔率领的第三营打出威风，鼓舞了士气，再加上惠州五里亭的战斗，令所有参战部队对他们肃然起敬，也使得第三营营长黄琪翔一战成名。这一年黄琪翔血气方刚，还不到27岁。

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得意门生，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这次东征也是受孙中山的委派，担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兴宁城举行的庆功会上，蒋介石给第一师的蒋光鼐团（第二团）送去十头猪，而给张发奎团（第一团）送来十五头猪。全军上下心知肚明，这是蒋先生对张发奎团的格外褒奖。

东征中的神光山战斗，打出了张发奎团威风。尤其是黄琪翔率领的第三营，主动出击，战胜了三倍于己的敌军，像神话一样在粤军中疯传。蒋介石至此对张发奎部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黄琪翔也很尊敬。而且，蒋介石这个人非常重视人才，等到他全面掌权之后，在张发奎、黄琪翔的任用上，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他俩的态度。

事实上，当时的军人，对立的双方尽管嘴上都在高呼革命的口号，翻脸比翻书还要快，而对革命的真正意义到底能有多少了解？是个问号。但作为军人，向死而生，勇者为胜，这是战场上军人们的立足之本，也是求生之道。中国向来信奉“胜者为王败为寇”，唯有取得胜利，才是军人的资本。失败者没有尊严，也没有话语权，甚至连性命也不能苟全。正是因为黄琪翔敢打争胜的勇气，才使他在返粤后迅速立足军界，名震一时。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5月，蒋介石继续指挥参加东征的部队向广州开拔。广州当时被刘震寰、杨希闵的滇桂军所控制。粤军与滇桂军作战，其目的就是为了把他们驱逐出广州。

粤军沿着广九铁路线向广州挺进。6月12日，张发奎团在龙眼洞附近的瘦狗岭与滇军接仗，取得了胜利。第二天，在各路粤军的压迫之下，滇军和桂军无力顽抗，纷纷缴械投降。粤军占领了广州。

7月1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成立。7月6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辖下各地方军队名目取消，组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担任总司令。初期的国民革命军依照苏联体制，共产党人加入军队，在军、师两级设政治部及党代表。

11月21日，陈可钰将军（1882—1944）被委任为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任该师少将副师长。陈可钰是老资格的粤军将领，曾任孙中山总统大本营警卫团团团长，是张发奎的老上司。此时的第十二师完全由张发奎掌握，因为陈可钰当时在养病。张

发奎亲口告诉陈可钰：他作为师长，不必到师部视事，仅仅挂名而已。¹ 这样张发奎就成为第十二师真正的领导人，大权独揽。许志锐任师参谋长。第十二师下辖三个团：叶挺任 34 团团长；朱晖日任第 35 团团长；黄琪翔任第 36 团团长。

这一时期，以张发奎为首的军事集团已现端倪。在张发奎麾下，黄琪翔、朱晖日、叶挺、许志锐、缪培南、李汉魂、吴奇伟等，均是其赫赫干将。虽然黄琪翔归随张发奎部队的时间是在 1923 年 8 月，比其他人要晚，但黄琪翔战功卓著，于一年多后的 1925 年，就已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势头。军人就是这样，论功行赏，胜仗越多，战功越大，地位就越高。

国民政府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共有六个军，此时都集中在广东。以前他们的军饷都是划疆而治，就地筹饷，如今全部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一办理。国民革命军的收入，与之前的粤军相差不多。李宗仁回忆说：“名义上广东六个军七十一一个团，实际兵力约有七八万人和飞机数架，其编制是‘三三制’。”² 所谓军官的公费，没有特别的规定，大致是一些军官们的接待费用。相比穷苦人民来说，当兵的薪饷是不低的，尤其是军官，可以用丰裕来形容。黄琪翔此时已经是团长，每月不仅有 300 元薪饷，还可以有 200 元的公费，所以他和他的家人已经可以不再为生活费用而担忧。

037

1925 年 12 月末，第四军第十二师奉命抵达雷州半岛，开始清剿军阀邓本殷（1879—1966 后）的部队。

邓本殷本是粤军陈炯明麾下普通一兵，在各路军阀混战中脱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49。

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李宗仁回忆录》，p247。

颖而出，一路晋升至“八属联军”总指挥。1925年4月，野心膨胀的邓本殷派代表前往北京，希望北京政府改南路八属为广南省，并任自己为督理。北京政府首脑段祺瑞，正瞄准了孙中山去世的时机，想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对于邓本殷的投怀送抱，求之不得，便宣布广东南路八属为特区，任命邓本殷为八属善后督办，授予将军府植威将军、陆军中将，并派军舰南下协助邓本殷防守琼崖。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蒋介石趁机排挤政治对手，驱赶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清洗了他的嫡系部队。驻防四邑的部分许崇智旧属愤而投奔邓本殷。邓本殷则趁势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以便夺得战争先机。

就在这种背景下，1925年12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从广州誓师出发，张发奎率领第四军第十二师奉命进攻邓本殷部。张发奎的第十二师是先锋部队，之后是陈济棠第十一师跟进。邓残部慌忙向海南岛逃窜。这是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

部队没有海军舰船，如何才能渡海攻打海南岛？黄琪翔建议：利用近海渔船、帆船和小火轮，乘黑夜渡海，拂晓前在文昌县铺前港强行登陆，然后沿文昌至海口公路前进，直捣邓本殷的

老巢府城。黄琪翔还自告奋勇说：“我团愿作渡海先锋，万一我不幸牺牲，三十六团由营长欧震接任指挥作战。”他的建议得到了张发奎的赞同。¹

1926年1月，张发奎的第十二师登陆海南岛，开始进攻邓本殷的部队。



苏军顾问加伦将军

1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47，魏鉴贤文章《北伐风云忆英豪》。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¹与第十二师一同前进，去与邓本殷浴血作战。

1月15日，张发奎率部乘坐帆船200余艘，由雷州外罗港渡海，向琼州的新埠港进发。官兵经过一夜漂泊后登陆，随即展开纵深进攻。魏鉴贤回忆说：“1926年1月15日凌晨开始渡海攻打海南岛。那时，张发奎、廖乾五、黄琪翔和我同坐一条小火轮拖的驳船。当船离岸边还有段距离时，天将拂晓，黄琪翔即身先士卒带领他的部队涉水登陆，出奇制胜地歼灭了守敌。”²随后，黄琪翔第36团的第二营斜出铺前港，佯攻守军，牵制敌军火力，成功掩护了第十一师陈济棠部队登陆，然后向敌展开全面进攻。³他们一直打到琼崖，邓本殷部被彻底击溃。1月22日，邓本人见大势已去，化装进入日本兵舰，不久便逃往越南。广东遂告统一。

琼州府城被攻克后，陈玉珏辞职，副师长张发奎升任第十二师师长。此时第十二师的军官编制如下：

师长：张发奎；

副师长：朱晖日；

参谋长：许志锐；

参谋处长：李汉魂；

34团团长：叶挺；

参谋长：周士第；

35团团长：缪培南；

参谋长：苏德燊；

36团团长：黄琪翔；

1 苏军顾问加伦，即苏军华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将军（1889—1938）。191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时任萨马拉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历任远东共和国红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1924年10月底，加伦被派到广州，化名布柳赫尔，接替刚刚殉职的巴甫洛夫将军，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苏联军事总顾问，并任黄埔军校苏联顾问组组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回国。后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远东方面军司令等职。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38年10月在肃反运动中被捕，11月被处决。

2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47，魏鉴贤文章《北伐风云忆英豪》。

3 1949年3月怀远书局《第四军纪实》，p54。



1926 年张发奎率部登海南岛攻克琼州府城后，与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的部分军官合影。

参谋长：吴奇伟。¹

1926 年 6 月，在正式开始北伐之前，张发奎就已经接到了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电报命令，让第十二师向湖南挺进，以支持已经归列北伐军的唐生智部队。此时，叶挺的第 34 团已经改编为独立团，于是张发奎命令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向湖南进发。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已经形成了力量，以第十二师为例，叶挺的新编独立团几乎为共产党所控制，包括团长叶挺本人，也是秘密的共产党员。

黄琪翔回忆说：“这三个团中，叶挺的独立团系新成立的，干部全是共产党员，是革命的队伍。35、36 两团亦有不少（中共）

1 1949 年 3 月怀远书局《第四军纪实》，p51。

党团员作为政治工作人员加入编制，负责担任政治训练工作，我在部队里初次和共产党合作，在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帮助下，接受革命政治的启蒙教育，思想上才开始懂得军队和政治的关系，因此和共产党的关系是好的。在作战的时候和叶挺的独立团也是完全能够合作的。”¹ 他的战友魏鉴贤说，此时黄琪翔的思想受到了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的影响和指导。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²

这是黄琪翔初次与共产党人的合作，由此也奠定他在感情和思想上的左翼倾向。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纪念黄琪翔》p46。

第三章 北伐战争的先锋

一、先头部队

1925年7月1日，孙中山缔造的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成为孙中山之后的新一代政坛领袖。国民政府成立常务委员会，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林森、许崇智为五大常委，汪精卫为常委会主席。在军事委员会中，除了五大常委之外，廖仲恺、蒋介石、朱培德等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兼任军委会主席。这样，汪精卫不仅是国民政府的领袖，也是军事首脑，名义上已经独揽军政大权。

大元帅府所辖的所有武装力量，至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计五个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第二年的7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号召全国要“建设统一政府”，完成孙中山总理遗愿。北伐战争至此拉开序幕。它的真正目的：首先要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然后消灭盘踞在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的皖系军阀孙传芳；最后推翻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统一全中国。

北伐战争开始之际，国民革命军再行扩编，动员和汇集十余万人参加北伐战争（战争过程中曾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蒋介石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

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

此时，新调整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蒋系）；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湘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赣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粤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粤军，又称福军）；第六军军长程潜（湘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桂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作为总参谋长的李济深，统帅第四军一部、及第五军留守广东，其余各军悉数参加了北伐战争。

黄琪翔归属第四军，当时的编制为：

军长李济深（兼）；副军长陈可钰。

下辖四师：

陈铭枢第十师，副师长蒋光鼐，下辖蔡廷锴、孙绳、戴戟三团；

陈济棠第十一师，副师长邓世增，下辖余汉谋、香翰屏、黄镇球三团；

张发奎第十二师，副师长朱晖日，下辖许志锐、缪培南、黄琪翔、叶挺四团；

徐景唐第十三师，副师长陈章甫，下辖云藏桥、陆兰培、陈章甫三团；

北伐军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命令副军长陈可钰率领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两师联袂参加北伐，计有六个步兵团，兵员约1万余人。陈济棠第十一师，跟随军长李济深留守广州，拱卫后方根据地。当时，张发奎十二师的叶挺独立团不在此列，因为该团已经先期出发，进入了湖南。

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北伐阵中日记》¹第一册载：7月1日，“今日为总司令部成立之第一日，各部、厅、处人员完全来部办公。”在当天，总司令蒋介石就在训令中明确规定：“第四军于七月十日前，先行集中安仁附近。”

关于此间的历史背景，黄琪翔回忆说：“1926年初，唐生智在湖南驱逐北洋军阀派驻湖南的督军赵恒惕（1880—1971），并

1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的《北伐阵中日记》，是据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档案于1960年编撰的，共六册。

派人和广东的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取得连（联）络，请求予以支持。此时国民政府已决定进行北伐，遂于五月派叶挺率独立团首先进入湖南，支援唐生智。唐生智部队驱逐赵恒惕的同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接着，六月间，广东方面的第四军派出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由副军长陈可钰指挥，配合广西李宗仁所指挥的第七军进行北伐，到湖南和唐生智会师。”¹

北京段祺瑞执政府此时已经倒台，掌权的是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有 30 万人，控制着湘（湖南）、鄂（湖北）、豫（河南）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从直系分化出来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 20 万人，盘踞赣（江西）、闽（福建）、浙（浙江）、皖（安徽）、苏（江苏）五省；奉系张作霖军约 35 万人，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吴佩孚和张作霖相互勾结，控制着北洋政府，并以北方为后盾，由南口、多伦等地向国民革命军进攻；在南方，吴佩孚又以援助赵恒惕为名，进占湖南，企图联合西南军阀，进攻广东；而孙传芳则在赣、闽、苏等长江中下游最富饶的地区，伺机行动。这三股军阀势力与广东对峙，虎视眈眈，暴露出吞并和消灭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虎狼之心。

吴佩孚决心与国民政府为敌，而他的总参谋长蒋百里（1882—1938）心有余悸，力劝吴佩孚避其锋芒，不要与蒋介石用兵。蒋百里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对当时战局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吴佩孚的野心已经膨胀起来，就是不听劝。于是吴佩孚统治下的湖南、湖北首当其冲，成为北伐战争的首要战场。蒋百里无奈之下先是请假，偕夫人逃离了直系，返回上海慕尔鸣路，随即打电报向吴大帅辞职。²

045

国民政府举行誓师大会之后，北伐战争打响了。

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说：“北伐前夕，蒋（介石）总司令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战斗序列：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二师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中华书局 1985 年 2 月第 1 版，陶菊隐《蒋百里传》，p63。

出湖南；何敬之（何应钦）将军统领东路军预定由广东之东江、潮梅经福建至浙江，当时福建是周荫人之部队；第二、第三、第六三个军在赣湘边界监视孙传芳；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担任北伐之正面由湖南攻武昌，第四军在中央，第七、第八两军分担右左两翼。黔军袁祖铭、王天培也由常德指向鄂西。”¹

第四军参加北伐，是从广州黄沙车站出发的。出发的时候，黄琪翔内心十分矛盾。那时候他的父亲和弟弟均已过世，他成了母亲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他说：“记得民国十五年（1926年）我出发北伐的时候，母亲送我到广州黄沙车站，脸上出现凄然的表情。我告诉她：‘母亲，整千整万被压迫的同胞渴望着解放，做我们的后盾，有严密的组织和伟大的人物来领导我们，有三千子弟可供我驱策。放心吧，母亲，祝福我们，祝福中国人民成功！’然而，我自期此去死在光荣的战场上，永远不复回来再见我的母亲，可怜的她哪里会知道做儿子的苦心呢！”²

北伐战争打响后，陈可钰率领的第四军进攻部队位列中央突前位置，开始向平江方向进攻。与他相策应的右翼军，是李宗仁的第七军进攻汨罗江，而左翼军的唐生智第八军，沿着武长铁路向汨罗江河口方向挺进。

1926年7月10日，作为北伐先锋部队的第四军，在副军长陈可钰的指挥下，首先攻占了醴陵。

张发奎回忆说：“攻占醴陵功劳最大的是第三十五团（朱晖日团），事实上战斗并不太激烈，时间也未拖延。我们拂晓发动攻击，午后就占领了醴陵，伤亡很有限。醴陵的居民放炮仗欢迎我们。接着向北追击敌军，拿下浏阳没有战事可言。”³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许志锐，参谋处长李汉魂。拥兵四个团，部队编号为：第35团长，朱晖日兼任团长；第34团，团长缪培南，下辖三个营；第36团，团长黄琪翔，下辖三个营。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28。

2 香港中国文化馆2003年出版《我的母亲》丛书（第九辑），p6。

3 《张发奎口述自传》，p59。

还有先行湖南的叶挺独立团。黄琪翔的第36团，士兵并未足额，大致接近于3000人。

吴佩孚（1879—1939）的部队战斗力也很强，接下来将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平江之战。

8月18日，陈可钰率领的第四军军部、右纵队进驻桑枣桥，张发奎第十二师到达白两湖。¹

8月19日，天气极为炎热。平江战役于早上六点开始打响。

黄琪翔在其自述中只轻描淡写道：“北伐军在湖南境内，首先平江和吴佩孚部下的混成旅长陆澐打了一仗，得到了全胜。”²事实上，战斗过程远非如此简单，战况十分激烈，而且表现最突出者，就是他本人所率领的第十二师36团。他的长官张发奎说：“在此战（平江之战）居首功者，是三十六团团团长黄琪翔，该团经肉搏冲锋，首先攻入平江。入城后激烈巷战，十二时已全部解决。”³

平江守军系吴佩孚部平通防御司令陆澐，是吴佩孚麾下有名的战将。为了迎战北伐军，陆澐在战前指挥十万劳力，沿山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遍设地雷和铁丝网，加之装备也好，该部光是山炮就拥有十几门，陆澐因此自信自己的防线已是固若金汤。

陆澐可能不知道，他的对手正是日益强大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以第四军的主力张发奎第十二师为例，自从打败了邓本殷部，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装备了自己。第十二师的士兵，每人一支步枪，有两种口径，分别是0.65和0.97公分；每个士兵配备了150发子弹，还有两颗手榴弹。另外，还有机枪炮兵营，使用的是俄制新型重机枪，还有国产的水冷和气冷式机关枪，每一个军官都配备有毛瑟牌手枪。同时，第十二师还组建了相当完善的后勤保障线，通常由25至35岁的壮劳力替部队充当运输兵。部队打到哪，后勤就跟着追上来。这是当时其他部队无法比拟的。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伐阵中日记》第一册。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张发奎口述自传》，p62。

将敌完全解决。守将陆澐自杀。”¹

守军完全没有料到，黄琪翔率领的36团犹如一柄锋利尖刀，不顾一切地冲进城内，然后与他们展开肉搏战，一下子打乱他们战前的部署。战斗激烈而残酷，但是战斗的时间并不很长。守军的意志终于被36团击垮，防御点被一个个挖掉。

左翼缪培南团以及右翼陈铭枢师，分别在平江城的外郊与敌鏖战，战斗激烈，次第攻破了敌军的防御工事。



陈可钰

第二天拂晓4时，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在战地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报告说：

19日拂晓“开始进攻后，因地形复杂，以致各部尽失联系。职（陈可钰自谓）尔时极形忧虑，至八时追至张（发奎）师长阵地，而张师所部，亦只得叶挺团及缪培南团之切实在掌中指挥耳，而黄琪翔团则早绕出敌人之后，致与师部失却联络。而真如师（陈铭枢的第十师），因其任务监视罗中洞之敌，一部绕出敌后截敌归路，故与军部离得颇远，亦未得确实情形。延至上午十一时始悉黄琪翔团已进占平江城，而缪团、叶团亦同时接近敌人激战，其状况始见明瞭。下午二时所得战斗之结果如下：A，十二师黄琪翔上午十一时入城后，获敌械及军用品无算。当时在敌司令部击毙敌旅长陆澐。敌旅长正在食饭，闻黄琪翔进城，即出与应战，有短枪五、六十枝，步枪兵一排，选一坚固民房抗我黄团。黄团无法，只得用火去攻敌，始突围而走，于是陆澐遂在此时击毙，现已照相殁好，拟今早用隆重之礼葬之。葬时著俘虏往送。B，十二师叶团自迫敌阵，官兵稍有损失（未得详报），而缴步枪最多，俱双筒七九（式步枪），总在四、五百杆以上。此十九日下

1 《中外杂志》第40卷第2期至第4期（1986年8—10月），载缪培基的文章《张发奎与铁军之兴衰》，p60。



叶挺

午一时事也。昨获小机关（枪）二枝、迫击炮二门、子弹五六万颗。C，十二师繆团，因在正面压迫敌人，待至敌阵动摇，始向敌炮兵阵地出击，夺获迫击炮三尊、机关枪三挺、大炮二门，手榴弹甚多，未详数量，军用品无算。此十九日下午一时半事也。D，十师廿八团闻在红石咀缴得敌枪三、四百枝，但未得其详报；真如（陈铭枢）率部出余家洞，未得其确报。”¹ 陈可钰的这份战报，叙述详细，可以清楚看到

平江战役的战斗经过，以及黄琪翔团所起的作用。

针对陈可钰的这份战报，需要有二点补充：

其一，守军司令陆澐旅长之死，并非是其突围时被击毙，而是死于陆澐的自戕。当黄琪翔 36 团冲入平江城之后，守军撤退到陆澐的司令部，眼看顶不住了，陆澐的手下就劝说他和大家一起投降。陆澐将军是个有骨气的军人，不肯就缚，也没有难为自己的部下。他说：“好吧，你们走吧。”于是他拔出手枪，朝着自己的脑袋打了一枪，就这样报答了吴佩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司令官一死，全军覆灭。

其二，陈可钰在这份战报中还说：“职军向来规定：夺获敌炮（一门）五百元，小机关（枪一挺）贰百元，步枪（一枝）廿元。”陈可钰还说：“职军所欠各师（军饷）不下二十余万元，即叶挺一团亦欠其三四万元，以七日分接济不上，且临时费发出已逾两日，未得领过。各部只有伙食项下垫支，所有私款亦悉数用尽，此种苦况日强。”² 陈可钰上报这份战报的时间是 8 月 20 日凌晨 4 时，此时战场上的硝烟肯定还没有散去，陈可钰就需要为第四

1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文物”典藏号 002-080200-00004-011。

2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文物”典藏号 002-080200-00004-011。

军的军饷和赏金操心了。

平江之战，北伐军俘虏敌军官 79 人，士兵 1500 人，缴获大炮 11 门，机枪 10 余挺，步枪 1000 多枝，马 12 匹，北伐军伤亡 173 人。

敌军司令陆澐杀身成仁的气概赢得军人们一致礼赞。张发奎在其回忆录中说是他本人下令，买了一副好棺材，予陆澐以厚葬。而在战斗中死亡的士兵，当然不会有司令官陆澐这样的优厚待遇。战斗结束之后，第十二师师部副官处的官员与军医处的人一起商量，视每一场战斗中双方阵亡士兵的人数多寡，然后组建临时殡葬队，来处理阵亡士兵的遗体。

临时殡葬队的组成，是从每个连队里抽派出一个或者若干士兵，他们负责把敌军阵亡的官兵和己方战死的官兵埋在一起。这些战死者，常常连一口薄棺也没有，只是建立一个普通的坟墓，插上一块木牌作为墓碑，草草了事。阵亡者的亲人，以后要想来祭奠亡灵是不可行的，因为部队一走，这里很快就成为荒郊野坟，再也找不到这些阵亡官兵的坟墓。

每场战斗结束之后，参加战斗的部队需要得到暂时休整，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补充兵力。战场上表现勇猛的人很快得到提升，这些班排级领导就会亲自到俘虏队伍里挑选健硕的年轻人，然后填充到自己的部队之中。其余的俘虏，会被派充到运输队，这样，刚才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转瞬之间就成为同生共死的战友。而这些新入列的战友，在军需得不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依旧穿着敌方的军装，却已经成为北伐军的“革命”同志。其实，对于最底层的士兵而言，革命不革命，并不是他们能搞清楚的问题，他们参军的目的常常是为了得到报酬，或者吃饱饭。剩下的一些兵油子，还有老弱伤残者，能够获得北伐军分发的一点遣散费，让他们自己回家。

除了战斗人员的补充之外，关键还需补充弹药。北伐军的战士，每人至多只有 150 发子弹。如果碰到难啃的骨头，一仗打下来，枪还在手，子弹已经没了。将领们就要向上级请求补给。

北伐军代理总参谋长白崇禧是这样回答将领们的请求：“缺乏子弹只有用刺刀赶快冲锋！革命军之补给靠前方，不能靠后方。打败敌人，敌人之装备，便是我们之补给。何况打下武汉，汉阳之兵工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¹白崇禧后来回忆说：“这些话虽是极不合理，当时之情形的确如此，我只好壮他们的气。所幸将士努力，第四军由中央进攻，第七军由右翼迂回敌后，第八军由左翼进攻，连破吴佩孚三道防线。”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28。

二、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

占领平江城之后，北伐军第四军几乎没有休整，继续乘胜挺进。

敌军迅速调整部署，开始回缩，把精锐部队撤至后面的汀泗桥镇布防，准备在此决一死战。迎战北伐军的吴佩孚部队，主要由陈嘉谟指挥的第十旅，以及军官团和马济的一部。¹

事实上，平江之战严重挫败了吴军的士气。战前，吴佩孚亲自来到湖北坐镇指挥，并赶紧调来他的得力干将刘玉春（1878—1932）。刘玉春是北京人，本是吴佩孚的卫队旅旅长，以忠勇闻名，吴大帅的身边人都叫他“赵子龙”，此时临危受命，出任第八军的军长。²同时，吴佩孚命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1873—1937）组织督战队，把守要口，遇有退缩官兵，格杀勿论。吴佩孚准备在汀泗桥与北伐军一决高低，杀个你死我活。

第四军在轻松拿下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通城与崇阳城之后，也开始向汀泗桥方向集结。

黄琪翔率领的 36 团，打了胜仗，士气饱满，战斗欲望高昂，但问题是团里的大部分士兵是广东人，不适应湘鄂地区的气候条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伐阵中日记》第一册。

2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陕西出版集团 2007 年 11 月版，p116。

件，而且当时正蔓延着虎烈拉病¹，加上部队的医疗条件极差，又是在溽暑中急行军，许多士兵倒了下来。

军令如山倒，黄琪翔的部队依旧在急行军。他们走在北伐军的最前面，有些士兵因病掉队了。随军北上的蒋介石重要随员、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公博（1892－1946）就跟在他们队伍的后面，见到这样的情形：“沿途所见带病的，和在路边倒毙的士兵，实在不少，大概因虎烈拉蔓延，而又在溽暑行军的缘故。”²

身为团长的黄琪翔，始终和自己的战士们在一起，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去投入新的战斗。官兵们都知道汀泗桥是战略要地，吴佩孚一定会重兵把守，进行殊死抵抗，因此汀泗桥之战必定是一场血战，谁也不敢担保自己能够活着走出战场。

所谓汀泗桥战役，其战斗核心位置在汀泗桥镇，它是湖北省内的一个边缘小镇，也是一座古镇。早在南宋淳佑七年（1247年）在此处建有一座石拱桥——名“丁四”桥，因此得名。它是湖北的南大门，也是通往武汉的必经要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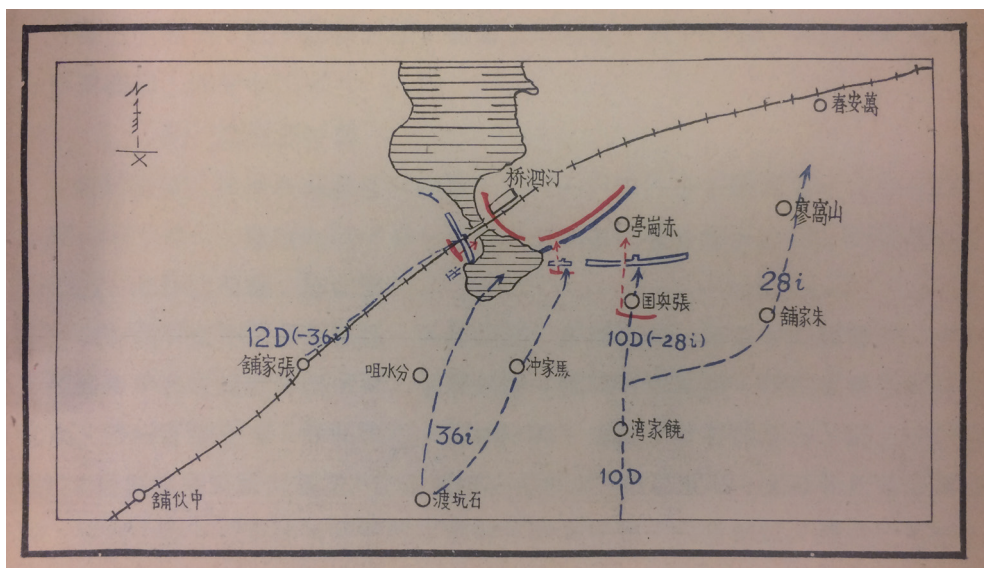
从军事角度看，这里是打阻击战的好地方，易守难攻，可以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克敌于阵前。

发源于幕阜山的汀泗河，是咸宁的主要水系，自西南向北斜穿汀泗桥镇，沿山岗西脚流走。此时正逢大水时节，全镇三面均被洪水包围，水深港阔，甚至街道部分路面亦被洪水淹没。人要通过，尚需涉水而行，这样就在敌军阵地西面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在汀泗桥镇东，还有一片陡峭和起伏连绵的山岗，其中最高的一座山，名叫塔脑山，吴佩孚守军“铁卫队”的阵地就设在这片山岗之上。

而战斗核心位置的汀泗桥，早被吴佩孚部构筑了严密的防御

1 虎烈拉病就是霍乱(cholera)，早期译作虎烈拉，是由霍乱弧菌所致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临床上以剧烈无痛性呕吐，米泔样大便，严重脱水，肌肉痛性痉挛及周围循环衰竭等为特征。

2 民国廿六年《民族杂志》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卷第八期合订本。陈公博《军中琐记》，p212。



汀泗桥附近第四军攻击经过要图。原载 1949 年 3 月怀远书局《第四军纪实》。

工事。汀泗桥的北端是堤坝，也已布满装有倒钩的铁丝网，根本无法穿越。陈公博说：“那道桥（汀泗桥）的险要也足骇人。桥大约有二十来丈长，上面铺着单轨铁路，两岸比桥低下两三丈，桥又不像其他的铁桥有扶栏，如果桥头安置几挺机关枪，任你有几多队伍，都难得飞跃。”¹

按照北伐军的战斗部署，第十二师缪培南团列阵在桥头，黄琪翔第 36 团在桥的右侧，第十师部队在黄琪翔的更右侧，叶挺独立团作为预备队，跟师部在一起，位置在 35 团和 36 团之间的后方。

黄琪翔回忆说：

8 月下旬，左翼第七、第八军和独立团已与右翼的第四军取得联络，向湖北推进。第四军通过了通城、崇阳，于 25 日到达汀泗桥附近。汀泗桥是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是高山，易守难攻，

1 民国廿六年《民族杂志》第五卷第一期至第八期合订本。陈公博《军中琐记》，p407。

历次军阀内战，均为必争之地。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在此设防的不下两万余人。

8月27日，第四军配合左翼的七、八军对汀泗桥发动猛烈攻势。吴军据守有利地形，拼死抵抗，以机关枪和大刀队组织督战队，在自己的阵地后方把守，防止退却。当天战况十分剧烈，直至黄昏，占据仍未能解决。此时我方得到情报，吴佩孚亲率增援部队已越过武昌南下，将抵贺胜桥；同时，江西的孙传芳亦有派兵袭击我后方之势。局势相当严重。

第四军在右翼高山地带作战，任务较重，苦战一天，进展困难，一时处于胶着状态。晚上约8点以后，我到指挥部找到了师长陈铭枢和俄国顾问尼基金研究战局。我向他们提出了下面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我军士气旺盛而装备不良，勇于进攻而不长于防御；敌军情形则相反。今夜如不能彻底解决战局，明天吴佩孚援军到后，必将大举反攻，使我陷于被动；加上孙传芳军在后方的威胁，前途十分可虑。我建议不顾任何牺牲，当夜实行全线夜袭，突破当前高山阵地，以挽救危局。这个意见受到大家的重视，并立即采取措施，下令各部队对当前敌军阵地实行夜袭。叶挺表示决心，当夜一定要拿下汀泗桥。10点以后，我军全线同时突击，枪声杀声震撼山谷。到了拂晓，终于突破了汀泗桥阵地。我军登上山头后，发现无数死伤在战壕里的敌军，大部负有白刃战的刺刀伤，足见战斗激烈程度。¹

在战斗中，正面对敌的黄琪翔36团担任着主攻任务。

056

北伐军政治部的人找到当地农民，把他们带到黄琪翔的跟前。黄琪翔详细地了解汀泗桥的地理环境以及敌军的布防情况之后，他设计了战斗方案，即绕开敌军的火力控制区域，从上游涉水过河。他把这一战斗方案向师长张发奎汇报，然后张发奎又向副军长陈可钰汇报。第四军陈可钰的军部，在十余里外的小市集内。

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p2，黄琪翔文章《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军部与师部之间，当时已经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大家一致同意黄琪翔的意见。

8月26日是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黄琪翔亲率36团抵达偷渡点。他首先挑选数十名善水者下河，在当地农民向导的带领下进行偷渡。这是最浅的地方，河水大约有齐腰深，战士们双手平举着枪支在头上，然后涉水过河。敌军当然有防备，于是接火，许多战士死在河里。最先到达彼岸的战士迅速反击，压制敌方的火力，其他人、包括团长黄琪翔本人在内，趁势渡河成功，然后即行展开攻击。

师长张发奎当时就在前线，目睹了36团涉水偷渡的过程。他回忆道：“黄琪翔整个团都涉水过河了，他们把步枪顶在头上，走过了水面齐腰的汨罗江（汀泗河），在战斗中，他们一马当先，攻打敌人的堡垒。许多人阵亡。8月26日至27日交接时，在夜色中衔枚疾走，俟接近敌阵时，攀登鼓噪，以白刃杀入敌阵，歼敌甚众，敌不支溃窜，黄（琪翔）团遂占领中央最高阵地数处。27日拂晓急攻占领其炮兵阵地。我亲督三十五团与独立团于七时占领汀泗桥东北一带全部高地。‘冲呀！杀呀！’的喊声刺破了夜空，终于在拂晓时攻下了要塞。该二团冲过铁桥，午前十一时占领咸宁城。”¹

缪培基的文章写道：“二十六日凌晨，各部队分向汀泗桥挺进。十时三十分，左翼缪培南团与叶挺之独立团一部向铁桥猛烈攻击，敌扼桥顽抗，经数次冲锋均不奏功。正午，右翼黄琪翔团及第十师陈铭枢占领东北高地后继续前进，因敌炮火猛烈，至夜仍无进展。于是黄琪翔率部两营趁黑夜向敌中央阵地突袭，敌以机关枪扫射，弹如雨下。黄琪翔部衔枚疾进，至接近敌阵时，以白刃杀入，俘虏甚多。”²

张发奎说：“我们选择攻击敌军的最强点，因为一旦它被击溃，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63。

2 《中外杂志》第40卷第2期至第4期（1986年8—10月），载缪培基的文章《张发奎与铁军之兴衰》。

敌军的残余阵地就会陷于混乱。这是战斗时的明显例子。在渡河期间，三十五团从桥头佯攻，向敌军猛烈开火。当三十六团压制住敌军的要塞火力，三十五团与独立团就跨过了桥面追击敌人。”守卫汀泗桥的是吴佩孚精锐部队，这一仗打下来死了3个团长，39个连长死得只剩下5个连长，士兵死伤过半，可见战斗之残酷。

从张发奎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黄琪翔所率领36团在汀泗桥战役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最先与敌接火的部队，攻克的是敌最重要的堡垒，即张发奎所说“敌军的 strongest 点”。张发奎说我方：“三十六团伤亡惨重——至少折损三分之一。在战斗中，一名营长，几名连排长阵亡……”36团的确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为完胜敌军奠定关键的基础。

27日，黄琪翔团突破汀泗桥后，叶挺团已于上午11点半占领了咸宁城。此时咸宁城已无抵抗力量。陈可钰向总司令部报告称：“叶团于本日上午十一时卅分占领咸宁城时，尚有少数残敌未退，经我完全缴械，并截获火车一（辆），卡（车厢）内系米及子弹。”¹

黄琪翔说：“28日我军乘胜追击。在进军中发现铁道两旁的树上悬着无数颗敌军人的头颅；淹死在湖沼地带的敌军尸体亦数以千计，令人不堪逼视。这就是吴佩孚军督战队的‘战绩’。”²

随后而来的唐生智属下师长龚浩（1887—1982）回忆说：“等我们沿粤汉路赶至，第四军已将汀泗桥夺下。第四军共只六团，黄琪翔、范汉杰、戴戟、缪培南、叶挺等，朝气蓬勃，诚不愧为‘铁军’。这一役伤亡之惨重，只记得我晚上到第四军行营去时，完全在死尸堆里行走。”³第30团团长戴戟正是在此役中受伤。

汀泗桥战役的战果是，毙敌1000余，俘虏军官157人，士兵2296人，缴获大炮4门，机枪9挺，步枪3000余，马14匹，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伐阵中日记》第一册。

2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辑，黄琪翔文章《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6月版《口述历史·军系与民国政局》之“龚浩先生访问纪录”，p94。

军用物资无数。另据《黄琪翔传》载，此役，黄琪翔的三十六团，阵亡排长1员，伤侦察队长1员，伤亡的士兵百余人。

在汀泗桥战役中，北伐军共有将士400余人伤亡，其中134人牺牲。¹

汀泗桥战役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北伐军士气，紧随十二师后面的部队，个个都怀着必胜的信念。陈公博说：“在路上得到探报，说我们军队已占领汀泗桥，已经向前面追逐敌军，这样，我们更不能不急行。汀泗桥地方并不大、确是很险要，以前湘军两次攻鄂，都在汀泗桥失败，卷甲回湘。我们都有这样观念，以为如果汀泗桥占领，那么占领武昌已不成问题。此后只有贺胜桥和纸坊可守，武昌是守不住的。这个占领汀泗桥的消息在给予我们军队一剂兴奋剂，不啻给予我们军事胜算一个保证。”²

军队里有个潜规则，就是部队要轮番上场。张发奎第十二师刚打了平江、汀泗桥战役，虽然获得全胜，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下面遇到的战斗，按理说应该派陈铭枢的第十师打头阵。可是副军长陈可钰没有这样做，他还是命令张发奎率领第十二师冲锋在前，继续剑指贺胜桥。

贺胜桥的位置在粤汉铁路线上，距离汀泗桥北约30华里。

就在第四军猛打汀泗桥之际，吴佩孚亲自率领他的“赵子龙”刘玉春部队，以及张占鳌、靳云鹗各师南下急行增援。可当他们赶到贺胜桥的时候，闻讯汀泗桥已经失守。随后，吴佩孚看到溃败的直军如同溃堤的潮水奔流而下，涌向贺胜桥车站。吴佩孚连忙收容由汀泗桥败退而来的孙建业、陈嘉谟残部，据守贺胜桥一带，凭险固守，企图抵抗。

吴佩孚的战时总指挥部就设立在贺胜桥车站的火车上。“吴

1 李新总编、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在汀泗桥西山为牺牲的北伐烈士修建了烈士墓、烈士纪念碑、纪念亭。纪念碑碑文由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1879—1936)题写。碑文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1988年1月1日，国务院将汀泗桥定为“北伐汀泗桥战役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叶剑英元帅题字：“北伐先锋”。

2 民国廿六年《民族杂志》第五卷第一期至第八期合订本。陈公博写于1936年的《军中琐记》，p406。

佩孚在火车上督战，以手持大刀之卫队团往来压阵，后退者杀。敌军以前进、后退均死，故亦拼命搏斗。”¹

据被俘的直系俘虏说：“吴佩孚亲自在贺胜桥督战，下令官兵不准后退，退却者格杀勿论。唯官兵不听，纷纷溃退。吴佩孚遂命将机枪架在桥头，向退却者扫射，桥上积尸累累。”²

8月30日拂晓，叶挺独立团在杨林塘猛攻，突入敌人主阵地，很快突破敌方防线，向桃林铺纵深攻击前进。吴佩孚部则从侧翼友军阵地反击，企图对叶挺独立团实施包围。就在此时，黄琪翔率领的第36团、第十师蔡廷锴的第28团适时增援，协力抗敌，突破吴佩孚部桃林铺防线，向贺胜桥发展进攻。随后，李宗仁的第七军攻占王本立后，也迅即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这样，北伐军的整个战线向前推进，犹如一条翻滚的火龙，紧紧地把吴佩孚的部队缠住。

“黄琪翔团沿铁路两侧向北挺进，总预备队第十师赶到加入作战，敌退守第二阵地，利用坚固工事节节抵抗。激战至深夜，敌阵又被攻破，敌军纷乱向贺胜桥逃走。吴佩孚手刃后退之旅团营长数名，斩首高悬桥上，亦不能制止。所乘火车被四军炮兵击中，毁车数节，吴（佩孚）惊骇，知大势已去，急开（火）车北遁。”³

至此，吴佩孚部在正面战场失利，再加上侧背受到猛烈攻击，全线动摇。吴佩孚的督战队连杀了数位旅团营级军官，仍不能挽回败局。眼见大势已去的吴佩孚只得乘着破损的专列仓皇逃往武昌，手下军队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溃退。北伐军的部队乘胜掩杀过来，未及撤退的吴佩孚兵卒于是被包围缴械。

30日上午，北伐军彻底攻占了贺胜桥。

张发奎说：“攻打贺胜桥容易多了，它的地形与汀泗桥大不相同。那儿也有一座铁路桥，但我们不必先拿下它。白泥湖水浅，

1 《中外杂志》第40卷第2期至第4期（1986年8月—10月），载缪培基的文章《张发奎与铁军之兴衰》，p61。

2 《黄琪翔传》，p23。

3 《中外杂志》第40卷第2期至第4期（1986年8月—10月），载缪培基的文章《张发奎与铁军之兴衰》，p61。

我们不费事就过了河。此役毙敌 1000 余，俘敌军官 159 人，兵 2386 人，缴获大炮 20 门，机枪 30 挺，步枪 2000 余支。敌人在车站遗下粮食尤多，殆如山积。我军伤亡 497 人。”¹

贺胜桥之役之所以打得如此顺利，除了地理原因之外，最主要因素就是吴佩孚部队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他们之所以还能进行一些抵抗，是因为吴佩孚的军刀架在官兵们脖子后面，不打就要杀头；等到吴佩孚逃走之后，他们又发觉自己来不及撤退了，不敢再逃跑，因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师的部队已经切断了他们的退路。他们就这样成了瓮中之鳖，网中之鱼，只有举手投降路一条。

黄琪翔部队通过战场时，看见贺胜桥头大柳树上用铁丝悬挂着三颗血淋淋的头颅，其中一个，还附有旅长军衔标志，毫无疑问，那就是旅长余荫森的头颅。贺胜桥桥上，也是尸体累累，堆积如同小山丘一样。大部分是被敌军自己击毙的，也有不少是被大刀砍伤的。守军赵荣华带着大刀队前来督战，那些被大刀砍杀的，就是临战后退的士兵。还有些将死未死的敌军士兵，倒在地上喘着气，仍在哀嚎着，场面十分凄惨。

8 月 31 日，敌将刘玉春逃到武汉，开始清点人数，结果只剩下总计不满 1.2 万名，皆是从汀泗桥、贺胜桥苦战脱归者，“服装不全，器械不足，一时诸将惟有相对痛哭而已。”²

敌军士气萎靡不振，进攻方必须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这是兵家的常识。

8 月 31 日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下令，对贺胜桥溃败之敌展开全面追击。第十师沿铁路向前追击。当晚，前锋第十师第十九团已经追至武昌城外洪山，主力进抵李家桥。而此时的第四军张发奎十二师暂留贺胜桥，原因是“张发奎师已血战一昼夜，亟需休息，遂由陈铭枢向北穷追。”³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65。

2 民国十九年本，刘玉春《百战归田录》卷二，p12。

3 《中外杂志》第 40 卷第 2 期至第 4 期（1986 年 8 月—10 月），缪培基的文章《张发奎与铁军之兴衰》。

号称“常胜将军”的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雄踞中原，声势显赫，向来不把对手放在眼里，因此骄傲自大。他视北伐军是南蛮子的部队，虽不敢轻视，而且自己还亲自上战场督战，以为凭借自己身经百战的经历可以痛击北伐军。岂料只数天之内，其以30万大军对抗10万之师，一败平江城，再败汀泗桥，三败贺胜桥，居然被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仓忙逃窜。老帅吴佩孚的狼狈之状就可以想见了。张发奎的第十二师，也因其骁勇善战，为北伐战争历史写下了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而黄琪翔率领的第36团，获得的荣誉自当是大功之中的首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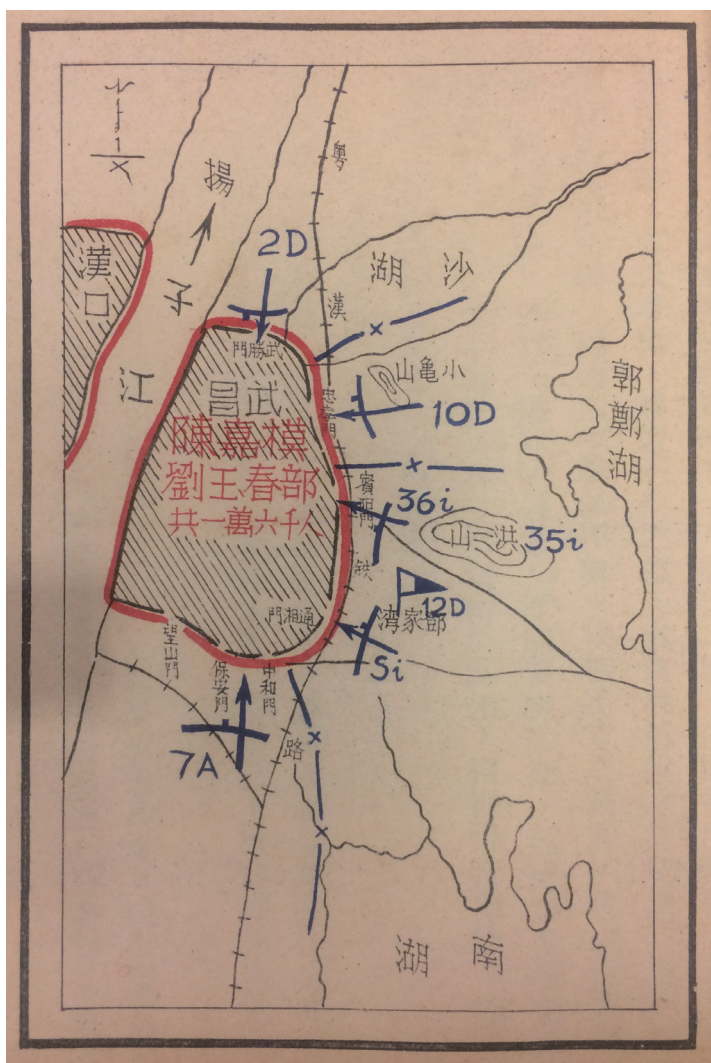
三、攻克武昌城

北伐军由广东、湖南进入湖北境内后一路高歌猛进，直捣武昌城下。这里是吴佩孚军在南方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座军事堡垒。吴佩孚军决意殊死抵抗。

北伐军总司令部希望尽快拿下武昌城，以便腾出部队前往江西，因为五省联军的孙传芳部队已经蠢蠢欲动——北伐军的目标，是在战胜吴佩孚之后，就去解决军阀孙传芳。孙传芳当时还控制着赣、闽、浙、皖、苏五省大部分地区。孙传芳当然也懂得兔死狐悲的道理，所以他一直暗中与吴佩孚相互策应，相互支援。

根据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的北伐军“初期进攻武昌城配备图”，可见黄琪翔率领的第36团，被布防在武昌城宾阳门下。宾阳门是武昌城东面最重要的一座城门，俗称“大东门”。黄琪翔第36团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北伐军包围武昌城的战场核心。实际上，攻城军分为左右两翼，左翼由李宗仁指挥，右翼归陈可钰指挥。张发奎师的任务是攻击宾阳门至忠孝门一线，以黄琪翔36团与叶挺独立团为攻城军，缪培南团为总预备队。

北伐军进入阵地后，敌军刚撤退，他们的通讯兵来不及收回电话线，结果被北伐军的通讯兵加以利用。一摇电话，居然打到了武昌城里。这边问：“在哪里？”对方答：“督办署。”又问：“吴大帅在哪里？”对方答：“上城楼巡城防去了。”这可是一



初期进攻武昌城配备略图

条极为重要的情报，说明吴佩孚也在北伐军的包围圈里，于是逐级上报。

武昌城的城墙高大巍峨，坚固无比。城外还有壕沟环绕，其水深没顶。从客观条件上看，它的确易守难攻。但据此前的情报说，直系守卫武昌城的军队士气已经非常低落，看样子像不敢再次作战了，所以李宗仁和陈可钰两位攻城总指挥决定，一鼓作气，立即乘胜攻击武昌城。

北伐军大规模攻击武昌城的战斗前后一共有三次，他们所使用的战术非常老套，就是采用梯子攀爬的方法。因为在此前的东江之役，也是采用架云梯的办法攻城取胜。

8月31日的黄昏，当夜幕降临后，第一次攻城作战开始。李宗仁和陈可钰两位攻城总指挥莅临前线，亲眼看见己方的士兵们扛着从民间征集来的数百个木梯，然后在军官一声号令之下，一哄而上。无奈民间的木梯太过短小，不及城墙的上端。而守军早有准备，居高临下，用火照明，机关枪一阵射击，攻城的战士就像一个个活靶子一样，不被打死，也被摔伤，导致伤亡极其惨重。北伐军这才发现守军主帅刘玉春固守城池的决心坚如磐石，令两位指挥官大出意料，十分焦虑。

随后，叶挺率领第四军独立团开始尝试挖地道，试图绕到守军的后背去攻城。按照预先设计，如果地道挖不成，则可用炸药炸毁武昌城的某段城墙，形成进攻缺口，再从地面攻击。当时，林彪就是叶挺独立团的一位连长。他们先把列车的两节车厢用钢板包裹住，作为护身铁甲，然后用火车头推动到东湘门下，一批战士跳下铁甲挖坑，而铁甲车厢里的火力予以掩护。第一军黄埔军校的工兵们，也参加了这一战斗。可是，城中守军很快发觉北伐军的企图，派出3000人冲出通湘门与北伐军激战。尽管出城的敌军大部被歼灭，但北伐军采用如此进攻战术的几次努力也均告无效。

第一次攻击武昌城的行动遭遇失败后，攻城总指挥李宗仁和副总指挥陈可钰改变战术，邀请农民用毛竹来捆扎云梯，以克服民间木梯过短的缺陷。

李宗仁回忆说：“第二次大规模攻城于9月3日晨3时开始，先由炮兵以猛烈炮火轰射城上守军，然后奋勇队携竹梯蚁附而上，不料城内敌人并楚望山、蛇山、龟山上所设的敌军山、野炮和江中敌舰枪炮一时俱发，火力猛烈之至。我军伤亡甚大而奏功甚小。”¹

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宗仁回忆录》，p286。

第二次攻城再次失败。

经历过两次失败之后，李宗仁认识到不能硬攻武昌城，必须动动脑筋采取其他的办法，否则战士牺牲太大。他派人去与守卫汉口的敌湖北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刘佐龙（1874—1936）暗通款曲，而刘佐龙发现北伐军锐不可当，也表示愿意投诚。李宗仁就准备采取对守卫武昌城的刘玉春实行围而不攻的战法，饿死他。



蒋介石

9月4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抵达前线，在南湖召开军事会议。南湖位于武昌城外的西南方向，是武汉仅次于东湖的第二大湖。

蒋介石在南湖会议上坚持己见，还在说鉴于情报显示，被围困在城里刘玉春部队虽然是吴佩孚的精锐，但士兵的战斗士气已经十分低落，我们应该一鼓作气迅速打进去，所以蒋介石依旧坚持采用架云梯的传统战术攻城。其他将领们也都求胜心切，支持总司令的建议。蒋介石就下令挑选志愿战士，组建攀爬城墙的敢死队。蒋介石承诺：“悬赏登上城垣的，官长二百元，士兵一百元，最先登上的部队三万元。”¹李宗仁对此表示失望。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跟随蒋介石来到前线，负责组织农民和士兵扎云梯的工作。邓演达命令，必须在明天早上5点之前把云梯全部扎起来，以助攻城之用。

张发奎回忆说：“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第七军、第四军和第一军第二师挑选一批士兵攻城，每个师都负责组建一个攻城营。我下令三个团长各挑选一个连，由各团长指定一名军官率领。敢死队是长官挑选的，但若非自愿，不会编入。他们必须是勇士，我指定了最勇敢善战、最足智多谋的军官欧震指挥这个攻城营，

1 广西师范出版社2005年版《李宗仁回忆录》，p287。

并着手准备竹梯。”¹ 张发奎说的攻城敢死队，与李宗仁说的奋勇队，是一回事。

第三次攻城于9月5日凌晨3时开始。黄琪翔36团组建的敢死队开始攻城。守军只要把竹梯用力一推，敢死队员们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高空坠落下来，或者，一阵机枪扫射，一长串的战士滚落下来。这样连续发起了两轮攻城行动，均告失败，而造成攻城官兵的伤亡率竟然高达三分之一。

缪培基说：“五日晨三时，黄（琪翔）团奋勇队偷渡壕沟至城脚，冒着敌炮火，架设竹梯，攀登城垣，被敌以机关枪扫射，官兵前赴后继，牺牲壮烈。剧战一小时，终因敌位置优越，火力炽盛，而不能达目的，乃停止进攻。叶挺团在弹如雨下中，以奋勇队挺进至城脚，竖竹梯登城，伤亡数十人，亦迫得停止。”²

蒋介石没有听从李宗仁的劝告而组织了第三次攻城行动，李宗仁对此十分愤懑。他说：“蒋先生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武昌第三次攻城之举，把他个人的弱点暴露无遗。蒋先生这种个性可说是他个人成功的因素，也可说是国事糟乱的种子。”³

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光是蒋介石，其他的北伐军指挥官们也很着急，包括李宗仁的搭档白崇禧也是如此。白崇禧回忆说：“我方久攻不下，爬城也不成功，知不可力攻，不然损失太大。请随军之俄国顾问加伦将军，派俄机轰炸城内蛇山之敌人炮兵阵地，及无线电台，但是俄机或借口雨天，或雾天，或有风天，总不肯起飞。我们屡屡催促加伦将军，加伦将军说，（苏联）红军之飞机在国内都是天之骄子，出外更是不听指挥。当时之俄机，全由俄籍技师驾驶，技术很差，既无仪器指挥，全凭眼睛观察。”⁴

俄机不仅不听指挥，其水平也确实不敢恭维，还发生过这样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65。

2 《中外杂志》第40卷第2期至第4期（1986年8月—10月），缪培基的文章《张发奎与铁军之兴衰》，p55。

3 《李宗仁回忆录》，p287。

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29。

的笑话：有一次十余驾苏联红军飞机从广州起飞至长沙，结果有的飞机在宝庆就降落了，甚至还有一架飞机到江西吉安敌人的阵地上迫降。中国人更不懂飞机，孙传芳部下的方本仁、邓如琢更是没有看到过飞机，居然用大麻绳系着飞机，像防止牲口逃跑那样防止飞机起飞。甚至，就在北伐军攻城武昌时，白崇禧去江西指挥北伐军第七军横渡赣江，突然俄机飞来上空助战，结果猛烈扫射了自己的部队，令第七军死伤者不少。这些都是白崇禧在自述中讲述的真实故事。

在北伐军进攻武昌城最激烈的时候，终于盼来了两架俄机前来助战。那两驾飞机投下的炸弹，竟然是用铁丝捆绑的，只有 25 磅重（约合 11.34 千克）。虽然气势上有点唬人，但收效甚微。白崇禧沮丧地说：“从此我知（苏联）红军飞机作战能力差，以后很少依赖他们。”¹

武昌城还未攻下之际，孙传芳已感觉到唇亡齿寒的忧虑，调动其精锐部队谢鸿勋（1878—1926）等五个师从江西方向进扰湘鄂边境。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李宗仁的第七军，迅速从武昌城下撤出，迎头疾进。陈可钰至此替代李宗仁，担任武昌攻城军的总指挥，攻城的任务自然又落在第四军的肩头。此后的策略是封锁各城门，围而不攻，等待守军弹尽粮绝之际，再行攻击。

9月6日，位于查家墩的敌军司令部遭受到龟山刘佐龙部的炮击。吴佩孚打电话给刘佐龙问“怎么回事？”刘佐龙答是“打错了。”可是在通话还没有结束时，又遭炮击，吴佩孚就挖苦刘佐龙说：“现在又该打错了吧？”刘未答。吴佩孚此时已经知道刘佐龙投诚，感觉大势已去，就对刘玉春说：“我决不放弃武昌。我吴佩孚死在战场上比死在床上好。”²

刘玉春当即跪下，对吴佩孚说，“我愿代大帅守武昌。我死了不算什么。”吴佩孚很感动，又很无奈，这才悻悻然跳上了京

1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29。

2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陕西出版集团 2007 年 11 月版，p117。

汉列车，向北而去，而刘玉春也不食誓言，困守孤城 45 天，决不投降。

最后克敌武昌城，得益于敌军内部的分裂。由于武昌守城副总司令吴俊卿献城投降，10 月 10 日午夜，他们打开了武昌城南边的保安门，而保安门位于唐生智所部的战线上，所以唐生智的部队最先进入武昌城，武昌城才告被攻克。敌军首脑“玉威将军”刘玉春、湖北督军陈嘉谟被俘。

攻克武昌城后不久，鉴于第十二师 36 团上校团长黄琪翔、独立团上校团长叶挺两人在北伐战争中的突出贡献，陈可钰报请北伐军总司令部，请求批准破格晋升为少将团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一请求——在整个北伐战争期间，仅有黄琪翔和叶挺俩人获得了这一殊荣。

武昌城被北伐军攻克后，武昌人民争相传颂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英勇事迹，赞誉他们为“铁军”。第四军的“铁军”称号也就是由此而来。后世有许多文章把“铁军”桂冠都戴在叶挺独立团头上，这不准确，事实上叶挺独立团只是“铁军”的一小部分而已。

第四军驻守武昌后，当地民众铸造铁质盾牌，其铭文曰：

烈士之血，主义之光；
四军伟绩，威震遐迩；
能守纪律，能毋怠惰；
能爱百姓，能爱国家；
摧锋陷阵，如铁之坚；
革命担负，为铁之肩；
功用若铁，人民倚焉；
愿寿如铁，垂亿万年。

北伐军总司令部面对孙传芳发动的江西攻势，先是命令李宗仁第七军迎头打击孙传芳的部队，随后命令第四军步其后尘也向



武汉民众赠献第四军的“铁军盾牌”之一。

江西挺进。

070

第四军进攻江西的部队由张发奎率领，“第十二师除留独立团、第十师留补充团及新兵一营留守武昌外，其余悉数由张（发奎）师长及十师蒋副师长光鼐率来江西武宁候命。”¹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留守武昌，而第十二师叶挺的独立团，在攻占武昌城时伤亡惨重，急需休整，也留在了武昌。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伐阵中日记》第二册。

黄琪翔说：“通过北伐军先后约三个月在湖南、湖北境内胜利作战的结果，大大地长了革命军的威风，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志气。我军于10月间收复了武汉。此时江西方面蒋介石亲率部队和孙传芳部队作战，胜负不决。于是第四军又开往江西，协助蒋介石的部队作战，使江西方面战局也得到了胜利的结束。”¹

10月20日，张发奎率领黄琪翔团、缪培南团、炮兵营及师直属部队，与第十师所属三团乘轮船进入江西，在石灰窑登陆。

按照战斗计划，11月1日，第四军与第七军联手发起总攻。第四军第十师的任务是切断南昌至九江的铁路。11月2日，白崇禧指挥第七军进攻德安，不料孙传芳的守军一触即溃，留下了一座空城。黄琪翔率部进攻孤山、骆驼山，则是敌军的主力部队。

“黄（琪翔）团……全线奋勇推进，战况剧烈，黄团一营长阵亡。血战半日，占领孤山、骆驼山，（敌军）向德安溃退。”²

本来，黄琪翔率部占领孤山、骆驼山之后，他的任务是与第七军一起主攻德安，可眼见德安已是一座空城，黄琪翔就立即掉转头来打马迴岭，因为师长张发奎正率部攻打马迴岭，而且交火十分激烈。

其实，孙传芳守军的作战方案是把德安作为诱饵，将自己的主力三个混成旅布防在德安至马迴岭一线，待北伐军进入其包围圈后，再给予侧击。³

黄琪翔赶到马迴岭时，没有见到自己的师长张发奎，却碰到北伐军代理总参谋长白崇禧。白崇禧回忆说：“四日拂晓各部队攻击前进，战况激烈，优势孙（传芳）军猛扑我军左翼，此时第四军黄琪翔团赶到，我正在督战。初次看见黄琪翔，人漂亮而活泼，我要他的团做预备队。他看左翼动摇即自动请求加入支援。我讲：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中外杂志》第40卷第2期至第4期（1986年8月—10月），载缪培基的文章《张发奎与铁军之兴衰》。

3 《黄琪翔传》中说，黄琪翔第三十六团为左翼，佯装向德安方向进攻，待到达聂桥时转向进攻回马岭。《张发奎口述自传》中说，“1926年11月3日，黄琪翔攻占德安后，我叫他把德安移交给李宗仁的第七军，然后同我一起进攻回马岭。11月4日，在遭受重创后，我们攻下了回马岭。”事实上，德安是一座空城。

‘你等一下。’我们看敌人与我左翼部队进退几次，他又要求加入作战。我要他迂回到敌人右翼侧背突击。他得了命令，立即吹号集合。这团人动作很快，他立即带着（部队）迂回（到）敌右翼，我看他指挥活泼灵活，作战勇敢，觉得他是好的团长，很赏识他。不久黄团迂回成功，敌阵动摇败退。此时还有继续乘火车来的敌人，看到前头败了，跟着也败下去了。我军分途追击，四日夜在江横村一带停止。于是左翼军攻德安、马迴岭切断南浔路之任务完成。”¹黄琪翔团在马迴岭战役中所起的作用，确实给白崇禧带来了意外之喜。

这是白崇禧第一次认识黄琪翔。他对黄琪翔英俊的仪表、开朗的性格、作战的勇猛，以及突出的指挥能力，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8日，张发奎向北伐军总司令部报告：第四军第十二师“攻击万家隆之敌业接触。右翼（第）七军未能协同，左翼贺（龙）师长前进迟缓，于是敌得协以谋我。幸我黄（琪翔）团将德安城北之敌击溃，占领德安城。缪（培南）团复将九江开来敌援击溃，复增加范团进攻马迴岭。激战至暮，将马迴岭以南一带高地完全占领。激战竟夜，至八（日）晨八时，（我军）占领回马岭，将附近残敌肃清。”²战斗结束后，张发奎带领第十二师又向一个叫星子的地方追击。

在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的指挥下，第四军及第七军大部向江西九江方向进发³，不久，程潜带领第六军赶来接替，于是张发奎率领的第四军完成了任务。11月19日，张发奎率部重新坐轮船返回武昌。

北伐军攻占武昌城是一个战略性的胜利。至此，北方军阀吴佩孚的实力大损，兵力所剩无几。前内阁总理靳云鹏的弟弟、河南省长靳云鄂（1881—1935）暗中投靠蒋介石，开始与北伐军媾

1 《白崇禧口述自传》（下），p526。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伐阵中日记》第二册。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伐阵中日记》第二册。

和以逼迫吴佩孚下野。之后北伐军又占领了江西，五省联军孙传芳的部队也损失过半。北伐军实力大增，开始主导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1927年4月，吴佩孚被彻底打败，只得率残部逃往四川托庇于杨森，而孙传芳也从此一蹶不振。

请注意，黄琪翔因为北伐战争的出色战绩，就是此时，从团长破格晋升为副军长，年仅28岁。

面对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所有人都为之欢欣鼓舞，开怀畅饮，连信奉伊斯兰教的白崇禧也不例外。攻克南昌后，白崇禧出任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他回忆道：“我发表为前敌总指挥之后，朱培德、唐生智、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重要将领在南昌为我饯行。我向来不饮酒，当晚因众人热烈招待，我饮了一瓶白兰地，众人大为惊奇。我生平不饮酒，一则因为信奉回教之故；一则因为我八岁时，在私塾读书，孔子圣诞，同学们饮酒庆祝，我喝得酩酊大醉，一晚毫无知觉。事后，先母严厉告诫，从此我滴酒不沾。南昌饯行是破了戒。”¹可见当时北伐军将领们的欢欣情形。北伐战争的胜利，也使将领们品尝到政治工作的厉害。白崇禧说：北伐“革命军以两广为基础，枪不过五万，人亦只十万，而竟击败至少力量大我十倍，训练装备亦较我为精之孙传芳、吴佩孚军队，此无他，政治训练之功也。”²所谓政治，乃是思想“鼓吹”之功，但其核心仍然是实力，即战斗力。战斗力决定战争的胜负，决定权利的归属，也能决定军人职务的高低大小。

战场上获得了胜利，士兵们要得到奖赏，军官们要得到晋升，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黄琪翔回忆说：“由于我军在湖南、湖北境内和吴佩孚军作战胜利的结果，俘获甚多，包括人员和装备。于是第四军迅速壮大，将二个师扩充为两个军，即一个以十二师为基础，编为第四军，张发奎为军长，我为副军长；另一个以第十师为基础，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为军长，蒋光鼐为副军长。”³

1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34。

2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p309。

3 黄琪翔《我的自述》。

黄琪翔在此隐晦了重要一点，即，1927年1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在唐生智第八军疯狂扩军的影响下¹，战功卓著的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心生不平，认为军政当局一碗水没有端平，不甘心自己继续当师长，于是张发奎提出自己也要做军长，而且是“铁军”第四军的军长。因为唐生智率领的“第八军直至汉口，几乎未接一仗。”²

谁也不是傻子，大家的眼睛雪亮。李宗仁对于唐生智的做法也看不下去，他当面指责唐生智破坏革命军的制度，说：“我们革命军怎么可以任意扩充部队，这还成什么体统呢？”

唐生智苦笑着回答说：“德邻兄，我没有办法啊！部下都有战功，大家都应该升一升才好啊！”

李宗仁说：“若论战功，我们（第）四、七两军远在八军之上，假若论功行赏，我们都要升起官来，哪有许多官可升呢？”唐氏闻言语塞，支吾其词了事。³



李宗仁

张发奎的顶头上司、原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也不甘心，在他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各将领协商后，遂决定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7年初，根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原第四军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琪翔兼任第十二师师长，随后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原第四军第十师扩编

1 1927年初，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制审查委员会委员长的唐生智，又任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于是利用权力将自己原第八军大肆扩充为四个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十二军军长叶琪、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六万人，控制了两湖的军政大权，其权利欲望和政治野心也不断膨胀。

2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6月版《口述历史·军系与民国政局》之“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p68。

3 《李宗仁回忆录》，p287。

为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司令；蒋光鼐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返回广东；原留守广东的第四、第五军，则改编为第八路军。

此时，新成立的张发奎第四军、陈铭枢的第十一军联手驻防武汉。武汉当时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以国民党左派势力汪精卫为首，其尚在拥护和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张发奎第四军、陈铭枢第十一军也就成为拱卫武汉汪精卫政府最重要的军事支柱。



北伐战争时期的“五虎将”。右起：黄琪翔、陈铭枢、郭沫若、张发奎、叶挺。摄于1938年3月底汉口。

第四章

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

一、北伐河南

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后，蒋介石成为大赢家，他的影响力和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扩展。

此时，在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关于如何对待北伐战争中的蒋介石？共产党内部产生混乱。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第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张国焘在主持会议中，彭述之主张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张国焘说，（第三）国际的意见是创造有利北伐的形势，如果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蒋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势。彭述之认为支持北伐与削蒋不是一回事。最后，形成了一个在北伐中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的模棱两可的决议。”¹ 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对立意见造成了党的目标的混乱。

同年12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誉为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的布哈林代表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中国委员会的大会发言中指出：“土地改革问题或土地革命问题决定了向下一个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过渡……我们现在正处在从革命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前夕，因此土地问题具有紧迫

1 朱洪著《陈独秀》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p139。

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在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无疑选择农民。”同月，陈独秀闻风而动，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上主张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归给农民。”¹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武装农民，用武力夺取政权。

1927年初，革命的浪潮风卷全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城市里的工人团结在工会组织麾下，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要求涨工资，“已致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农村的农民则团结在农会周围，提出了土地的要求，“不仅斗争大地主，连小地主、自耕农也不放过，要将他们的土地籍没充公”。极右势力的代表李宗仁对此极为愤怒。李宗仁回忆说：“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连蔬菜都不易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共产党）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呈现出一种狂热奔放，但是却十分不合理的现象。”²李宗仁曾经对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说：“你说工人罢工就叫做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邓演达的解释是：“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终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³

2月至3月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次工人起义相继在上海爆发。蒋介石当然感受到自己的危机，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开始准备武力镇压。在这种情况下，4月1日，汪精卫取道莫斯科返回国内。

4月2日，汪精卫来到上海。当时，汪精卫享有极高的威望。李宗仁说：“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二。”李宗仁和白崇禧跑到汪精卫的寓所，那时众多的要人已经在那里。李宗仁回忆说：“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

1 朱洪著《陈独秀》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p151。

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李宗仁回忆录》，p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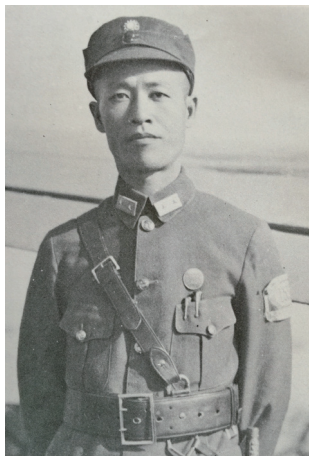
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李宗仁回忆录》，p330。

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¹随后，在留沪中央执监委的会议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给汪精卫下跪，请求制裁和抑制共产党的“越轨”行动。“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²

国民政府内部因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一分为二，汪精卫和蒋介石所代表的不同力量因此而决裂，北伐战争也陷于停顿。汪精卫在武汉成立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左倾国民政府，蒋介石则走反革命路线。于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决心“清党”，名义上是把共产党清理出国民党队伍，实则是对共产党进行扼杀。

黄琪翔回忆说：“北伐军到武汉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已开始反共。”“蒋介石开始反共后，武汉方面，国共虽然仍在合作，但影响所及，国民党右派势力逐渐抬头。同时，汪精卫由苏联回到武汉后，与当时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合流，破坏革命，将第三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计划公开出来，其中包括土地改革、武装工农及争取军队等内容，大事挑拨国共关系。”但是，对黄琪翔而言，他的部队依旧在和共产党合作，他说：“我当时思想上没有触动。”³

需要指出的是，黄琪翔以上所说“第三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计划”，是指“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信，并不是陈独秀泄露的，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轻信汪精卫，主动将俄文原稿与中文译文交给汪精卫，直接导致汪精卫与武汉政府的“分共”。此事与陈独秀无关。



李汉魂

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版《李宗仁回忆录》，p345。

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版《李宗仁回忆录》，p346。

3 黄琪翔《我的自述》。

而早在1927年1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黄琪翔此时升任第四军副军长，兼任第十二师师长，其36团团长的参谋处长李汉魂接任。

1927年4月9日，蒋介石在位于上海龙华镇的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所谓“清党”会议，参加者有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陈果夫等人。蒋介石当时对于是否要大肆扑杀共产党人还顾虑重重，白崇禧则挺身说：“你们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们不干，我白某人一个人也要干。我马上就要从我的防区内杀起！”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代表的新桂系不仅推动了“清党”，也比上海屠杀共产党人提前了三天。¹

蒋介石这才下定决心“清党”，任命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白崇禧为上海戒严司令，第26军军长周凤岐（1879—1938）为戒严副司令，磨刀霍霍，做好了镇压共产党人的准备。

4月11日晚，上海三大帮会头子之一、青帮帮主杜月笙（1888—1951），充当国民党“清党”的马前卒。他先是把共产党人、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骗到自己家中，然后将其打昏，装进麻袋活埋了。

4月12日凌晨，在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副司令周凤岐、国民党上海警备区特务处长杨虎（1889—1966）、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1890—1945）的指挥下，国民党第26军和第1军第2师的武装军人，开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顿时血流成河。

上海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立即引发全国的愤怒。国共合作的武汉汪精卫政府，顺应民众的呼声，下令免去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职务，于是国民党内“一党两府”，即蒋介石所代表的南京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形成了相互对抗的局面。

武汉汪精卫政府随即发现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联合川、黔、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82。

粤、桂等省的军阀势力，从东、南、西三方面形成对武汉的军事包围之势。在北方，张作霖进兵河南，觊觎武汉。尤其是武汉面临的经济封锁，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武汉政府顿时感受到自己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必须要摆脱困境。

如何摆脱困境？武汉政府的高层发生了意见分歧。唐生智、张发奎等军事将领主张东征讨蒋，而汪精卫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则主张继续北伐。汪、鲍的设想是，立即进军河南，可以把冯玉祥的军队从陕西接应出来，在河南会师，形成合力后再驱逐奉军出京、津，然后挥师南下，解决蒋介石的另立中央、违背党组织纪律、“清党”等问题。

武汉政府之所以敢于继续北伐，实仰仗于身边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两个军是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支柱。可是在武汉政府的军事力量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歧。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表示支持国民党“清党”，拥护蒋介石，而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则代表左倾力量，拥护汪精卫，反对蒋介石。3月6日，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因武汉的反蒋空气浓厚而负气离汉，赴南京，投奔蒋介石，随后第十一军将领蒋光鼐、戴戟、杨其昌等亦相继挂冠而去，追随陈铭枢去了。

武汉政府借机改编国民革命军，任命唐生智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并兼任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的副军长位置开缺后，朱晖日升任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后来升为军长。

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出师讨伐奉系张作霖，这一决策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拥护。武昌南湖机场举行50万人参加的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场面宏大，气势甚为壮观。

在誓师典礼大会上，汪精卫登上高台，慷慨激昂地说：“把革命的势力，扩充到北京，统一全中国，将帝国主义在北部的最大锁链打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势力完全扫除，这是我们此次北伐的第一个目的。我们要使全国民众能得到解放，

必须要打倒奉系军阀，这是我们此次北伐的第二个目的。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尤必须要打倒本党的内奸蒋介石！这是北伐的第三个目的。”

北伐河南的主力军是张发奎和唐生智的部队，计六万多人，由唐生智任总指挥。4月21日，北伐军沿京汉路准备向河南开封进发。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亲自前往京汉铁路车站，将一篮鲜花赠送给第四军，祝愿他们战胜敌人。在宁汉对抗的情况下，宋氏家族当时也分成了两派，宋庆龄、宋子文支持武汉政府，而宋霭龄、宋美龄则拥护南京政府。

5月14日，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最先与奉军富双英部在上蔡接火。富双英部败下阵去，然后退守上蔡县城。第二天，黄琪翔率第十二师在上蔡城北十里铺与敌激战三昼夜，占领了东、西洪桥，对上蔡县城形成钳式攻势，最后迫使上蔡守军富双英率部投降。¹

黄琪翔回忆说：“为了打破当时的困难局面，1927年4月武汉政府决定第二次北伐，迎击由河南南下的奉军张作霖所部。5月间，我率第四军十二师作为先遣部队，首先进占河南驻马店。奉军第三、四方面军装备优良，兵力约5万余人，沿京汉铁路南下，在许昌漯河附近设防。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除了第八军一部外，主力为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杨其昌两个独立师。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临前线指挥。5月中，我军集结完毕后，开始北进，先声夺人，驻上蔡的奉军富双英师不战而降。我军在东、西洪桥附近与敌接触，敌军且战且退，直至逍遥镇、临颍地区，我军才和敌主力展开会战。这次战役，双方兵力约计8万余人。”²

在与张作霖部的接火中，不打不知道，一打才知道奉军的厉害。黄琪翔率领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已经与吴佩孚和孙传芳的部队交过手，相比之下，张作霖的奉军要比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厉害得多。这不仅是指奉军的武器装备精良，还有战术修养，

1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册，p450。

2 《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辑，黄琪翔文章《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都要优于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这次作战，提醒黄琪翔在以后的战斗中要格外小心。

黄琪翔对战场上敌方的指挥官都不陌生，原因是他们大都毕业于黄琪翔的母校保定军校。很多敌方的将校级军官，不是他的同学就是学生。那时黄埔军校刚成立不久，即使刚毕业的黄埔生已经参加战斗，也还是低级军官，还没有成长为高级将领。

5月17日，张发奎亲自率领第二十六师、第十二师与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共举进攻河南的古镇逍遥镇。5月24日，北伐军与奉军接火的地点，正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古战场。这一仗打下来，黄琪翔率领的部队大获全胜，生俘奉军团长王步锡以下的官兵500余人，威震中原。

攻占逍遥镇之后，黄琪翔率部继续向临颖方向挺进。在临颖附近，他们击落了奉军的两架侦察机。

当北伐军的部队兵临临颖城下，奉军早已经完成了军事工事的构筑，与北伐军对垒，摆出决一死战的态势。奉军的装备相当先进，他们不仅有空军，还有坦克和大口径火炮，这些重武器，北伐军都没有。奉军大帅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亲自在前线督战。

5月27日拂晓，黄琪翔率部首先进攻。奉军严阵以待，顽强防守，等到北伐军久攻不下已显露出疲惫之色，奉军果断反击。此时已近中午时分，北伐军机关枪炮兵连的士兵体力与意志开始不支，阵地松动，出现士兵后撤的情况。这是第四军北伐战争期间第一次出现后退的现象。

倘若这一缺口不能及时封堵住，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黄琪翔最先赶到前线，亲自参战，随后总指挥张发奎也加入进来。

黄琪翔打仗以勇猛著称，但他并不鲁莽。当他预判到部队可能出现垮塌的缺口时，黄琪翔会毫不犹豫地跃出战壕，亲自率领士兵们反冲锋。第十二师出身的将士们都知道一个老规矩，即粤军的连坐法：如果部队临阵败退，首先会枪毙这个队伍的最高首

长，然后依次枪毙下去，直到班长——士兵则不会被枪毙，因为在战斗中，班长就有权利枪毙临阵后退的士兵。而粤军的军官如果战死，其家属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如果军官因临阵逃跑而被枪毙，军官就等于白白送死，什么也得不到。眼下，官兵们看到连黄琪翔将军都冲锋在前，就明白了战况的危急程度。即使你明知道自己冲在前面必死，你也必须死在冲锋的路上！

受此鼓舞，第十二师的军官也跃然而起，率领士兵们一鼓作气冲上去，堵住了被奉军撕裂的缺口。激战至下午三时，部队伤亡甚大，正在此危急关头，第十师赶到增援，而奉军的意志也已到极限，黄琪翔率部掩杀过去，奉军至此溃败，张学良无奈只得率部向郑州方向逃窜。第十一军二十六师 77 团团长江先云（1902—1927）就是在此役中战死疆场。

蒋先云是共产党员，当时还身兼 77 团的党代表，战死时年方 25 岁。¹第 76 团的沈参谋长也战死。第 34 团团长江奇伟、第 76 团团长江久成负伤。黄琪翔手下死伤的北伐军军官多达 40 余人，这也是黄琪翔带领部队参加北伐战争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

临颍战役中，奉军炮兵团长李恒华率部投降。李恒华是保定军校炮科八期的学生，与陈诚是同学，也是黄琪翔的学生。奉军炮兵团的装备显然优于北伐军，他们不仅有山炮，还有野战炮，于是第四军淘汰了自己的机关枪炮兵营，因为他们下属的连队在这次战斗中有后退的劣迹，同时，第四军组建了新的炮兵部队。张发奎认为这是临颍战役的意外收获。

北伐军第一次缴获了奉军的坦克 4 辆。可是北伐军中没人懂得坦克，更没人会驾驶，这些笨重的铁家伙就成为了 4 件大摆设。黄琪翔与张发奎商量后，决定把缴获的奉军这 4 辆坦克上交给武汉政府的军委会。张发奎在奉军坦克前摆出胜利者的姿势，合影

1 1927 年 6 月 8 日，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操场，中共中央为蒋先云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武汉国民政府要员，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以及各界人士 6 万余人参加追悼会。周恩来主持追悼会并发表沉痛讲话，恽代英致悼词，罗章龙宣读悼亡诗。也是在这一年，蒋先云之妻李祇欣（1906—1927）亦病故于武昌红十字医院，年仅 22 岁。

留念。

张发奎在自传中总结说：“临颍之战是我部在第二次北伐中所经历的一次最残酷的战役。奉军出动了第十军王树棠全军，第十七、第八军及飞机坦克共十万余官兵，我军仅黄琪翔指挥不足额的十二、第二十六师；敌方兵力十倍于我，且有良好的工事与优秀的兵器。我与黄琪翔亲临前线指挥，敌方集中火力，弹如雨下，我军始终坚守阵地。自27日拂晓至28日下午，血战两日，冲击敌阵几次，攻克临颍。此役缴获步枪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机枪五挺、坦克车四辆，军品无算。此役击溃了张学良部的主力，使我们得以进军开封。”¹

部队向开封挺进的途中，半路上遇见一位瞎子。瞎子手里的竹制拐棍中暗藏玄机：用刀劈开竹棍时，可见内藏一封情报：原来是开封商会的信。信中说，张学良的部下、奉军第37旅旅长、开封警备司令何柱国已经撤退，开封已成空城。河南人民欢迎北伐军！

张发奎和黄琪翔看到这位旅长的名字时都笑了，因为何柱国是广东陆军小学第五期学生、是他们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校乃至保定军校的同学——张发奎没有读完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校的学业就离校了，而黄琪翔与何柱国继续到保定军校深造，俩人同窗共七年！

6月5日，张发奎和黄琪翔整顿了部队，率先进入开封城，然后与随后进城的冯玉祥会师。

冯玉祥看见张发奎后，对北伐军表示钦佩。他说：“你们南方人两条腿比我的马队跑得还快！”

6月7日，黄琪翔奉命离开开封，经郑州南下，就此把将士们用命拼打下来的河南地盘送给了冯玉祥，期望他对蒋介石势力形成钳制，以解武汉国民政府之困。

黄琪翔说：“第二次北伐战役，我军付出了1万余人伤亡的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86。

代价，击退了奉军，把河南地盘无条件地交给了冯玉祥。6月间，奉命开回武汉。此时我们对于所谓国共纠纷已有疑虑。当军队列车开到郑州的时候，汪精卫、孙科、邓演达等乘坐的专车也恰好停在该站。我下车找邓演达谈话。邓说他们此行是专为迎接冯玉祥到武汉去开会的。这说明他们对于冯玉祥仍寄予希望。我回到武汉后知道，冯玉祥拒绝到武汉，就在郑州开了一次会议。对郑州会议的内容，当时我们毫无所知，但冯玉祥已开始反攻，对武汉政府表示不满，则逐渐成为公开的事实。冯玉祥从此不再支持武汉政府了，他不久竟往徐州和蒋介石会见。这样，武汉政府迅速趋于瓦解。很明显，汪精卫和冯玉祥的行动都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连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也完全没有预料到。国共分裂终于成为事实了。”¹

三天后，1927年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武汉方面代表赞扬冯玉祥及其他的第二集团军功绩，谴责蒋介石目无国民政府、独裁专横的行径，也指责共产党借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破坏国民革命。冯玉祥则提出，宁汉双方应消除私见，一致北伐，并提议遣送苏联顾问回国，均得到武汉方面同意。会议决定由冯玉祥指挥河南前线的全部军队，而要求已经深入河南的北伐军撤回武汉，前往湖南、湖北镇压工农暴动。这次会议，汪精卫集团部分地实现了联冯反蒋分共的目的。

6月12日，郑州会议结束后，唐生智命令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回师武汉。

对于这样的命令，张发奎、黄琪翔等广东将领非常乐意，因为这两个军已经承受重大伤亡，急需休整与补充，而且他们的部下大多数是广东兵，不习惯干燥的北方气候与水土，许多人整天闹肚子，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于是张发奎带领着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回到武汉。

1 《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辑，黄琪翔文章《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二、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6月15日，武汉冒雨举行数万人大会，欢迎第二次参加北伐的将士凯旋。共产党人董必武、林祖涵（伯渠）担任欢迎大会主席团成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同日，国民政府通令第四军扩编为第二方面军，军长张发奎晋升为上将，担任总指挥，下辖黄琪翔第四军、朱晖日第十一军、贺龙第二十军等三个军。这是第四军历史上全盛时期。按照当时的编制，取消了旅级设置，师长直接管辖团长。

第四军的编制是：

军长黄琪翔。

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是在第四军抵达江西九江后才来军部到任。

第四军下辖三个师，即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第二十一师师长富双英。¹

在黄琪翔就职第四军军长的仪式



贺龙

¹ 《中外杂志》第40卷第2期至第4期（1986年8—10月），载缪培基的文章《张发奎与铁军之兴衰》。

上，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代表军事委员会亲临会场，宣布任命。邓演达是有名的演说家，与另一位口才极佳的共产党人恽代英齐名。邓演达高度赞扬了黄琪翔在北伐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赞誉黄琪翔是军人的楷模。

黄琪翔晋升为中将军长的消息受到广泛关注，社会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予以祝贺。全国农民协会、华侨协会总会、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别党部和军事委员会航空处党代表赵舒等，均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发来贺电。这一年，黄琪翔才 29 岁。

著名记者殷作桢¹后来回忆说：“北伐的时候。在某地，举行了一次作战部队的检阅。部队整齐地排列成一字形，无限的长，无论官长或士兵，个个精神抖擞，静待着检阅官的检阅。年青的英俊的检阅官，骑着肥硕的白色战马，威武地检阅着部队，革命的英勇气概，充分地溢扬在他的眉宇之间。他，就是第四军名将黄琪翔。”²

就在北伐军回到武汉不久的 6 月 19 日，冯玉祥突然变脸，竟然宣布与蒋介石结盟！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令所有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的军人们惊愕不已——为了迎接冯玉祥入豫，武汉方面的北伐军已经付出了 1 万余将士伤亡的代价，而冯玉祥如此出尔反尔，实在令人愤恨。作为一名职业军人，黄琪翔原来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在“思想上没有触动”，但经过这一次的突变，他才开始对政治问题保持警觉。

黄琪翔说：“1927 年 5 月间，武汉政府为挽救当时危局，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出兵迎击与蒋介石相勾结、由河南方面向武汉施行威胁的张作霖部队。我当时希望能够击败奉军，把冯玉祥的部队由西北调到河南来，巩（拱）卫武汉后方，再行与蒋介石作战。六月间在河南境内果然击败了奉军，将冯玉祥的部队接了出来。不料冯玉祥此时亦已开始反共，一到河南，便趁机东进，

1 殷作桢（1908—？）浙江平阳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广州分校）中校政治教官，后任台湾《成功日报》总主笔兼总编辑。

2 1938 年《苦斗》杂志第二卷第 7 期，殷作桢文章《黄琪翔将军访问记》。

与蒋介石在徐州见面，结成反武汉同盟。我们在河南作战的时候，在部队里依然和共产党合作的，就是说，共产党员仍然在工作岗位上。战事结束以后，回到武汉，才发觉形势已经开始大变，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动摇，各军奉命在内部进行清（分）共。”¹

于此同时，汪精卫迫于压力，开始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开始“分共”，武汉中央通过了取缔共党案。汪精卫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是，汪精卫取缔共党的名称叫“分共”，蒋介石称之为“清共”。

但在黄琪翔的第四军里，却没有落实这一命令。黄琪翔说：由于“第四军在河南作战中损失很大，回到武汉后，首先引起注意的是如何赶紧补充人员，准备下次战役。对于清（分）共问题，并未引起很大的注意，也未执行清（分）共的奉命（令）。因为自从1926年由广东出发直到河南作战为止，（第）四军部队内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担任政治工作的，他们和军事指挥官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意见不和的事，也没有在政治方面发生过什么争论。他们中（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至于当时有些共产党员接到党的通知离开工作岗位的也是极个别的。第四军基本上没有进行清（分）共工作。”²

1927年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1886—1951）通电叛变。21日，何健部第三十五军33团团长沙克祥（1890—1964）在湖南叛变。两湖及江西的工农运动已遭严重摧残，湖北被杀害的农会会员4700余人，湖南被杀的农会会员达20000人。

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共中央被迫于7月13日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并发表对政局的宣言，斥责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要“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共产党方面早在何键部反共叛变之前，就已获悉了情报。1927年6月28日的前后一天，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出席。在会上，陈独秀报告了第35军何键部准备在汉口制造“反共”事变，于是会议决定，准备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调到武昌参加第四军。同时，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会后，周恩来、张太雷在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问题时，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下辖的贺龙、叶挺的部队里¹。当时贺龙是二十军军长，叶挺是十一军的代理军长。

7月14日夜，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再次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归失败。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左派有些不知所措，没有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倒是于右任与彭泽民发表了同情中共的讲话。没有参加会议的邓演达事后认清了汪精卫这位政客的嘴脸，他“宣告汪精卫政治生命已经终结”！²

武汉政府的“分共”，随后遇到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抗议。陈公博说在“重要的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他们是孙夫人宋庆龄、陈友仁和廖夫人何香凝，³其实武汉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彭泽民也坚决反对，但“分共”既成事实，已无法避免。

汪精卫“分共”时，没有学蒋介石、新桂系“清共”那样屠杀共产党人。张发奎回忆说：“汪精卫召集一个军政领导人的非正式联席会议。他告诉我们，中央已决定实施‘分共’，但有异于南京方面的‘清共’。这意味着要用和平方式撵走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不逮捕也不杀害他们。他告诉在场的高级将领回到各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周恩来年谱1898—1976》。

2 《张发奎口述自传》，p92。

3 哈耶出版社2009年版《陈公博回忆录》，p115。

自单位做好准备，我们要求共产党员自动离开，给点钱让他们走。如果他们不想离开，可以留在武汉，但不许在政治、军事机关任职。”¹

与此同时，根据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领下辖的三个军，于7月间在南昌至九江一线集结，准备东下讨伐蒋介石。

黄琪翔的第四军，其军部就设在九江烟水亭。共产党人在北伐战争中对黄琪翔的工作给予支持，尤其在私下，他们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所以当共产党人被驱逐之际，黄琪翔愿意提供帮助，给予那些要离开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切实的安全保护。“于7月中旬，（黄琪翔）率军部离（武）汉东下，至九江。时武汉共产党要人，即纷纷秘密离汉东下，谭平山、高语罕、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五人，即系因黄琪翔保护，随同赴九江。”“黄琪翔抵九江以后，即设军部于烟水亭，而高语罕、恽代英、张国焘三人，即在黄琪翔掩护之下，寄宿于黄之军部，而谭平山、李立三两人，则由黄琪翔派（第）四军特务营营长罗某，护送至南昌，与贺龙、叶挺会面。时共党九江市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于儒利女学，亦由黄琪翔派队保护。”²

黄琪翔回忆说：“1927年7月15日，武汉政府宣布国共正式分裂，但并没有发生过任何军事冲突。”“张发奎率领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十一军（代军长叶挺），廿军（军长贺龙）向南昌、九江集结途中，发生了南昌‘八一起义’事件。”³第十一军军长是朱晖日，叶挺当时只是代理军长，随后叶挺即改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黄琪翔对于共产党组织的“八一南昌起义”，并不知情。他给予共产党要员在行动和住宿上的帮助，主要是出自他对共产党人的友情和尊重。

黄琪翔所说的“南昌八一起义事件”，是指1927年8月1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92。

2 1934年《社会新闻》第六卷第4期，薛翻的文章《制造赤匪的祸首黄琪翔》。

3 黄琪翔《我的自述》。

日于江西省南昌，由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的分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起义事件，由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中共人士和贺龙领导。贺龙在南昌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还有第20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设武装力量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武装斗争形式反对国民政府的标志。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

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太匆忙，原因在于情报来源紊乱。7月29日，张国焘曾与张发奎在九江举行长谈，当时共产党希望争取张发奎加入起义。

另有文章认为：“七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孙科、谭延闿辈抵九江，召开庐山会议，黄琪翔亦参加焉。庐山会议之重要决议，为第二方面军实行反共并规定办法。逮捕高语罕、恽代英、张国焘、廖乾五及第四军（中共）党团负责人，而其余军事政治工作人员之左倾者，一律撤职。此项决议规定后，黄琪翔颇为着急，乃连夜秘密派人下山，通知廖乾五、高语罕等，命其速即逃往南昌，故高语罕、恽代英、张国焘、廖乾五及四军主要共党，均得为漏网之鱼。”¹廖乾五曾任第四军政治部少将主任，他的名字又叫廖乾吾。

7月30日，张国焘急忙从九江赶到南昌，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张国焘强调南昌起义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周恩来迫于形势的危急，急得拍了桌子，说：“前委大部分同志主张起义，要不然就只有束手待毙，难道你要大家都跟着你去投降张发奎吗？”周恩来以总前委书记身份，强行通过了发动南昌起义的决议。

有人认为：共产党人匆忙起义，是他们以为张发奎和朱培德的部队正在包围他们，由于害怕被镇压而赶紧起义。张发奎本人

1 1934年《社会新闻》第六卷第4期，薛翻文章《制造赤匪的祸首黄琪翔》。《民国高级将领列传》p451也有记载，黄琪翔派人通知离开的共产党人中还包括于树德。高语罕（1888—1948）、恽代英（1895—1931）、张国焘（1897—1979）、廖乾五（1886—1930）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老资格共产党人。

则在回忆录中否认这种说法。张发奎认为自己有能力轻而易举地逮捕这些共产党人，但是他没有，原因是他的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正为寻找营房而伤脑筋。最重要的是，张发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部队会发动起义。

李宗仁看得比张发奎清楚，他曾经提醒张发奎要注意自己部队里共产党的举动，尤其还提到了叶挺，因为叶挺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李宗仁对张发奎说：“你如对他们（共产党人）不加约束，将来部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发奎向李宗仁解释说，叶挺是他的小同乡，从小就在一起，是难兄难弟，绝不会为难自己的。李宗仁便耻笑他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还在坚持说：“不会的，绝不会的。”¹这说明，张发奎当时的确没有意识到他的部队会发生共产党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贺龙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的守军发起进攻；朱晖日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

8月1日上午，起义部队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十一军（辖第二十四、

1 《李宗仁回忆录》，p331。

第二十五、第十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辖第一、第二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九军，朱德任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起义军共2万余人。

当日下午，驻马迴岭的第二十五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的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起义，并于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由此可见，“南昌八一起义事件”中的起义部队，主要是来自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由于黄琪翔的部队当时驻守在九江，他的部队中只有极少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人的起义，主力犹存，因此也成为张发奎部硕果仅存的主要军事力量。

有趣的是，共产党人发动起义时，蔡廷锴师长带领他的第十师在观望。第二十四师长叶挺告诉蔡廷锴，谓此次暴动系由张发奎领导，而且起义名单中的确有张发奎的名字，于是蔡廷锴乃率部参加。可是起义爆发后，蔡廷锴才发觉自己上了叶挺的当。8月9日，蔡廷锴的部队行进到进贤时，借机脱离了起义部队，而且还枪杀了三十多位共产党人，并打电话给张发奎，用广东粗话咒骂他，诅咒张发奎会下地狱。张发奎为此感到很无辜。

南昌八一起义给张发奎部的将领们造成的感情伤害是显而易见的。黄琪翔说：“南昌‘八一’起义，对于张发奎和第四军的所有将领包括我个人来说，当然（是）一种意外。他们思想上不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做？因此他们埋怨共产党，而不认识这是大革命失败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参加起义的部队是十一军和廿军，占了第二方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而我当时所率领的第四军则在九江，除有一部分人参加起义外，基本上保持了四军的原有力量。”¹

“起义事件发生以后，张发奎就采取措施，实行将政治工作人员遣散。首先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及其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随从人员送往南昌，然后将第四军部队内的政治工作人员亦分别遣散，从此共产党和共青团员基本上被清除了。”¹

张发奎气度非凡，即使他的部队被共产党拉走了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亲自礼送郭沫若、廖乾五等二十余位共产党人，还发给他们路费。

黄琪翔当时的内心很矛盾。他本不愿意追随汪、蒋，去镇压参加起义的部队，但是又没有勇气跟着共产党去闹革命。他说：“北伐至此，最觉痛心，拟将第四军所有枪炮抛沉大江中，军中所有款项，平分全军作路费还家，做个真的解甲归田。”²他只是这么想，并没有这么做。

南昌起义之后，武汉国民政府震怒，下令讨伐，“并严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部进剿。”³张发奎此间一度去了上海面见汪精卫，商议未来的出路，于是将整个部队交给黄琪翔指挥。张发奎崇拜汪精卫，对汪惟命是从。他公开说：“我确认汪精卫值得崇拜，因为他的学识、品性以及辉煌的革命历史。”⁴在张发奎离开部队后，黄琪翔率领残缺的第二方面军向南进发，尾随贺龙、叶挺而去。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将士，包括张发奎在内，都不愿意与共产党的起义部队作战，原因极为简单，他们以前同吃一锅饭，是袍泽兄弟。兄弟相残，感情上无法接受。再则，彼此拼光了部队，以后谁也无法立足社会，再继续“革命”。所以到了8月8日，贺龙、叶挺率领的起义部队抵达赣南抚州时，第二方面军就停止追击，而是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向着广州方向前进。

在黄琪翔率领第二方面军奔向广州途中，蒋介石在各方势力压迫之下，于1927年8月12日宣布下野。桂系是压迫蒋介石下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p451。

3 《李宗仁回忆录》，p362。

4 《张发奎口述自传》，p208。

野的主要力量之一，可是李宗仁却假惺惺跑到上海，在蒋介石面前劝其不要下野。此时蒋介石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了，原因是他对部下说话太多。黄埔军校的学生对于国民党镇压共产党之举感到愤怒，纷纷在责问蒋总司令：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因为他们的蒋校长曾经一再强调过：“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就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蒋介石对李宗仁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¹

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自然很高兴，于是在 1927 年 8 月 25 日，将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入南京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合流”。

1 《李宗仁回忆录》，p342。

三、主政广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被迫入粤，李济深立即调集陈济棠、薛岳、徐景唐、邓世增各师，并第七军广西留守部队，将共军围困于粤东潮汕地区。共产党起义部队像一个坚硬的核桃，吃不掉，又吐不出，令李济深十分难受。

鉴于形势的发展，黄琪翔亦率领第四军从九江出发，一路尾随共军起义部队进入广东。此间，黄琪翔给汪精卫发出秘密请示电报¹，云：

军委会汪主席钧鉴心密：

（一）久未亲谕，仰念之至。职部奉命追剿寇，宥日完全集中吉安，俭日集结赣州开拔；（二）据报，贺、叶在石珪，钱（前）部已开赴会昌、瑞金，迎击深入。该逆或将折入长汀；（三）赣州现驻有黄绍竑两旅、陈○锐章一团；（四）此后方略如何？恳随时指示。职黄琪翔叩俭。

097

第四军进入广东，打着的旗号是来围剿共产党的起义部队，实际上不是，他们是在另辟生路。张发奎一直是汪精卫的忠实追随者，部队回师广东，是想同汪精卫联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势

1 台湾“国史馆”《汪兆铭史料》，典藏号 118-010100-00004-016。

力范围地盘，所以第四军的行动，基本听命于汪精卫的幕后指挥。

可是，原粤军的部队妒忌贤能，不希望张发奎、黄琪翔的军队回归广东，许多将领皆摩拳擦掌，意欲狙击他们。李济深在表面上显得颇为大度，表示欢迎张发奎归来，并再度声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之番号属于张发奎部，真实意图是想让第四军与共产党起义部队相互捉对残杀。而社会舆论则认为，正是得益于贺龙、叶挺起义部队的帮助，第四军才寻机进入广东的潮梅地区。¹

黄琪翔说：“（共产党）起义军离开南昌以后，张发奎和汪精卫商议决定和广东的李济深取得连（联）系，将第四军开回广东，再行相机行事。于是我要和参谋长叶剑英率领第四军和教导团开进南昌，稍加整顿，然后再向广东进发。我们于8月中旬以后，由南昌起程，经过樟榆、吉安、沿赣江南下，在赣州停留了一个时期，再向广东前进，10月间到达广州。此时起义军正在广东东江境内和李济深部队作战，形势紧张。李济深亲自找我，要我派四军一部前往支援，我没有接受。这并不是说，从政治上出发，我对共产党能有什么同情，而是因为起义军的绝大部分是从（第）四军扩充出去的，我们一年多来，共同为革命作战，现在要调转枪头，互相对抗，思想上搞不通。李济深对我表示很不满意。不久，汪精卫和张发奎经上海回到广州，计划酝酿反对南京政府运动。由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所支持的，而李济深又是支持桂系的，因此他不同意反对南京政府的计划。”²

李济深要求黄琪翔第四军参与打击共产党的起义部队，为此，他们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谈。黄琪翔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做了详细的介绍。黄琪翔写道：“某日，李济深为派遣第四军参加对叶、贺作战问题，亲自找我商量，引起了一场争辩。当时南京方面蒋、桂两系暗斗结果，蒋介石一时宣告下野。南京政府在国民党中央

1 1927年11月26日天津《益世报》第三版。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特别委员会——西山会议派控制中。李济深要求我出兵东江参加作战，我提出交换条件，要求李领衔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并在广州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重新组织政府，继续革命。这次会议以我们两人互相不愿接受彼此要求，结果不欢而散。原来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后台老板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而李济深是桂系的老大哥，他们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¹

由于黄琪翔拒绝李济深的请求，第四军未加入与叶挺、贺龙部队作战的潮汕会战，而李济深部队大都在潮汕围剿共产党起义部队，广州兵力空虚，第四军趁机入据南粤首府广州。张发奎部队在广州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他们因此顺利地进入广州，而且还受到相当热烈的欢迎。

共产党南昌起义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朱德，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他的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击败，朱德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4月，朱德率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此间，还发生过一件事。即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了（第）二十五师的两个残部，由东江辗转进到北江，形同流寇。这两团残兵败将，实际上不足一团。当时黄绍竑本有命令给东江的防军消灭朱德的残部，但黄琪翔却密电驻防韶关的范石生，收编了朱德的部队，编为一团，并委朱德为团长，驻于坪石，造成了后来的坪石暴动，也就是造成了后来赤匪骚扰的根源。”²当时国民党方面都认为：“江西赤祸的起源，谁都知道是起源于朱毛，所谓朱毛，就是朱德和毛泽东。”黄琪翔没有命令部队围剿朱德的残部，被责为“别有用心”。黄琪翔的用心，显然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避免袍泽相残。但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国民党顽固

1 《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辑，黄琪翔文章《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2 1934年《社会新闻》第六卷第4期，薛翻的文章《制造赤匪的祸首黄琪翔》。

派指责、诋毁、污蔑黄琪翔是实，而范石生收编朱德部队另有原因。目前较可信的解释是，朱德利用同是云南讲武堂学生的关系，对范石生开展统战工作的结果。朱德当时化名王楷，王尔卓任参谋，陈毅任政治指导员，林彪任连长，不久龚楚任团附。

1927年10月5日，张发奎、黄琪翔率领第二方面军回到广州。这时的第二方面军，只剩下了黄琪翔第四军是其主力，还有朱晖日第十一军的一部。李济深说，他们只有8000人，大概是有意贬低，而李宗仁又说是数万人，是夸张，实际上他们应该超过一万人。但是广州社会各界都在欢迎他们，为此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大会，参加欢迎会的人数多达20万之众。

在广州东校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广场中央搭建了一座主席台，高悬“欢迎张发奎同志及第四、第十一军武装同志凯旋大会”的会标。主席台上还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画像，四周则遍贴第二方面军的新标语。省市直属机关的所有职员参加了大会。全市男女学生则组成童子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入场。社会各界团体纷纷扯下白布作旗帜，上书“欢迎张发奎同志”、“欢迎劳苦功高的四军十一军将士”等语。第四军的第34团、第36团共约3000人为代表，也到场入列，英姿飒爽。身在广州的戴季陶、朱家骅、胡春霖、何思源、张难先、梁漱溟、马洪焕等政界名人也悉数出席。

下午一时，张发奎乘坐武装专车莅临会场。“沿途预派军警，拱卫森严”。张发奎来到会场之后，升旗，鸣放礼炮，奏军乐。张发奎踩着军乐队鼓点入场，然后与各界代表握手致礼，谈笑风生。去年张发奎率部离开广州参加北伐战争时，身穿戎装，现而今再返广州，他穿的是一身灰呢西服，则表明张发奎的身份已由一介军人而演变为军政首脑。

何思源主持欢迎大会，并“宣布开会理由”。广东省政府代表张难先致欢迎词。他说：“铁军自去年出师北伐，劳苦功高，此次奏凯回粤，我们以铁军能为民众解除痛苦、打倒强悍军阀，我们应表示热烈欢迎！”

此后的程序是主席团向铁军礼赠锦旗。主席团全体成员站在台之东面，而张发奎带领他的将领站在西面。第一面锦旗是用蓝色丝绸做得，四周绕以白绸，大书：“民众干城”，上款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全体将士纪念”，下署“广东各界欢迎第四军第十一军武装同志凯旋大会率全省民众赠”。之后，朱家骅再分别给第四军、第十一军赠旗。

礼毕。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上将发表讲话。张发奎历数北伐战争中打倒吴、孙军阀的经过，说“虽战无不胜，然死伤将士十万余”，并表示“本军是国民党的军队，为民众谋利益而奋斗，此次班师回粤，含有三大使命：第一是要肃清中国共产党，铲除叶挺、贺龙。第二是改善广东的政治。第三是要扶助农工。”随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等讲话。

下午2点半，欢迎大会结束，又举行了隆重的游行活动。参加大会的人员列队出行，从东校场出发，巡行市面一周，至西瓜圃散队，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半。¹

国民党广东省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很识趣，立即开会决定：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当选为广东分会委员。黄琪翔担任广州卫戍司令。

在广州，黄琪翔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许多亲朋故旧纷纷来托请，希望谋取一点私利。他在自己办公室门上贴出了一张《启事》，云：“此次回粤，专心整理本军补充，以继续北伐，对于地方行政用人，概不干预。各亲友如有请托、荐委各机关职务者，请勿进见。”²

不过，如有为公事而托请者，则自当别论。此时，恰逢广东省教育厅勒令嘉应大学、学艺中学和东山中学停学封门，原因是这三所学校被人诬告。梅县东山中学校长彭精一先生，是教育界的名人，曾做过梅县县长。东山中学当时办得蒸蒸日上，有学生

1 以上细节见1927年10月15日《申报》第三版文章，题为“粤各界欢迎铁军大会”。

2 1927年10月19日《香港华字日报》。

600余人，不料遭遇飞来横祸。彭精一校长认识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因为东山中学是叶剑英的母校，就来找他求助。叶剑英知道黄琪翔一度也在东山中学读过书，也是校友，于是拉着校长一起来见黄琪翔。黄琪翔二话没说，立即给广东省教育厅长许崇清（1888—1969）批了一个条子，让许崇清厅长网开一面。许厅长不敢怠慢，于是下令东山中学复课。彭精一校长不便声张，因为另外二所学校迟迟没有复课。数十年之后，彭精一校长才讲出这段旧事，写进他的年谱里，以示不忘黄琪翔、叶剑英当年给予母校的帮助。¹

抓兵权的人，希望有政治靠山。在攻占武汉之后，白崇禧已经“品尝到政治工作的厉害”。这不是他的慧眼独具，其他的将领也皆如此。张发奎、黄琪翔等人追随汪精卫，也是为了寻找政治靠山。自孙中山去世之后，汪精卫曾权倾一时，其资格和威望均高出蒋介石一头。

搞政治的人，则希望抓兵权。在1927年8月7日举行的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警世恒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汪精卫当时也如此。宁汉合流之前，汪精卫与蒋介石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也成为了孤家寡人，反而是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渔翁得利，他们假借国民党中央特委会的名义控制了中央政府。因此，汪精卫先是策动军阀唐生智反对中央特委会，可是他不久就发现唐生智别有怀抱，控制不了，于是又来笼络张发奎军事集团，意欲在广州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另建一个中央政府，来号令天下。

早在1927年10月2日，在汪精卫授意下，张发奎、薛岳面见李济深，要求李济深通电反对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柄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拥护汪精卫为领袖，响应汪精卫所谓的“护党”运动。薛岳当时是李济深的部下，他激动得泪流满面，苦苦哀求，而李济深则不为所动，坚决不允。这就迫使汪精卫、张发奎他们下定

1 温带鸿等编1994年版《彭精一先生百龄荣庆汇编》，p62。

决心，要采取果断行动，赶走李济深。

张发奎、黄琪翔率部进入广州后，就开始落实汪精卫的政治图谋。广州欢迎大会之后的第二天，10月6日，张发奎召开少校以上的军官会议，讨论迎请汪精卫以及粤军联合诸事宜，并拉着李济深联名给汪精卫去电，邀请汪来广州主政。

另一方面，黄琪翔迅速与黄绍竑见面，讨论粤桂联合事宜。“黄绍竑对张发奎、黄琪翔等建设新广东迎汪回粤，促开第四次全体执监会议之主张，均赞同，连日彼此过从，互商两粤合作问题。政见已趋一致。黄(绍竑)决于日间返桂，约留两星期，便即来粤。”¹

为了在表面上迷惑和笼络李济深，张发奎主动退居二线，将部队改称为原来的第四军，黄琪翔任军长，还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并将徐景棠、陈济棠两师归第十一军，军长未确定。²但是李济深对汪精卫、张发奎仍然不放心，很快将自己与叶挺、贺龙作战的部队调回广州，以防不测。

10月27日，张发奎的部队李汉魂、许志锐两师长率部从惠州石龙返回广州。³

10月28日，张发奎和陈公博、陈树人一起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去会晤汪精卫。第二天上午8点，汪精卫等人从香港乘坐泰山号轮船抵达广州。李济深、黄琪翔、胡春霖、李福林、朱晖日等要人均到码头迎接，随后汪精卫偕李济深乘坐铁甲车前往省府参加午宴。⁴汪精卫与李济深如此亲密的举动，其实是在演戏。他私底下已经与张发奎、黄琪翔串通好，就是要借着去上海开会之机，把李济深拉去上海，以便让张、黄在广州行动，发动事变。

10月31日，黄琪翔在“军部纪念周”会议上对第四军全体军官训话，强调第四军“护党”的使命。他们“护党”的目的，就是为了拥戴汪精卫，这是不言自明的。黄琪翔在会议上说：“我

1 1927年10月15日《申报》第四版。

2 1927年10月19日《申报》第四版。

3 1927年10月28日《申报》第四版。

4 1927年10月31日《申报》第四版。

们回广东是有革命的意义的，不是来偷安享福图快乐的。”为什么“在武汉和共产党分裂后，中国变成一天一天混乱的局面”？“根本是我们的党没有办法，所以跟着政治军事也没有办法。”“广东是革命的广东人的广东，不是主张闭关自守的反革命的人的广东，而且我们革命是以中国国民的资格来革命，不是以广东人的资格来革命。”¹他所指的“主张闭关自守的反革命的人”就是李济深，因为拥兵自重的李济深是广东政治分会主席，他反对汪精卫在广州另立政府，这表明驱逐李济深运动已经利剑在悬。

黄琪翔回忆说：“1927年11月17日，广州发生了反李济深运动。这主要是汪精卫策动的。自从武汉国共分裂，政府垮台以后，南京政府为桂系所控制。支持它的是国民党极右势力西山会议派，他们排斥汪精卫。汪精卫走投无路，便想利用自己的‘左派’头衔，在广州另行成立政府，但这受到李济深的反对。于是汪精卫便策动张发奎利用第四军起来反李，提出既反对国民党右派又反对共产党的‘夹攻中的奋斗’的反动的骗人口号，实际上是一种毫无原则的政治投机运动。”²

11月3日，广州召开10万人大会，地点还是在东校场，名为“欢迎汪精卫何香凝暨庆祝肃清共逆叶贺叛军大会”。召开此次大会的目的有三：一是为迎请汪精卫返粤造声势。二是撇清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三是为了迷惑李济深势力。

11月10日，下野后的蒋介石从日本返国，回到上海后立即给汪精卫去电报，邀请汪精卫去上海，理由是会商党事。明眼人一看，这里面就大有名堂。李宗仁说：“当‘特委会’成立之初，汪氏自（武）汉东下时，曾电蒋求一晤，为蒋所峻拒；今蒋氏自日返国，反而移樽就教。其前倨后恭、曲折奥妙的手腕，实一言难尽。”³李宗仁所言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特委会”成立之初，

1 原载1927年11月8日《岭东国民日报》，见台湾“国史馆”馆藏号“一般436/123.36”。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李宗仁回忆录》，p406。

蒋介石才下台，正是李宗仁本人控制南京政府之际。蒋介石与汪精卫已经翻脸，那种情况之下，蒋介石还有什么必要与汪精卫会晤呢？眼下情形已经大不相同，共产党的南昌起义搅得天下大乱，蒋介石看到自己复出的机会，所以亟不可待要与汪精卫会晤。

汪精卫当然也不甘心自己的大权旁落到桂系手中，他自己还在梦想着执掌新的广州政府，于是又向蒋介石靠拢，企图联合蒋氏制约桂系。其实他们都打着各自的算盘，各怀鬼胎。11月15日，汪精卫和李济深俩人手拉手离粤，高高兴兴地赴沪去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

李济深时任国民党广东政治分会主席，他去上海之前，委任戴天仇代理自己的职务。

张发奎此际又当了一回演员。他一方面辞却了几乎所有职务，让黄琪翔大权独揽，成为主持广东军政事务的首脑。同时，张发奎还故意放出风声，让报纸透露出他将在二天之后出国的消息。

《申报》称：“张（发奎）十八日赴沪放洋考察军事，两年归国，先赴日，再游英德。李济深送旅费五万。”¹

当李济深前脚刚刚离开广州，登上轮船，16日夜，身在广州的张发奎便在暗中指挥，由黄琪翔登上前台，联同李济深部之薛岳、黄镇球两师，及李福林第五军，发动了著名的“张黄事变”，并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掌控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加抨击。汪精卫、张发奎和黄琪翔联手合演的这台戏，被李宗仁斥为“权术”！²

政变的主要军事人员是张发奎、黄琪翔、薛岳、黄镇球等人，他们都是广东陆军小学至武昌预备军官学校的同届、甚至同班的同学，具有某种天然的感情基础。

“张黄事变”发生之前，黄琪翔特意带领着家人去为父亲黄富霖扫墓，举办了非常隆重的祭奠仪式。他在《黄琪翔将军祭父诗文》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感恩与怀念，也对即将发动的

1 1927年11月17日《申报》第四版。

2 《李宗仁回忆录》，p406。

事变充满信心。

《黄琪翔将军祭父诗文》

昔有王袞，三馥蓼莪。儿读是书，涕泪滂沱。
推牛而祭，墓门峨峨。儿思曾子，感慨若何？
忆父在时，热望无佗。遣儿军校，致力学科。
儿自服务，几历风波。春晖莫报，岁月蹉跎。
儿今归省，母体幸和。一家长幼，纷纷列罗。
独不见父，儿恨难磨。国事靡盐，待旦枕戈。
说甚显扬，儿愧滋多。钱纸飞舞，举目山河。
肴芳酒芬，父颜感念。表阡敢绥，但候凯歌。
儿书当誓，对父吟哦！

四、张黄事变

1927年11月17日凌晨3点，第四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黄琪翔将军一声令下，一支支荷枪实弹的武装军队迅速行动起来，奔赴各自事先预定的占领目标：

一支部队包围了位于吉祥路的黄绍竑公馆，几声枪响之后，这里驻扎的黄绍竑卫队一个连全部被缴械；

一支部队包围了位于东山的陈济棠公馆，解除了陈公馆卫队的武装；

一支部队包围了位于高第街桂系黄旭初部的留守处，解除这里桂军的武装；

一支部队在石井西村，迫使桂系一个团缴械；

一支部队包围了黄埔军校，略有反抗，即弹压成功。缴械军校最近购自日俄步枪3000支，驳壳枪3000支，机关枪数十挺、炮12门……驻扎在东山寺贝底的桂军第六师一部，以及驻扎在东北门外第七旅一部也统统被缴械。

与此同时，李福林的第五军补充团也开始行动。他们在珠江南岸，将士敏土厂（水泥厂）包围，解除了桂系卫队的所有武装。

至此，广州城里四处响起枪炮声，有几处出现火光，至早上六时许，枪炮声归于宁静。

第二天一早，第四军在广州街头贴出了新标语：“肃清军阀，

铲除封建思想的武人！”显然，前者“军阀”是指桂系首领黄绍竑，而后者“封建思想的武人”则是指李济深。同时，街头还到处张贴出广州市公安局长朱晖日署名的布告：奉黄琪翔、李福林两军长的命令，维持本市之治安。

上午七点，何香凝、李福林、顾孟余、陈公博、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甘乃光等在葵园召开紧急会议，黄琪翔亲临会场，宣布这场由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五军联合发动的“护党”行动开始，并且已经清除了李济深、黄绍竑等军阀在广州的武装。¹“张黄事变”至此爆发。

事变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抓捕广西新桂系首领黄绍竑。早在汪精卫偕同李济深离开广州之际，张发奎、黄琪翔二人已发报给黄绍竑，邀请他前来广州暂代李济深之职务。这当然是一个阴谋。张发奎、黄琪翔已经作了设计，一旦黄绍竑抵达广州，即行扣押，以此来迫使驻扎在西、北江的桂军缴械投降。

11月15日中午，黄绍竑风尘仆仆自南宁赶到广州，当即来到李济深的葵园谒见汪精卫。这时汪精卫和李济深已经整装待发，只得匆匆谈了几句话就握手告别。黄绍竑随后去了他的位于广州东山的家，准备第二天早上与张发奎、黄琪翔见面，商讨履新的事宜。²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日夜11点，黄绍竑的老朋友、广东原财政厅长冯祝万（1879—1954）获悉事变的消息，立即跑到黄绍竑的寓所通风报信，让他赶紧脱身。在第四军包围黄绍竑公馆之前，他就连忙化装逃匿。抓捕黄绍竑的计划因此落空。

黄琪翔很快就发现黄绍竑已经漏网，立即向海员工会、铁路工会发出通知，要求协查，“凡发现或逮捕黄绍竑者，即予大奖”，赏金为1万大洋。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他们意欲“将黄绍竑骗来广州，加以逮捕、枪杀。”但枪杀黄绍竑不是他们的计划，因为杀戮只会带来更大的报复，他们真正的意图是驱逐桂系在广州的驻军，

1 以上资料见1927年11月19日《申报》第四版，文章“粤局发生重大变化”。

2 《李宗仁回忆录》（上），p407。

而逮捕黄绍竑的目的就是要逼迫黄绍竑下令桂系缴械。

此时，黄绍竑以及李济深的代理人戴天仇已经各自逃离了广州。黄绍竑逃到香港后没有停留，旋即奔梧州。戴天仇则躲进香港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闭门不出。¹

事变发生第二天，张发奎、黄琪翔立即高举“护党”旗帜，设立“党务整理委员会”，拥戴汪精卫，企图另立国民党中央。他们改组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和广东省政府。张发奎自任广州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派人物顾孟余（1888—1972）、陈公博分别出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和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这就基本完成了铲除李济深的政治势力。同时，将广东新编第二师薛岳部改为第四军教导第一师。新编第三师黄镇球部及省防军韩汉英部合编为第四军教导第二师，以上部队由黄镇球任师长。原属第十一军之第二十六师许志锐部改隶属第四军。于是，第四军长黄琪翔统辖五个师。这就是捍卫“张黄事变”的主要军事力量。

黄琪翔还给远在上海的汪精卫发去电报，内容云：“主张李宗仁、白崇禧各军归党节制，并即在粤恢复中央党部，请汪回粤。”²

在此之前，被桂系逼迫下野的蒋介石为自己与宋美龄婚事而前往日本，拜会在日本疗养的未来岳母。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了上海。蒋介石“闻广东黄琪翔已缴广西黄绍竑军械，曰‘从此广东多事矣！’”³老谋深算的蒋介石，面对“张黄事件”，他敏锐地察觉出政局的变化，已经看到了自己重出江湖的希望。

李济深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因为11月17日凌晨“张黄事变”起事时，他和汪精卫正在一艘名叫亚洲皇后号的轮船上，由广州前往上海的睡梦中，直到18日上午8时才在上海招商局码头靠岸。宋子文、陈立夫、褚民谊、郑毓秀、吴铁城等人纷纷来码头迎接汪精卫。蒋介石还专门派代表曾养甫，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

1 以上资料均来源于1927年11月21日天津《益世报》第三版。

2 以上资料均来源于1927年11月21日天津《益世报》第三版。

3 蒋介石《困勉记初稿》。台湾“国史馆”典藏号002-060200-00002-001。

上海各路记者于当天采访李济深，问：“黄琪翔、薛岳等军队，在广州与黄绍竑发生战事甚烈，且黄绍竑亦已逃逸，不知李主席事前得悉否？”

李济深答：“我不知道，大致不致如此。”

记者问：“张发奎抱何种态度？”

李答：“张发奎兵权已卸，所部已交黄琪翔率领，张氏本人先（我）一日赴港，本拟与余等同行来沪、转道赴日。嗣后在港一时筹备未能就绪，乃延缓数日始行。”

记者又问：“黄琪翔、薛岳在省城兵力几何？”

李答：“不多，大部均已开往北江及韶关方面。”

记者问：“假定此事属实，与第四次中央执监联席会有无影响？”

李答：“如有此事，余料不过是部队之小冲突，与四次中央执监会绝无影响。”¹

事后不久，李济深接到黄绍竑的来电，才如梦方醒，知道对手用了调虎离山之计，自己成了傻瓜。李济深随即再次向全社会表示：

“此次粤变而言之纯系共产党之阴谋，直接间接支配一般骄将悍卒，与失意政客，趁机作乱。”又说：“张发奎、黄琪翔原为余所统第四军之一部将。张发奎为师长，黄原为团长。东江南路杨、刘诸役，以至去岁北伐，皆有战功。共党阴谋破坏吾党，极力挑拨，离间吾党军人，而收为己用。”并表示自己“除促中央各同志开会外，不日即当首途返粤，统率所部，为党国整纲纪，扫除叛逆也。”²李济深所说的“失意政客”，显然指的是汪精卫、陈公博之流。

上海正在举行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李宗仁、白崇禧立即与李济深联合起来，在会议上与汪精卫展开激烈的争斗。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行武力讨伐，追究“张黄事件”之责任，然后再召开四中全会；汪精卫则表示应

1 1927年11月19日《申报》第四版。

2 1927年《生路》杂志第35期，31—34页。《李济深关于黄琪翔叛变之谈话》。

谈判和平解决。而蒋介石则以“中立调停”的姿态，声称“张黄事件”应压后处理。

上海的舆论则出现往一边倒的情形，纷纷指责“张黄事变”。预备会上，陈德征的政治报告把“张黄事变”列为最要紧处理的五件事之首。他在会议上说：“广东自从李济深、汪精卫两同志离开之后，黄琪翔、张发奎等几个武人立即叛变，结果驱逐了黄绍竑、戴季陶、朱家骅等。我们要认定这次叛变，可以说是新军阀霸占地盘、把持政权的野心所致。这次反动分子，便是第二个唐生智！”¹

广西当时是新桂系的天下，他们立即发表《为讨伐反革命派黄琪翔告民众书》，说：“忽然得到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息，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共产党余孽黄琪翔，眼见得同气兄弟唐生智、叶挺、贺龙等被本党衷实同志指挥革命军把他次第扑灭干净了。他觉得兔死狐悲，心怀愤恨是一层；他又觉得自己所作的反革命行为，是逃不过本党衷实同志的眼里，迟早总免不掉为唐生智、叶挺、贺龙的第二。所以就不得不揭出共产党的真实面目起来，就不得不阴谋杀害党国的领袖，竟于十一月十七日在粤公然变叛起来了。”并指出“张黄事变”的罪过是：“叛党祸国，谋杀革命的领袖，擅捕衷实同志，扰乱革命的策源地两广，勾结共产党，勾结唐生智、叶挺、贺龙，背叛总理，反对三民主义，捣乱北伐的后方，残害两广民众，实行赤化，破坏革命军……等等。”²

在各派围攻之下，身在上海的汪精卫焦头烂额，再次显露出他的懦弱性格。一方面他抛出要求蒋介石复职的提案，意图转移视线，以减轻自己的压力；一方面称病，自己躲进了医院。同时，他又不甘心自己政治图谋的失败，致电黄琪翔云：“黄代总指挥琪翔同志勋鉴：弟辞却职务，归庐山旧室，闭户读书，此儿时游

1 1927年11月22日《申报》第四版。

2 1928年《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党务月报》第八期，9—13页。

学之地。”又说“弟电解除职务，而党员责任犹在，重荷督责，讵敢出逸。”¹由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之政治利益难以调和，蒋介石复职为各派唯一可接受之共同点。自此，在宁汉分裂时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而复出。

黄琪翔说：“1927年11月17日，由汪精卫主持发动的反李济深运动，我在张发奎领导下是参与其事的。因为当时我们还以为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左派，幻想在他的领导下在广州重新召集国民党的四中全会，可以整顿队伍，再行革命。实际上汪精卫早在武汉的时候，已经成为反革命，但我不认识，我还寄予他很大的希望，错误地以为在他的领导下，失败的国民党还可以新生。”“李济深是在事变发生以前，被骗偕同汪精卫前往上海的。他在上海闻知广州发生事变，大为震怒，认为我们是在犯上作乱，不能容忍。他调集广东、广西、福建各省部队，向广州进军，企图恢复他失去的地盘。此时张发奎以总指挥的地位，直接指挥第四军薛岳、缪培南、李汉魂、许志锐等师分别派往东、西江布防，而任我为广州卫戍司令，指挥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察局部队，担任维持广州市治安。”²

上海还在争论不休，甚至有人直接指责第四军是共产党的部队，在为匪作乱，其性质是“倒戈”。

黄琪翔奋起反驳，公开声明说：“近来‘倒戈’两字，在北洋军阀中接二连三的发生不少，对于这种事实的批评，在落后的大人先生们自然是离不了拿‘乱臣贼子’和‘大逆不道’等等的罪名来加诸倒戈者之身；尤其是军阀的巨头，对于倒戈的痛恨，比痛恨“赤化”还要利害，他说：‘忘恩’，是‘负义’，是‘没人格’，是‘最可耻’！提防得也最利害，差不多谁倒戈的诛谁九族。”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在“为多数人谋利益”，并指出：“‘道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天经地义亘万古不变的吗？这

1 1927年11月20日天津《益世报》第三版。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要让哲学家讲去。我们不必深究他；我们站在革命的观点上说起来，只知道：一种事实的行动，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的，就是道德；反之——为着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打算的——反革命的，就是不道德；不甘沉迷屈服于环境和良心所不许可的现状之下，毅然起来反抗的，是道德；不问时代的潮流怎样，徒然对于前人的言行作骷髅的迷恋的，是不道德。”¹

张发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命令第四军的主力溯江而上，准备进攻广西，一举统一两广地区，扩大地盘，企图建立可与南京政府对抗之根据地。

10月初，共产党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被击败后，周恩来、恽代英、叶挺潜入香港，朱德、陈毅率领残部800余人进往湘南地区。黄琪翔说：“此时（共产党）南昌起义部队，已在广东东江境内失败，有不少共产党员经过香港逃来广州。”身为广州卫戍司令的黄琪翔，保护并收容了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恽代英（1895—1931）。恽代英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委员，也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之一。

第四军军部当时设在广州肇庆会馆。而身任第四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黄琪翔的公馆则位于广州东郊的东山上，是一座三层楼的大洋房。“张黄事变”发生后，总指挥张发奎与夫人刘景容就住在黄琪翔公馆的三楼上，黄琪翔住在一楼。令人惊诧的是，黄琪翔把共产党领导人恽代英就藏匿在自己家中的一楼。

张发奎回忆说：“这一段时期，共产党有没有接触过我？黄琪翔左倾，他同情共产党，支持邓演达继续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他跟共产党接触过，还经常告诉我：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已经抵达广州，他们对我印象良好，想见我。那是些什么人？我问他，但他不肯告诉我，也不告诉我这些人住在哪里。”“有一天，他（黄琪翔）说共产党派人来拜访我，问我肯不肯会晤此人。我问：‘是谁？’他答‘恽代英。’我确实认识他，他是很重要的共产党员。

1 黄琪翔《倒戈：新时代的新道德——军阀脚下的军人目前唯一的生路》，原载《四军周报》1927年第7期。

黄琪翔说，南昌暴动被击溃后，恽和许多同志逃到香港，他这次是秘密来穗。我回答说可以见他，问他在哪里，黄喊‘上来’。这表示恽代英住在黄琪翔住宅的一楼，毫无疑问，没有黄琪翔的同意，恽住不进来。”¹ 其实，黄琪翔与张发奎这两位军事首领之间已经产生了矛盾，黄药眠看得真切，他说：“张发奎、黄琪翔回到广州以后，张、黄之间表面上一致，但实际上也有矛盾。张发奎比较接近汪精卫，而黄琪翔则比较接近邓演达。邓演达有脱离国民党另创新党的主张。”²

11月29日，在李济深和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力主下，国民党召开了第二十次常委会会议，决议将“张黄事变”交军事委员会“核议具复”。南京军委会的委员共七人，他们是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谭延闿、杨树庄、朱培德。这七人一致同意对张黄进行军事讨伐。³

12月1日，拥护汪精卫的势力组织了广州十万人参加的“护党”大会，冀望以声势浩大的民众集会来对抗南京国民党特委会。张发奎、黄琪翔以及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公博轮番登台演讲，提出六项主张：一，请汪精卫及中央执监回粤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大会。二，请政府实行护党的训政。三，肃清共党及腐化分子。四，拥护护党的海陆军。五，打倒新桂系军阀李济深、黄绍竑。六，反对特委会屠杀南京民众。陈公博已是内定的广东省主席，之前他是代理主席。

就在这次大会上，当张发奎演讲时，现场出现了数十位共产党人，他们手持红旗，高呼“反动口号”。主办方为了展示他们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企图赢得南京的“谅解”，命令军警当场拿获3人。⁴

12月2日，在国民党第二十一一次常委会上，表决通过了讨伐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92。

2 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1981年第三期，黄药眠文章《我知道黄琪翔同志的二三事》。

3 见1927年12月4日《申报》第二张，文《国府决定讨伐张黄之经过》。

4 1927年12月3日《申报》，文《广州各界护党运动》。

张、黄的命令书。当天下午9时，即向社会公布讨伐令，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第八八号），曰：

据军事委员会呈称，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径在粤叛变，并由李总指挥济深电陈，该逆蓄意谋乱，破坏大局，种种罪状，呈请惩办。前来张发奎黄琪翔奉命北伐，抗命南甯，祸贻扰粤，负罪已深。政府念属党军，曲予优容，冀其悔悟，乃复包藏祸心，竟敢回粤之后，勾结共党，扰乱后方，阻挠北伐，背叛党国，使粤省完善之区，为该逆等遁逃之藪，若不严加治罪，何以申法纪而儆效尤！张发奎黄琪翔着即褫职拿办，即由军事委员会迅速派军队分道进剿，肃清残寇，用拯人民，以副本政府除暴安良之意。¹

在此前的混战中，唐生智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但在与桂系作战中，唐生智腹背受敌，已经丢失安徽、湖北，元气大伤，全军龟缩于湘南，败局已定。于是新桂系立即调动军事力量，抽出下辖部队，来联手李济深之粤军，围攻张、黄的部队。桂军从广西大举东进，粤军则自潮汕地区西进，新桂系另有一部自上海海运汕头前来助攻。

“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下令讨伐张、黄，命驻东江之钱大钧、黄绍竑部及第八路军之陈济棠、徐景唐两部向广州移动。张发奎为先发制人，乃迅将广州及虎门之驻军包围缴械，调缪培南、许志锐两师驻西江；李汉魂师驻惠州，防守东江；薛岳之教导第一师驻江门，防御南路，拱卫广州之势遂形成。”²接火后，张、黄部队下属之第四军缪培南师、薛岳师、黄镇球师率先攻击东江地区的陈铭枢、陈济棠粤军，将二陈的部队击退。

由于战事的原因，广州的物价不稳，开始通胀。

在此前的战争中，只要军队一开打，占领方的军队必定要向

1 1927年《国民政府公报》（第十二期）。

2 《中外杂志》第40卷第2期至第4期（1986年8—10月），载缪培基的文章《张发奎与铁军之兴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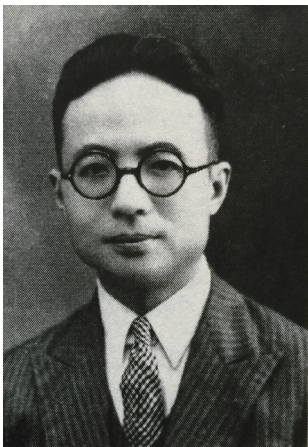
当地的银行、商会借钱，筹措军饷。这种借款往往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结果是金融界再把借款转嫁到人民的头上，让当地人民承担战争的费用。

黄琪翔执掌广州时没有这样做，他明确告知总商会，第四军不向商家筹款。11月21日，朱晖日召开各家银行的商董开会，会议决定维持纸币，由商会通令各店，一元以上的交易，概用中央纸币。¹11月22日，再次召开商业联合会，张发奎、黄琪翔亲自参加。张发奎在会上说：“第二方面军不是共产军”，“兄弟返粤，切实为粤人谋幸福，建设新广东。”随后广东财政厅长邹敏初（1881—1940）向商家们报告：中行现存款800万，各征收机关存数百万，共千五百万。中行纸币总额2200万。会议决定，为了让老百姓放心，政府的税收概用纸币。还决定于23日由商人派代表赴中行视察，以证明政府财政充足。²广州中行带头照常兑换纸币。这些重要的经济举措，稳定了广州的市场和社会秩序。

“张黄事变”发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再次策划武装起义，地点就在广州。

尽管张发奎在10月5日的广州欢迎大会上讲明，此次班师回粤的三大使命，第一条就是要肃清中国共产党，但黄琪翔对“分共”的态度仍然并不坚决，也未在第四军内部认真甄别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军长黄琪翔的任秘书郭慕亮就是共产党员，仍然“深得黄琪翔的信任，许多工作由郭代拆代行”。³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留学时期的同学沈沛霖（1903—1992），是1922年



沈沛霖

1 1927年11月23日《申报》第四版。

2 1927年11月24日《申报》第四版。

3 独立作家2015年4月版《沈沛霖回忆录》，p75。

在法国经周恩来、赵世炎介绍加入少共组织的老共产党党员，于1927年11月初受共产党组织的委派来到第四军，与郭慕亮接上了关系。

沈沛霖回忆说：当时“郭向我（沈沛霖）简略介绍了广州方面的情况：黄琪翔部是九月开抵广州的，所部分驻广州近郊及北江韶关、东江石龙等地。郭并说张发奎、黄琪翔等粤军将领是拥护汪精卫反对南京西山派特委会政府的，对驻广州之桂系李济深亦表不满。”¹

正是由于郭慕亮的安排，沈沛霖当上第四军二十六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沈沛霖来到广州并参加第四军，其真正目的是来搞兵运，以配合第四军教导团举事广州起义。沈沛霖说：“在以后不太长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发展了七八人加入（中共）组织，大多乃系团、连二级的政治指导员，及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军事人员中，亦有一二名列入为吸收对象，嗣因事变突然，未及进一步联络。此外，我们并建立了中共秘密小组，拟定了工作计划，记得其中一条即配合广州教导团暴动。”²

对于共产党将要举行“广州暴动”的计划，黄琪翔等高级将领则完全不察。张发奎、黄琪翔正忙于自己的事，而他们的后院已是岌岌可危，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汪精卫显然已察觉出广州的隐患，探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都是共产党人，还说“该团有几百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数军官拥护共产党。”他多次提醒和要求黄琪翔防范共产党“闹事”。

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是叶剑英向张发奎、黄琪翔建议组建的，时在南昌起义之后。教导团的主要成员是武汉中央军校的学生，被第四军收编。时任团长叫梁秉枢（1889—1977），也是共产党人。教导团归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管辖。叶剑英是在1927年初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的身份并

1 《沈沛霖回忆录》，p75。

2 《沈沛霖回忆录》，p75。

未暴露。

12月初，汪精卫不放心，特意派妻子陈璧君（1891—1959）亲自跑来广州，传达汪精卫关于解散军官教导团的指示。张发奎为此召开会议，决定贯彻汪精卫的指示。

在会议上，朱晖日支持汪精卫，而叶剑英则担保军官教导团没有什么问题，不必解散。黄琪翔也站在叶剑英一边，不赞成解散军官教导团。黄琪翔强调的理由是：“当时唯一重要工作，就是准备（与）李济深的部队前来决一死战。”¹黄琪翔此时位高权重，他不仅是第四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还是第二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会议最终令汪精卫的指示落空。但是，汪精卫的判断没错，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确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随后爆发的广州起义，他们成为了骨干力量，而且共产党广州起义的副总指挥就是黄琪翔的参谋长叶剑英，但黄琪翔毫无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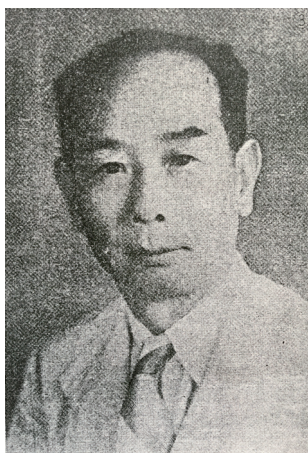
12月6日上午10时，黄琪翔带领秘书、参谋副官等人及警卫团一营，乘广三车出发，前往三水，然后转赴肇庆。肇庆是西路军指挥部的行营。黄琪翔临行前，已将第四军军部及广州事务交参谋长叶剑英“代拆代行”，全权负责。黄琪翔对其参谋长叶剑英的信任，无以复加。

可是，在此关键时刻，“张黄事变”发动者的内部发生分裂。李福林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压力之下率领第五军反水，表示不再支持张发奎、黄琪翔发动的“张黄事变”。

1927年12月9日、10日，汪精卫见大事不妙，连忙给张发奎发来了四封电报。要求张发奎对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尚果（1893—1959）等共产党人采取行动，查抄广州苏俄领事馆、驱逐苏俄领事。其中，汪精卫9日来电称：“黄琪翔兄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恳请向华兄英断，请琪翔兄暂时退休，认真肃清共党……”，以平息中央对广州政变的不满情绪。也就是说，汪精卫想让黄琪翔一个人去当替罪羊。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张发奎说：“我总是听汪精卫的，我为黄琪翔撤职做了准备。他知道此事，但不能不服从我。朱晖日唾骂他，谴责他为匪作伥，说我们首先应该枪毙他。他俩好像俩兄弟吵架，我叫他们冷静下来。”¹朱晖日原是第十一军军长，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朱晖日早就不满意黄琪翔对共产党人的纵容态度。



朱晖日

第四军内部，不光朱晖日怨恨黄琪翔，另一猛将许志锐对黄琪翔的容共态度也十分不满。许志锐曾经当着张发奎和陈公博的面，埋怨张发奎偏向黄琪翔。陈公博说：“许（志锐）先生的说话，自然是要发他久积的牢骚。他的意思我们也深知，就是在平共之后，对于军队的统帅还要设法另找一个稳健的人物。”²陈公博所指要更换的“军队的统帅”，就是指黄琪翔。

按照汪精卫的指示，张发奎逐走了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廖尚果以后，朱晖日已经开始行动，命令警察部队查抄广州人力车夫工会和印刷工会，并在广州小北直街的大安米店，搜出一批武器，逮捕了一些人。大安米店实际上是中共的一处武器转运站，而米店老板被捕后交代了实情，再加上军官教导团内有人告密，共产党起义的风声外泄，使得广州的社会形势变得十分紧张起来。

据谢苗诺夫的“秘密报告”称：“张发奎寻找中共代表要进行谈判，但省委拒绝与他对话。”张发奎于是电令黄琪翔紧急返回广州，商量对策。

另一方面，张太雷等共产党领导人发现广州起义的秘密已经外泄，而且朱晖日等人的查抄行动也打乱了他们的步骤，于是决定提前举行起义。

1 《张发奎口述自传》，p107。

2 民国廿六年《民族杂志》第五卷第一期至第八期合订本。陈公博《军中琐记》，p1146。

五、广州起义

“张黄事变”，震惊全省。驻守东江陈济棠部和蒋光鼐、蔡廷锴部，准备回师广州讨伐；广西黄绍竑的部队也沿着西江东下反扑，形成了夹击广州的态势。¹ 黄琪翔于是将自己的第四军主力绝大部布防在广州以外的东江和西江地区，准备迎击，广州城内的力量就显得相当薄弱，只剩下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及军部警卫团，黄琪翔授权参谋长叶剑英指挥。

12月10日，身在前线肇庆的黄琪翔，接到张发奎的电报，立即风尘仆仆从前线赶回广州，还未及商讨所谓时局大事时，就在当天晚上，即12月11日凌晨，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就已经爆发。

黄琪翔回忆说：“12月11日深夜（凌晨），我在广州市东郊东山区住宅内，忽然听见远处有枪声传来，初不注意。接着，军部的值班参谋叶简修（1896—1936）打电话给我，说军部附近发现枪声，似有攻击军部的模样，问我如何处置？我告诉叶简修，要他就近报告叶剑英参谋长，请示办理。我绝对没有想到会有共产党暴动的问题，也不知道自己的参谋长（叶剑英）是个共产党员。枪声越来越密（集）了，我觉得情况严重。于是我便走向楼下，

1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p451。

找着同住的张发奎，告以上述情况。”¹

于此同时，张发奎也觉察出大事不好。张发奎说：“12月11日拂晓，谢膺白打电话到黄琪翔公馆，他报告我，已经听到炮声，据他下属电告，共产党发动了暴乱。他叫我赶快跑，电话突然中断，我猜想电话局一定被占领了。”谢膺白（1890—1957）时任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广州市党部改组委员。

据《第四军军史》说：“说来有趣，叛军（起义军）在黄琪翔公馆周围走来走去，却无人进入宅内抓人。多年以后，叶挺、叶剑英表示，当时都误以为对方已经下令捕张（发奎）；而叶剑英在去世之前的回忆录中坦言，当时最希望张发奎被流弹击中，一了百了，如果真的五花大绑押至面前，还真不知道是杀是放。”后来，张发奎于1936年12月在上海再见叶挺时，他问起了此事。“见面头一件事就是我问他（叶挺），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广州暴动期间他为什么不抓捕我？他答：‘我的良知不允许我这么去做，如果我扣押你，我将是对你太不公平了，因为你绝不会屈服的，你会慷慨赴死。故我必须让你走开。’倘若他想扣押我和黄琪翔，这是轻而易举的。在黄琪翔家没有哨兵，我也只有一个侍从。我们有随身武器，总共就这些。当然，还有几个公安局特警守卫我的住所。”²

这说明，这些出身于第四军的将领们，他们不仅是老同学，而且是挚友。虽然因各自的政治立场而互相对立，开展殊死斗争，但个人之间的感情仍然极为深厚，都不情愿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

当有些陌生人出现在黄琪翔公馆的门外游动时，情况已经危急到不能再耽搁每一分钟的时间。张发奎此时刚收养了女儿琼花，还是个女婴——张琼花是张发奎的妹妹与华文治的女儿。张发奎赶紧让夫人刘景容抱着琼花躲到自己妹妹家里去。然后，他和黄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张发奎口述自传》，p165。

琪翔俩人一起去找住在附近的陈公博。

陈公博当时也住在广州东郊的东山，于是把他从床上拖了起来。三人再一起去大沙头看望广州财政局长、市商会会长邹殿邦（1895—1993）。邹殿邦¹是富商，也是张发奎的好朋友。他有一条电动的游艇，于是他们乘坐这艘小艇渡过珠江，到达南岸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家，再和李福林一起同赴他的第五军军部。以上是张发奎的回忆内容。

但是，陈公博的回忆录，与张发奎的说法不尽相同。陈公博说：暴动发生后，“我打普通电话到黄琪翔家里，电话已不通，那时黄先生是四军的总指挥，张向华先生²早已把总指挥的职务交给了他，自己仅当一个军事分会的常务委员，也同时住在他家的楼上。普通电话既不通，我便打军用电话到四军军部。四军军部正驻在长堤的广西会馆（肇庆会馆），在电话回报也说消息不明……到了四点，枪声更密了，北方的枪声渐渐响到了长堤，四军军部始终没有电话来。”于是陈公博想雇船到珠江南岸，船家听到枪声不敢开船，于是陈公博掏出枪来威胁。

陈公博说：“我来到五军军部，天色大亮，不过那夜李福林先生不住在他的军部，而住在他的乡里大塘村，军部的人告诉我，他们已报告了李先生，他就起程出来，听说黄琪翔也在大塘和李先生一起……钟刚敲过七点，军部的守卫传呼说李军长到了。我步出办公厅，头一个入来的是张向华……跟着向华后面是黄琪翔，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还有财政厅长邹敏初，他们的衣服似乎没有穿好，黄先生穿的是西装，没有打着领带，邹先生穿着夹短衣，把一件长衫夹在左膀中。”³

1 邹殿邦是广东香山人，字敏初，家族以盐业起家，16岁接替父亲担任广信银号掌柜，20多岁成为百万富翁，长期担任广州银业公会主席、广州市总商会主席，参与过近代广州不少重大事件。邹殿邦活了99岁。1988年岭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时，他的儿子邹至庄担任岭南学院名誉院长，陪同年已94岁的邹殿邦来到岭南大学校园（今中山大学南校区）参加庆典。邹至庄先生为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创建著名的“邹氏检验”法，并提出动态经济学的谱分析方法和最优控制方法。

2 向华是张发奎的字。

3 民国廿六年《民族杂志》第五卷第一期至第八期合订本，陈公博《军中琐记》，p1293。

总之，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起离开东山黄公馆的，然后去见邹殿邦，到大塘村找到李福林，他们再一起来到了李福林第五军的军部。

张发奎判断共产党人的起义部队是“乌合之众”，不会有多少军事战斗实力，于是向李福林借调一个营的兵力归黄琪翔指挥，让他去收复广州。李福林不允，借口自己的部队只负责珠江南岸地区，其实李福林也害怕因为镇压共产党人而引火上身，同时，李福林还在大骂黄琪翔，指称黄琪翔就是共产党员。张发奎替黄琪翔辩白，说黄琪翔不是共产党员。

在这种情况下，张发奎和黄琪翔让谭礼庭帮忙发电报，把第四军驻扎在东、西江地区以及粤西南的部队调回来收复广州。谭礼庭（1876—1966）是个商人，¹是李福林的亲戚，主要做煤炭与船务生意。

12日，张发奎亲自指挥第四军所部开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主要负责人是张太雷（1898—1927），起义军设立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乘坐着张发奎的装甲汽车，想率众占领第四军军部，他的副官宣布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来了，叫哨兵不许开枪，但是被第四军参谋处长薛炼识破，下令开枪。当时第四军军部只有一个连的守卫，顽强防守，起义军最终没能占领它。

叶剑英说：“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²起义军和工农群众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驱车返回指挥部的途中，在黄泥巷口遭遇敌机器工会体育队的袭击，中弹身亡。12日夜，面对陆续而来的张发奎后续部队，起义军总指挥部不得不下令撤出广州。

1 谭礼庭是广东新会人。青少年时协助其父辈经营航运、商业。1906年承建广州市自来水厂和经营供水业务，获厚利。1913年自筹资金创建广南船坞，1929年转营煤矿。1949年迁居香港。建国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清理富国煤矿公司财产，邀请谭礼庭回穗办理，从此在广州定居。1966年逝世，终年90岁。

2 见叶剑英回忆广州起义的文章，刊登在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13日凌晨，起义军余部一千余人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领导人董朗、叶庸、徐向前、袁平等，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起义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

黄琪翔回忆说：“张发奎和我回到了驻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司令部，此时薛岳同一些将领也先后来到军部。当时众议纷纷，莫衷一是，暴动部队已经退出市区，市内秩序相当混乱。我提议派人找叶剑英参谋长回来共同商议善后。忽然有人大声向着我：‘军长，你受骗了。有人看见叶参谋长在公安局指挥参加暴动的教导团作战。’我这才知道叶剑英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暴动。跟着，薛岳的部队四出搜查共产党，并派兵往沙面苏联领事馆搜查抓人。还有些外省人，因为不懂广东话，亦无辜被认为是共产党人被捕杀害，造成了流血大惨案。”¹

按照张发奎的说法是“灵魂交付炼狱之后，便不需要和尚超度了。”第四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大开杀戒，进行血腥镇压，惨遭杀害者达五千余人。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张发奎发现起义军佩戴红巾，于是叫自己的部队佩戴白巾，并下令：凡佩戴红巾者一律格杀；而在此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农运领袖澎湃、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等，则下令：凡不戴红巾者视为白匪，同样格杀。

本来思想倾向国民党左派的薛岳，曾经还保护过共产党人，暴动爆发时，他在广州的家里躲了三天，可是等到他的部队一到，薛岳的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共产党人毫不留情，杀人不眨眼，表现得极为残酷无情。

薛岳率兵冲进东山的苏联领事馆，逮捕了驻广州的副领事哈西斯（中文名字叫何锡思）等人，并把他们游行示众，然后枪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毙。在燕塘龙眼洞附近，还有另外的六位俄国人被枪杀，他们每人都佩戴红巾。据苏联领事波赫瓦林斯基事后回忆，领事馆外交官乌科洛夫、伊万诺夫、马卡罗夫、波波夫等人在被杀害之前，还曾受到侮辱，“每个人的身上都被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一路上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往他们身上



薛岳

吐唾沫。他们就这样走了一俄里半，来到了公安局大楼前。在那里的广场上，他们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他们被枪杀了。”薛岳还想枪杀苏联领事馆领事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但是被张发奎阻止了。张发奎认为如果这样做，后果会极为严重。

黄琪翔在第四军内实施“分共”，始自广州暴动之后。他没有枪杀自己部队中的任何共产党员，而是让他们自由离开部队。当共产党起义部队撤出广州之后的第二天，即12月14日上午，黄琪翔来到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正式宣布“分共”。第二十六师当时的驻地在高要。“接许志锐师长通知：全师部队长及政工人员于大操场集合，听候黄（琪翔）总指挥训话。陈卓凡率政治部同仁皆参加。从广州赶来的黄琪翔讲话，严斥是次教导团的行动为‘叛变，并宣布：广州共产党暴动，本师官兵应团结一致，严守纪律，不为所动；师政治部即行解散，所有军械交军械处封存，全体政工人员一律遣散；全师整装待发，开赴广州平‘叛’。”¹ 当天下午，第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陈卓凡带领十几名政工干部离开了部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共产党员。

14日，广州贴出安民布告，谓“此次护党军出防各属，致令共党暴徒趁虚而入，窃据省垣，焚杀抢掠，扰害民众，疮痍满目，

1 《沈沛霖回忆录》，p078。

良用疚心，现回师靖乱，妖魅肃清，从此保卫省垣，务期周密。”下署名：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公博4人。

广州起义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与苏俄断交，将其各地使领馆全部关闭，驱逐所有苏俄侨民。而斯大林则表示只承认北京北洋军政府。至此，1923年中国国民党与苏俄达成的《孙文越飞宣言》，宣告寿终正寝。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作出决定，公开宣布解除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一切职务，但是这道命令只是一纸空文，广州并未执行。浙江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南京党部等纷纷发表通电，要求“驱汪讨共”。李济深的势力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救粤后援会”，更是气势汹汹，于15日发表强硬通电，呼吁“请缉捕事变主谋之汪精卫及其他粤委，就地正法！”¹

17日，广州军政府的后台老板汪精卫发现大势已去，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不想为广州暴动承担任何责任，于是宣布辞职，并且通电谴责第四军张发奎、黄琪翔等人，然后他去了法国躲避。张发奎当然很失望，斥之为“这就是政客们的权术！”²李济深通过陈可钰趁机与张发奎谈判，条件是张发奎、黄琪翔辞职，把广东的地盘交还给他，这样就可以既往不咎，不再与第四军作战。

无计可施的张发奎，与他下属的将领们商量后，只能满足了李济深的条件，公开承认“本人现深悔逐李济深黄绍竑事之孟浪，愿恢复粤垣后，即下野以谢国人。”³

京城南京的人们都在指责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人，把他们视为共党同伙。陈公博感觉到很委屈，说：“京中不少的同乡、京官不只以为我们是召乱，而且是肇乱，差不多以为我就是共产党，带领共党暴动的也是我。那罪声致讨的声势，真是咄咄逼人。他们已忘记共产党，而专心致志的要向我惩罚。”⁴

1 1927年12月23日天津《益世报》第三版。

2 《张发奎口述自传》，p111。

3 1927年12月14日天津《益世报》第三版。

4 民国廿六年《民族杂志》第五卷第一期至第八期合订本，陈公博《军中琐记》，p1147。

陈公博言过其实。京官确实有人在大骂第四军是共党同伙，不过矛头的焦点直指汪精卫、张发奎和黄琪翔。陈公博在“张黄事变”中的作用和影响，比黄琪翔还要差了许多，不过是汪精卫的走卒而已。

汪精卫对外宣布辞职后，名义上去国“考察”，实际上是金蝉脱壳去躲避风头，让张、黄两人承担责任。黄琪翔闻讯后，给汪精卫发去一封电报¹：

汪主席钧鉴：

琪翔奉命回粤，席次韶关。阅知钧座于政府移宁之后，忽引咎高蹈，远道传来资惑。党国艰难，于今为甚。钧座秉总理遗训，为党国柱石，历年奋斗，功德无庸赘述。至容共经过，凡属党员均应同负其责。钧座必断独自引咎，安得谓平？目今国内军阀尚未肃清，而帝国主义者仍不断施其压迫，钧座为革命领袖，实未至遮高时也！琪翔候命岭南，谨率全军将士竭诚拥护。谨电奉闻，诸维亮察。职黄琪翔呈寄。

黄琪翔的这封电报，看似在捧汪精卫，实则在挖苦嘲笑他。其实黄琪翔自己也明白，事已至此，下野流亡，已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黄琪翔早在12月17日就通电下野，同时宣布引咎辞去总指挥、第四军军长、卫戍司令等各职。第四军军长之职由缪培南担任，薛岳为副军长。18日，黄琪翔来到香港，候船出洋。他是第一个为“张黄事变”和“广州起义”承担责任的高级将领。

可是，就在黄琪翔由广州前往香港的渡轮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此时，李济深与香港殖民政府关系密切，双方达成协议，一

1 台湾“国史馆”《汪兆铭史料》，典藏号118-010100-00004-016。本文无标点，系作者所加。



丘哲

旦发现黄琪翔进入香港就予逮捕，然后寻机移交广州市政府。这一消息被黄琪翔的同乡挚友丘哲¹获悉，于是丘哲借用了富商的一艘快艇，登上已在海面上的渡轮，将黄琪翔接了下来。

黄琪翔当时只穿了一件衬衣，匆匆登上快艇，没有来得及告知同在船上的家人。² 抵达香港后，黄琪翔被直接送往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馆躲藏起来。香港政府派人搜查了渡轮，结果

自然是一无所获。

五天之后，即12月22日，张发奎也通电宣布辞去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委会主席的职务。陈公博也于同日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

可是，李济深没有履行他对张发奎许下的诺言。他调集陈铭枢第十一军陈济棠、徐景唐两师，及第七军黄旭初、伍廷颺、吕焕炎三个师，1928年1月14日至19日，在粤东北的五华地区与第四军展开决战，第四军的勇将、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1894—1928）阵亡，黄镇球（1898—1979）身负重伤，官兵战死逾半数。手足相残，莫过于此。双方激战数日，第四军军心不稳，又无后援。李福林又见风使舵，率部和广东海军一起倒戈，第四军无力再战，缪培南只得率部退往粤北，后至赣南，终被蒋介石收编。

白崇禧说：“因舆论攻击，以事变之过归张（发奎）、黄（琪翔），（第四军在广州）站不住复退出广州，其实以退为进，到了东江先消灭陈济棠在东江的队伍，并即回师追击。此时徐景唐及黄绍竑援军赶到接战，遂发生‘潭下之役’，钢铁两军相遇，

1 丘哲（1885—1959），原名竞荣，字映芙；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黄冈起义、黄花岗之役和辛亥革命；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广东省农林厅厅长、民盟中央常委兼南方总支部副主任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

2 事见《黄琪翔传》p45。

打得十分激烈。此役张的师长许志锐战死，黄镇球足部受伤，而十五军团死者不少。”“经过这一仗，他们（第四军）才退往赣南，旋受中央收编。”¹可见，即使张发奎和黄琪翔离开了他们的部队，第四军依旧在与李济深、黄绍竑的粤桂联军作困兽之斗。由此说明驱李（济深）捉黄（绍竑）的本身，是关系第四军自身的集团利益，而非个人恩怨，只是在穷途末路之际，第四军不得已投奔了蒋介石，为中央军所收编。



许志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分化的对象就是张发奎统率的第二方面军，反过来说，镇压共产党人的“广州暴动”，也主要是来自张发奎的部队，而在国民党举行的“清党”以及“分党”运动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右派有意混淆了阵线，甚至把他们指责为共产党人，原因就是他们曾经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

白崇禧对蒋介石总司令说：“张、黄甘心背叛，曾经国府申令讨伐在前，粤桂将领主张通缉在后，整饬纪纲，实不可忽略。至其部属共党甚多，吾辈在宁清党时期，张部曾经顺流东下，因七军调回芜湖，故尔中止。当时反动情形，想公必能忆及。”随后，白崇禧又骂汪精卫等，说：“至于附逆委员，丧心病狂，甘做共党工具，认张、黄之叛变为护党，颠倒是非，湮没正义。沪宁方面，无人敢指其非诚，可为世道人心痛哭！”²

1927年的年底，李济深重新把持广东省的军政大权。当李济深赶走了张发奎和黄琪翔之后，他回到广州，在泰康路勒刻石碑：“在汪精卫与共产党员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领导下发生了广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白崇禧口述自传》（下），p398。

2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620-027。

州暴动。”，以此来羞辱他们。

李济深等还以国民党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名义，向蒋介石告发：“张、黄据粤时，曾以本会的名义向中央银行提取毫洋二十四万元，声称作总部军费。究竟该款有无收到？请查明赐复。”¹

1928年2月6日下午，李济深和黄绍竑主持的广东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查抄张发奎、黄琪翔私产充公，以作中行基金。

黄琪翔说：“我逃到香港以后，同乡丘哲把我送到一家日本旅馆藏了起来。那时香港政府与李济深有友好关系，立意把我抓起来，送交广州政府。由于香港政府没有发觉我的行踪，因此得免于难。我觉得香港终究不是久居之地，急着另找安全的避难所，于是通过丘哲的介绍，和在日本神户做生意的同乡潘植我取得连（联）系，他对我表示欢迎。1928年春天，我离开香港到日本神户，住潘植我家。”²

随后，张发奎也来到了日本神户，住进潘植我家。潘植我与张发奎也是老朋友。张发奎此次来日本之前，曾经去上海与蒋介石会晤。为防不测，蒋介石还派了戴笠和杜月笙去保护他。蒋介石建议张发奎出国走走，但不要走得太远，如果国内出了事，蒋介石要他回来工作。蒋介石知道张发奎是新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老对手，而李济深又是新桂系的盟友，所以想借用张发奎的名望来制约新桂系。

黄琪翔与张发奎在日本大约住了半年，受到了潘植我热情接待。在日本，张发奎的化名叫“邹醒春”。

有一天下午，潘植我带着黄琪翔、张发奎以及一位台湾的朋友前往艺妓馆游玩。那位台湾朋友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却叮咛

1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 002-080200-00033-097。

2 潘植我（1885-1953），广东梅县人。清光绪卅三年，应宗亲侨贤潘祥初之招，赴日本学习纺织漂染工艺，后转入东京机织学校学习。因得其宗亲潘君勉等人支持，集资在神户开设得人和商号，一度与三井、三菱财团齐名，号称旅日华商第一家、梅县首府，享誉三、四十年。潘植我是一位爱国侨领，他切盼祖国强大昌盛，竭诚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满革命，曾将三年薪金之积蓄全部捐献充作革命经费。1940年逃亡印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险遭日军杀害。1945年日本投降，幸亏张发奎通知盟军将潘植我从海南岛集中营救出，即回香港疗养。1953年在香港病逝，张发奎等亲往吊唁。那时黄琪翔已经在北京。

不要让日本人知道他是台湾人。为什么？因为台湾当时与朝鲜一样，是日本的奴隶国，日本人不允许他们进入这些场所。黄琪翔和张发奎都很吃惊，一方面觉得日本人的狂妄自大，一方面感受到亡国奴的悲哀。

这时，中日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时常发生摩擦。黄琪翔说：“此时，在国内，蒋介石又重新上了台，国民党军继续北伐，在济南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即当年所谓‘蔡公时事件’。蔡公时是国民党派在济南的交涉员，给日本人杀害了。这就造成了中日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住在日本的中国人，随时有被侮辱和杀害的可能。日本再不能呆下去了，于是我决心转往欧洲。”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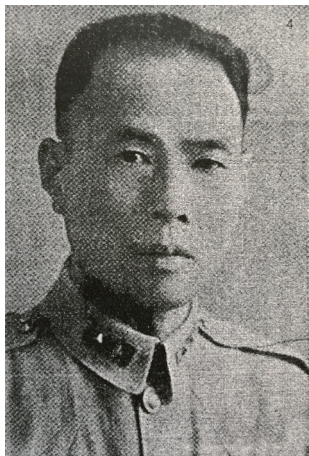
1928年6月间，黄琪翔、张发奎回到上海。至此分手，从此各奔前程。

回国不久的张发奎，又带着妻子刘景容再度出国，前往的目的地依旧是日本，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冯次淇和谢膺白夫妇。那时，冯次淇和谢膺白都已经失业。冯次淇（1889—1954）曾是许崇智的旧部，此前任广东政治分会的中将参谋长。谢膺白（1890—1957）是在叶剑英之后，成为第四军的参谋长，再后来成为第二十五师师长。谢膺白是日本留学生，娶了个日本妻子，所以谢膺白在此行中担任他们的日语翻译。

自从张发奎与黄琪翔离开他们的部队以后，身为军长的缪培南带领第四军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北伐战争。1928年2月2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会议决定继续北伐。蒋介石任命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蒋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总兵力约70万人。此次北伐的对手是占据北京、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的北洋军阀“安国军”。8月北伐取得了胜利，北京遂改名为北平。

1928年12月，奉系首领张学良少帅在东北宣布易帜，接受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廖培南

国民政府的领导。此时，新疆等地也已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国民党在形式上取得了全国统一。同年9月，张发奎、黄琪翔用鲜血和汗水浇灌的“铁军”第四军，已经被缩编成第四师，由原来下辖五个师，一下子缩减为一个师，廖培南继续当师长，下辖三个旅和三个团。副师长薛岳怒而辞职，这个空缺的职位就由朱晖日继任。

1929年1月19日，第四师团以上军官集体写信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主动请求解散自己的部队——外人还以为这是第四师内部出现了状况，在自我糟蹋。其实不是，而是第四师军官们使用的激将法。因为蒋介石嫡系第一军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并没有做出突出的贡献，却不断得到扩编和充实，而为北伐战争做出巨大贡献的第四军却被严重削弱，由1927年统辖三个军的方面军，一下子缩减成一个师的编制，前后才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认为蒋主席一碗水没有端平，实在不公平。

遗憾的是，蒋介石根本不想倾听军官们的抗议，而是变本加厉，继续把第四师削减为三个旅、一个教导团以及一个师直属营。师长廖培南愤而辞职，朱晖日继任师长。这件事使军官们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的自私自利之心，因此不服他的领导，这也是蒋介石执政时期一次又一次遭遇反抗的原因。而那个在北伐战争中功勋卓著、风光无限的“铁军”第四军，自此不断被削弱，以致萎靡不振。

不过，黄琪翔此时已经离开了他的祖国。1928年6月，黄琪翔从日本回国后，先是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于7月坐轮船前往德国柏林，进入柏林大学进修德语。

为了报复黄琪翔，李济深以反腐败为理由，令广东政治分会查抄了黄琪翔的广州公馆，还下令严查黄琪翔老家的“在籍产业”，

准备予以收缴。

时任梅县县长伍子车奉命去调查，将调查结果于1928年7月12日呈报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裁甫。县长伍子车调查的结果是黄家“所遗旧屋二间，尝田五担，折合一亩余”，还不能确定“是否系黄琪翔个人所有”。厅长刘裁甫见黄琪翔家的确没有什么油水，只能在这份呈批件上批复“应即再行切实查明，具复”。¹这件事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1 1928年广东民政厅《公报》创刊号。

第五章 追随邓演达和福建事变

一、孙中山的奉安大典

黄琪翔决定去欧洲德国，而不是去法国或者英国，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国内接受7年军校教育，一直学的是德语，他相信自己的德语水平能够适应德国的生活和学习。

黄琪翔是职业军人，处处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观察社会，思考问题。在经历了这些年的血腥战争，尤其是北伐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所谓的“张黄事变”之后，他开始对政治这一关乎世界观的课题，抱以浓厚兴趣。

黄琪翔不能不注意到：人际关系常常受到政治影响。比如叶挺，他们从小一起在军校长大，本是手足兄弟，可是一旦分化为不同的政治阵营，立即刀枪相见，水火不容。而所谓人民的权利、社会的幸福和国家的未来，在政客们的手中，犹如一个万花筒，颠来倒去，迷惑人心。他意识到，军人本是政治的附庸，既是政客玩偶，又是杀人机器。而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自己应该怎样保持清醒的头脑？怎样走未来的道路？必须要冷静地思考，必须要重新学习，去寻找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宋庆龄

来到德国以后，黄琪翔在柏林大学进修学习。他邂逅了邓演达和宋庆龄，折服于他们的政治见解和主张，随之而来的是，黄琪翔的人生发生了很大变轨。

在1927年6月底7月初的北伐战争期间，邓演达就已经秘密离开武汉，过潼关与回国的苏联顾问结伴同行，于8月15日抵达莫斯科。过了一段日子后，他动身前往德国柏林。这时，除了宋庆龄、邓演达之外，朱德、叶挺、陈友仁（1875—1944）等也相继来到了德国。他们在德国的交往很频繁。宋庆龄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共产党人“叶挺和他全家（还包括一个保姆）也在这里”。“在此越冬”¹。不久，宋庆龄、叶挺等又分别回到了莫斯科。

黄琪翔回忆说：“在柏林，我遇见了宋庆龄、邓演达和叶挺等人，他们都是大革命失败后，先后经莫斯科转往德国的。宋庆龄和邓演达在大革命失败前都是国民党左派，是国共分裂前离开武汉，前往莫斯科的。我发觉她们这时政治上各有不同态度，但都对莫斯科表示冷淡。邓演达此时埋头读书，钻研理论，但由于当时的德国是社会民主党的统治，邓的思想多少受到影响。邓演达不忘国内政治，但他离不开国民党的局限。邓计划成立新党，我思想上是赞成的，因为直到那个时候，我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究竟是谁是谁非，始终分不清楚，邓演达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象征，因此他的所言所行，我都寄予希望和支持。我实际上成了他的追随者。”²

黄琪翔在柏林邂逅宋庆龄的时候，正是宋庆龄的思想和感情受到共产国际伤害的时刻。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柏林召开会议。宋庆龄本是这个同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名誉主席之一，而且她还身在柏林，可是这次会议却没有通知她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黄平在这个会议上，当着邓演达的面，指责说：“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

1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p223。宋庆龄1931年5月1日致杨杏佛的信。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群众”。¹这令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宋庆龄、邓演达愤怒无比。这次会议之后，宋庆龄到柏林康特大街中国饭店吃饭时，遇见了黄平等人。双方形同陌路人，互相不打招呼。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黄琪翔受到邓演达思想的影响，成为邓演达缔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要助手之一。

黄琪翔和邓演达本是校友，彼此非常熟悉。邓演达比黄琪翔大三岁。黄琪翔在陆军小学时就耳闻邓演达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学习非常刻苦。广东陆军小学停办后，黄琪翔和邓演达一起被转送到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学习，然后在1919年同时毕业于保定军校。之后，黄琪翔去了北洋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任中尉排长，而邓演达则回到广东参加粤军。1920年后，邓演达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曾两次率兵讨伐叛军陈炯明，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嘉许。在大元帅府建立后，孙中山调邓演达任拱卫之职，赠对联曰：“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并说“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²孙中山所说的“两达”，一是指民主革命的骁将张民达（1885—1925），二则是指邓演达。

黄琪翔于1922年才回到广东参加粤军，虽然与邓演达时常见面，但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们无法静下心来倾听彼此心声。直到1928年8月至1929年5月这近一年时间里，他们重逢在德国柏林，终于可以坐下来促膝谈心。黄琪翔认真倾听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之后，十分钦佩他的爱国忧民思想，于是成为了邓演达的追随者。

邓演达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早



邓演达

1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黄平《回忆往事》，p67。

2 丘挺《邓演达年谱》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8。

在北伐战争时期，他阅读了布哈林的唯物辩证法的德文译本；在莫斯科阅读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革命问题》；在柏林，又研读了马克思的大量著作。¹1928年6月，邓演达致丘哲的信中说：唯物论应该区分成历史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两种，在政治上（也就是在社会问题上）如果坚持机械唯物论，就会陷入反动的唯心论，并提出推进历史前进的只有一元，生产技术的发展！但是在历史的行程中，生产力发展可以推动进步的意识，即觉悟的意识——这表明，邓演达此时已经掌握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开始酝酿成立新党。

邓演达在柏林还成立了一个读书学会。这个学会的名称叫“断金学会”。“断金学会”最早在1918年就已成立，邓演达时为保定军校学生。最早参加者是邓演达、严重（1892—1944）和陈式恒（1891—1923）三人，都是保定军校的在校生，寓意为“三人同心可以断金”。在德国时期，黄琪翔、叶挺、万灿、詹显哲等人，都在这个学会里共同学习与研究，讨论世界大势和中国革命诸问题。邓演达是主讲人，也是这个学会的负责人。

为了考察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邓演达在此间到访过法国、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去过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的多个城市和乡村，而且几乎走遍了德国。黄琪翔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曾利用假期陪同邓演达到过某些地方去旅行，²进行社会考察，然后俩人同中国社会作比较，常常畅谈到深夜。

邓演达是位激情澎湃的革命家，主张社会的激进改造。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可谓高屋建瓴，鞭辟入里。他说：“中国现时的社会，在形式上因为有异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论，的确还离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

1 参见华文出版社2001年5月版《邓演达研究新论》，p236。周蕴蓉《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2 王大鲁、刘青云著《黄琪翔传》，p59。

还停留在封建势力支配的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原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因此，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革命。应在历史的体系上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未竟事业，打倒一切孙中山先生主义的叛徒们，恢复中断的中国革命，具体地说“是要平民群众运用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根本的推翻封建的军阀官僚政治，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建设，过度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所以，对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他在经济上主张肃清中古时代的残余，对小农经济生产加以改造，同时对帝国主义侵入后的买办高利贷经济，应加以清除，而以集体的力量，构成“计划经济”或“国家经济”，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推进。在政治上，他主张铲除官僚政治及军事独裁，彻底清除士大夫地主豪绅专政的传统政治形态，而由人民直接掌握政权。

邓演达的社会理想大略是：在社会上主张扫除“名分”、“偶像崇拜”，特别是在文化上，要扫除士大夫阶级的“寄生文化”，而代之以人人所应有的“生产文化”，创造“劳动文化”。为达到上述的目的，要认定一切争斗的总和是政治斗争，标榜以建立“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为斗争目标。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则在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过度的办法。”¹

邓演达的新思想令黄琪翔茅塞顿开，感到新鲜而刺激，为之折服。他犹如黑夜里寻找到一盏明灯，于是完全接受了邓演达的思想，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之中。不光黄琪翔如此，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为之感染。宋庆龄说：“看他（邓演达）的信，像看小说一样，常希望这个小说是永远看不完的。”²

黄琪翔踊跃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成为邓演达最重要的助手，并且自觉地投身于国内的政治运动。张发奎也说过，黄琪翔是在

1 中华论坛社 1945 年 11 月版《邓演达先生行述》，p10。

2 中华论坛社 1945 年 11 月版《邓演达先生行述》，p15。



邓演达（右二）与宋庆龄等在苏联高加索地区。

柏林时期，加入了邓演达的“第三党”。那时，黄琪翔才31岁，邓演达也只有34岁。他们都很年轻，对未来报以强烈的渴望，大有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豪迈感慨。

1929年5月，宋庆龄时在莫斯科，她给黄琪翔发来电报，说自己即将要来柏林，届时请黄琪翔去柏林火车站迎接。

黄琪翔回忆说：“大约是1929年9月间，宋庆龄忽然由莫斯科给我来了一封电报，说要到柏林来有事商量，要我到车

站去接她。我接到她之后，她对我说，国民党蒋介石在南京建成了中山陵，决定把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的西山移葬南京，要她回去主持，并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陪她回国。我说，在武汉政府的时期，我在第四军，反对过蒋介石，回去恐怕对我不利。她说，她愿以全力担保，不致有任何意外或危险。于是我答应下来，陪她回国。我们是由柏林搭火车经过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在莫斯科的时候，受到了苏联政府的招待。在沈阳的时候，也受到了张学良的招待。同时宋庆龄的兄弟宋子良（1899—1983）和宋子安（1906—1969）也到沈阳来迎接。我们到了北京（北平），护送孙中山灵柩回到南京。”¹

需要指出的是，黄琪翔在上述回忆文章中把时间记错了。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1929年他陪同宋庆龄由柏林回国的时间应该是5月，而非9月。而且，黄琪翔是作为宋庆龄的随员返国，这个主意就是邓演达提出的。

有文章说：“邓（演达）考虑到须对中国现状多加了解，与宋庆龄商议后，派黄琪翔以秘书的身份随宋回国。”¹所言“秘书的身份”也非确切。黄琪翔当时不是宋庆龄的秘书，而是随员，因为宋庆龄的秘书另有其人。

宋庆龄来到德国后，住在柏林里城堡大街7号，邓演达经常来看望她，并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担任译员的章克，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和对外联系。

此时中山陵已经建成，国民政府将举办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典礼，于是邀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

孙中山的墓地，是他本人亲自选定的。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辞退了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1日一早，便约了胡汉民等人骑马去南京紫金山打猎。他在攀登到紫金山南坡时，向远处眺望，顿觉心旷神怡，于是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孙中山高兴地对同行者说：“候他日逝世，当向国民乞求一块土，以安置躯壳耳！”传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灵谷寺主持长老也曾向孙中山推荐过这块葬地。

黄琪翔便以随员的身份陪同宋庆龄回国。他们于1929年5月6日离开柏林，取道苏联莫斯科、西伯利亚回国。

5月16日，宋庆龄和黄琪翔等人抵达东北重镇哈尔滨。这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大批要人均赶到站台迎接，其中包括苏联和日本的总领事。宋庆龄一下车，就派黄琪翔发表声明：“所有中央委员一职，拟即辞去，夫人此次回国，纯为总理奉安典礼，不谈政治。”

5月17日下午2时30分，宋庆龄抵达天津车站。孙中山之子孙科和儿媳陈淑英夫妇、林森、郑洪年、吴铁城、傅作义等往

1 樊振《邓演达年谱合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6月版，p215。

车站迎接。据当地的报纸报道：孙夫人抵达天津车站时，众多记者包围了她的车厢。黄琪翔出面劝慰记者，不要打扰孙夫人。报道说：“宋谓未亡人出亡国外，不便（接受记者）招待，托黄琪翔一一告乏，遂赴香山。”

5月18日下午6时抵达北平。7时20分，他们一行来到香山碧云寺。宋庆龄“因长途旅程疲惫和心情悲痛，到碧云寺时，已不能移步，下车后由陈淑英（孙科夫人）等搀扶而行登上金刚宝座塔。到灵前敬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手指灵梓，要看孙先生的遗容。卫士揭开覆盖在棺梓上的国旗，扶她登石台入塔内，她呼喊着重：‘总理，我在此地，你往那里去了！’”宋庆龄难掩内心悲伤，扶棺大号，泪如雨下。

5月19日，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何成浚（1882—1961）致蒋介石电：“此次由欧偕孙夫人到平者，尚有黄同志琪翔及秘书二人。



1929年5月26日，黄琪翔陪同宋庆龄等亲属护送孙中山先生灵柩前往江边威胜舰，孙科（前左一）、陈淑英（前左二）、黄琪翔（前左三）、宋庆龄（前左四）。

谒灵时，职已同往行馆，一切由行营照料，诸凡顺遂。”¹

5月22日上午7时，举行孙中山遗体改殓仪式。宋庆龄偕随员黄琪翔等步入灵堂。孙中山之子孙科、陈淑英夫妇、女婿戴恩赛，以及林森、吴铁城等替孙中山更换殓衣。孙中山的遗体本是殓在楠木棺梓内，这次奉移到从美国定购的铜棺中。据参加改殓仪式的人说：先生“面目如生前静睡一般。”

5月23日上午6时至5月25日下午5时，供社会各界3天公祭。

5月26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自北平碧云寺起灵时，举行了起灵仪式。胡汉民站在第一位，接着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而黄琪翔就站在宋庆龄的右侧，位列第三。

5月28日上午，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专列启运南下，抵达南京后，停灵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从5月28日起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特任官轮流在中央党部守灵，3人为一班，每班4小时，共22班。第一班由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守灵。

5月29日至31日为公祭日。三天公祭结束后，5月31日下午6时，举行封棺典礼，由蒋介石主持，席楚霖任宣赞。

6月1日是奉安日，孙中山的灵柩下葬。奉安委员会通令：首都南京下半旗7天，各地下半旗3天。市民停止宴会7天。

孙中山奉安大典结束后不久，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黄琪翔在南京见到了蒋介石。这是黄琪翔在北伐战争之后第一次再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于黄琪翔将军的印象当然是深刻的。

黄琪翔回忆说：“由于宋庆龄的介绍，我第一次和蒋介石见了面，没谈什么，寒暄而已。”²

孙中山奉安大典结束以后的第二天，黄琪翔陪同宋庆龄回到上海。时在1929年6月2日。由此可见，正是得到宋庆龄的襄助，黄琪翔得以陪同宋庆龄参加总理奉安大典的名义顺利返国，摆脱了因“张黄事变”而导致国民党及其粤军对他本人的围剿。

1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6-00007-268。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早在1927年的夏天，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和鲍罗廷等来到苏联。行前，她发表了《赴莫斯科声明》，痛斥蒋介石等是“孙中山遗训的叛徒”，是“投降帝国主义的逃兵”，宣布自己辞去国民党中央执委的职务。宋庆龄回国后，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仍然希望她站在自己的一方，派妻子宋美龄来游说，对宋庆龄展开了威逼和利诱。

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曾向黄琪翔表示，她自己不希望会见任何人，不管是蒋介石派来的人，还是邓演达的同志。黄琪翔随即将宋庆龄的态度转告身在国外的邓演达。为此，1929年6月23日，邓演达致函季方，替宋庆龄解释说：“接奇兄（黄琪翔）的来信，知道最近他及她的经过，你还未曾和他见过面？她的立场目前是很困难的，我想你目前不必和她见面，因为一方面她不愿意谈话，他方面她也不愿意和外人见面。”¹

1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p476。

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诞生

黄琪翔说：“1929年（6月）我回到上海以后，没有什么活动，闲居度日而已。”¹

1929年10月11日，邓演达离开巴黎，去了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领袖的祖国”——英国考察。他本打算再回巴黎，与宋庆龄见面。邓演达在1929年10月24日给季方的信中说：“庆姊（宋庆龄）等重来，谅日间可以在巴黎相见。我们只希望她能原则上的积极，并不强求她怎样具体地去出力工作。她是中国革命的表证，我们应当尊重她。”²

在英国，邓演达起草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他在《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目前的口号，不是反蒋讨蒋，而是整个的推翻军阀官僚地主号声的统治，不但是要反对南京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挂名反对南京的军阀政客。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去实现孙总理的未完的工作。”宋庆龄非常赞同他所表示的对南京政府及国民党改组派的态度，并告诉邓演达，时在巴黎的汪精卫屡次派人来找自己，被她坚决地拒绝了。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的表态也仅限于此。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p490。

邓演达在这份《宣言》中还有重要的内容，就是针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评价，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先后走入反革命或破产。”又说“共产党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叫中国做成苏联的属邦，蔑视中国独立的要求，已经由客观的事实证明了他的空想，失坠了他领导中国革命——民族的革命——的资格和使命。”邓演达如此激烈的态度，恐怕宋庆龄是难以接受的。

邓演达没有再回巴黎去见宋庆龄，他改变了主意，于1930年5月间，由德国回到上海，找到了黄琪翔，并开始从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组建工作。

黄琪翔说：“我支持了他（邓演达）的活动。”¹邓演达还与时任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陈诚进行秘密通信，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陈诚复信表示钦佩，并完全赞成他的主张。

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法租界成立。至此，邓演达一手缔造的新的政党诞生了，它的简称叫“临委会”。来自十个省区的代表三十多人参加了成立仪式。作为主要领导人，黄琪翔也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会议召开的地点在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是音乐家黎锦辉（1891—1967）的住宅。黎锦辉是中国流行歌曲的开拓者，其代表作有《麻雀与小孩》、《蔷薇处处开》、《桃花江是美人窝》等，曾风靡一时。

在成立大会上，邓演达致开幕词。他说：“中国革命已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要“挺身而出，重上战场。”在《政治主张》中他指出，“我们的使命首先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官僚独裁统治。”这些政治主张，其实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政治纲领基本相同。在会议上，他还明确提出“军事第一”的行动纲领，认为“必须搞军事运动，一定要搞垮蒋介石的军队，不然不行。”

“临委会”成立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是邓演达、黄琪翔、季方、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严重和邓宝珊。这一时期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发展组织，争取蒋介石军队里的黄埔学生，为军事起义做准备。黄琪翔被派往广东和北平等地开展工作。

邓演达在上海曾主动找到中国共产党，希望就联合反蒋的事宜进行合作。周恩来回忆说：他“曾找到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¹ 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所以不理睬邓演达，主要原因是当时党中央贯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了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立场。邓演达也说：“我回国后到上海，曾约共产党负责人谈判合作反蒋。但他们不理我。这个问题，只好待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谈了。”²

在这种形势下，邓演达没有气馁，还是把党组织建立了起来。当时和他共同活动的骨干人员有谭平山、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李世璋等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还有一些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的退党人员。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又不愿跟共产党走，因此自然拥护走“第三条路线”的政治主张。黄琪翔说：“邓演达和谭平山都是大革命时期的知名人士，但他们中间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不同的意见，而邓演达在社会上的声望比较谭平山要高一些，因此邓演达有较好优越的条件，以一个党派的首领身分（份）出来组党。”³

9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公开发表，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上海新闻》做了摘要刊登，并给它取了个绰号叫“第三党”。邓演达对此很不满意，即派施方白前往报馆交涉。无奈这个称谓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既定事实。

邓演达回国后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临委会”和他自己的思想。他的观点非常先进，这让许多人误以为邓演达是共产党人。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要把千余年来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革命的任务是“解放中国民族，

1 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周恩来选集》（上）p167。

2 樊振《邓演达年谱合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6月版，p233。

3 黄琪翔《我的自述》。

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¹毛泽东评介“临委会”和邓演达时说：“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始终反蒋不反共。”²

“临委会”的活动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1931年1月，陈诚已升任为第十八军军长。在第十八军内部，官佐也已发展了60余位“临委会”的成员。冯玉祥、杨虎城也与“临委会”建立了联系，提供帮助。

1931年6月、7月，邓演达致黄琪翔两封信札，内容极为重要，保留至今。从信中可以窥见“临委会”在当时的工作进展情况。³

6月22日，《邓演达致御行（黄琪翔）信》：

御兄：14、19二函均奉悉。甚慰。兹简复如下：

一、情况

1，北方石（友三）孙（殿英）在二周以前已决心动作，并确已将小张（张学良）方面的代表某活埋，因小张突调兵三旅入关镇压，又吓缩了，现时还在酝酿中。

2，×××来了两次亲笔信，派了两次亲信人来找××回去商量办法，××现已决心回去，只待十天左右即可决定细目。

3,11D又14D的工作现在大规模的进展，已派特派员去指导。

4，陇海线的回乡军人已具体形成，已派专人前去设立指挥机关。

5，其他亦正规的加速度的发展。

二、判断及处置

1，在最近期间，还不能发生直接行动，你应加紧准备。

2，在政治方面应加紧与×联系，并设法叫他知道我们的军事力量和确定“无”包揽的“野心”，并示意于他，

1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邓演达文集新编》，p342。

2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邓演达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38。

3 这两封信札内容见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邓演达》。

请他负政治全责，我们在军事上帮忙他。在××部下，我们也有办法，对×应表示好感，而且对其它各派也应表示好感，如有可能，以不失团体的威严为度的可插入政府军事机关或军队中去。

3，军队工作应加紧，×军（指陈诚的18军）中已找出极好的工作能手，日间即派回见你，你应指导他工作，我相信有很大的效果。一方面又应赶紧联络幄奇及旋空等，最好能插入行伍出身的同志或旧部到他们队伍中去。

4，陈修爵及翁辉腾等均可对党用的人，陈已决来此，翁宜设法与元发生关系（可由陈卓凡介绍）。

5，广州工作应加紧，极有望。维卿话是庸人的看法，不可信。现时要紧的是要利用种种机会插入人去，掩护工作人员及组织的进行。

6，×处已有直接的联系，侯×××回时即可介绍引夫与他见面办理，以后的事务我会有信给他带去。

7，韩继文应叫他注意，现时蒋派出大宗黄埔生回粤（工作），吴乃宪亦其中之一，不可靠，望勿见他。

8，以后来信望用密写法，防泄漏。

JD 六、二十二

7月3日，《邓演达致御行信》：

御兄：前致密信及屡次托同志们带上之函想已先后收到，未得复为念。

望的狂吠，我曾接×电后发过脾气。昨接×复电，兹奉上。我已再复电给×，说明以后大家更加团结努力的做法。×处的接济多口惠，我们必须更另想办法。引夫不知已否赴粤，希告知。北方近日消息甚多，都说‘快’动，但是我恐怕‘草头’（指蒋介石）还是会败在红军手上，使我们动手更容易些。你以为如何？这边的小报们已拿我们做造谣中心，免费广告之多，可笑！北京寄来的谣言关于你的，兹剪寄来，你居然是“观音兵”，倒也有趣！继文在港如无事，可叫他到“广筹”做工去，必要时再撵他

回来，你如果非十分不得已时同他们鬼混些时也好，请你自决！

JD 七、十三。

需要说明的是，邓演达领导的“临委会”，在1931年6月至7月间面临的大背景是：身处江西的第十九路军，他们还没有做出战略决策，是入粤驱逐陈济棠，还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留在江西剿共，或者举兵起义？而远在北方的石友三、孙殿英，虽已决心反蒋，活埋了张学良的代表，但仍然在观望。冯玉祥正力谋纠合旧部，恢复军事实力，先后两次派亲信张允荣、凌勉之与邓演达商谈有关政治、军事行动的问题。陕甘方面的部队，也纷纷表示，请邓演达派人去指导工作。

1931年的上半年，黄琪翔又接受邓演达的委派，前往广东开展军事策动工作。广东粤军以及黄琪翔的旧部第四军，与邓、黄均有深厚的旧谊。但是，这些军官虽然对他们反蒋行动表示同情，却并不能接受邓、黄的政治主张，因此得不到响应。仅有余汉谋表示出一定程度的默契和联系。余汉谋表示，如果邓、黄发动武装起义，他可做遥望和声援。而真正能为“临委会”所掌握的部队，就是6月22日《邓演达致御行信》中所说的时在江西第十八军下辖的第11师，此外还有第14师。这是陈诚的部队。

8月，按照“临委会”的计划，总指挥邓演达将前往江西的陈诚十八军，策动起义，因为陈诚本人就是“临委会”会员。邓演达早年在粤军第一师任团长时，陈诚做过邓演达的下属连长，所以邓演达信心满满地表示，他将会让陈诚选择“如果你反对起义反蒋，就可以将我捆绑送蒋。否则，或者是同我一道起义，或者你离开部队！”¹邓演达估计，陈诚不致于逮捕自己，而最大的可能性是他自己离开部队，让邓演达亲自指挥部队起义。于此同时，黄琪翔去广州，季方去北平，章伯钧去武汉，展开军事联络

1 樊振编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史（1930—1935）》，未刊本。



前第4军军长黄琪翔加入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的英姿。

工作，以响应江西邓演达率领的军事起义。

在讨论如何起义的秘密会议上，黄琪翔与邓演达的观点是一致的。当时，邓演达说：“起义是可能成功的。如果失败，就将队伍拉上山去进行武装斗争。到那时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但有人反对与共产党合作，邓反驳说：“共产党要反帝反封建到底，我们也是要反帝反封建到底；共产党要推翻南京统治，我们也要推翻南京统治；共产党要实行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实行社会主义。大的方向都相同，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黄琪翔不但赞同与共产党合作，而且认为“必须联共”。¹

邓演达还策动正在江西与红军作战、时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的陈铭枢，又与国民党中的军政要员如蔡元培、冯玉祥、杨虎城等建立联系，制定了反蒋的军事计划，商定由陈铭枢牵头发动江西起义，成功后进入广东地区，在东江、闽南一带发表声明，建立第三种势力的政权。² 届时华北方面杨虎城、冯玉祥等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p43，田光涛文章《远见卓识令人敬仰》。

2 樊振《邓演达年谱合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6月版，p271。

“临委会”的行动，很快被蒋介石察觉。蒋介石一方面派心腹王柏龄、陈群、杨虎在上海侦查，一方面令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与上海租界当局加强联系，并悬赏 30 万元通缉邓演达，还通缉“临委会”的其他要员。

三、营救邓演达

为准备江西起义，新生的“临委会”紧锣密鼓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从全国各地抽调来思想坚定、办事精干的党员已汇聚上海，并连续举办二批干部训练班，计划在训练班结束后，将这批革命骨干力量派往江西陈诚第十八军驻地，参与和指挥起义。可以设想，如果这次江西起义成功，会像共产党在1927年举行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样，震惊国内，给蒋介石的统治以沉重一击。

谁都未曾料到，“临委会”内部隐藏着一个叛徒。这个叛徒的名字叫陈敬斋，化名钟春岑，偷偷地给蒋介石写了告密信。蒋介石特务机构接到告密信后，随即以钟日昌的名义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与之进行秘密联络。

1931年8月17日下午三点，激情满怀的邓演达，正在英国租界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给第二批学员作结业演讲。这个叛徒陈敬斋¹假装肚子疼而溜出了会场，然后与预先埋伏的警备司令

153

1 全国解放后，1949年11月，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提出了“逮捕叛徒陈敬斋归案法办”的提案。1950年3月，陈敬斋在景德镇被捕，随即被押赴南昌，后解到北京，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令北京人民检察院于1951年3月22日向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提起公诉。经过三次审讯，到4月23日下午，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农工党中央负责人李方、严信民、王一帆等应邀旁听。陈敬斋和原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邓警铭被押上法庭。陈敬斋对其叛党投敌、谋害邓演达等罪行供认不讳，并当面对邓警铭敲诈过他2000元。4月25日，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宣读了《军字第245号判决书》，判决：“陈敬斋，江西南昌人，53岁。该犯变节投敌，勾结蒋匪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应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产没收。”然后押出法庭，执行枪决。

部侦察队和租界巡捕取得联系，使之包围会场。完全蒙在鼓里的邓演达等人被租界巡警逮捕。第三天即被租界法院批准引渡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囚禁。

邓演达被逮捕之后，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的特务们迅速展开抓捕“临委会”其他领导人活动，而时在上海的黄琪翔自然是另一个重要目标。

黄琪翔的住宅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永安里13号。特务们来到黄琪翔家，问：黄先生回来了没有？他的家人答道：“没有。”又问：黄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答：“不晓得。”再问：黄先生到哪里去了？还是答：“不知道。”

特务们声称要找黄先生谈事，便坐在楼下客厅里赖着不走。黄琪翔的家人机敏，知道来者不善，索性把家里一楼、二楼、三楼、亭子间和厨房的电灯泡全部点亮，向外报警。

黄琪翔的工作十分繁忙，每天都要很晚才回家，此时家里人早已入睡，电灯自然会全部关闭。即使家里人还没睡，也不会把整个楼里的电灯全部点亮，所以这天他察觉出了问题，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迅速背转身绕道去同在永安里居住的古国屏先生家打探情况，这才知道党内出了大事，邓演达等同志已被捕。

黄琪翔赶紧来到不远处的丘哲家。丘哲夫人是日本人，于是让丘夫人用日语打电话叫来祥生车行的出租车。黄琪翔坐上出租车离去，机警地逃脱了抓捕。丘夫人等黄琪翔成功出逃后，再打电话告知黄琪翔的家人，其家人这才关了楼上的电灯。此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而把守在弄堂口的特务这才如梦方醒。

上海北四川路住着许多日本人，平时横行霸道惯了，几乎没人敢惹，所以特务们也没去盘查过往的出租车，黄琪翔因此安然脱险。

邓演达被捕后，“临委会”的同志们焦急万分，立即展开营救活动。他们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

在那个金钱万能的社会里，营救人是需要花钱的，而且是大把的钱。黄琪翔义不容辞，很快就筹集到五万元，交给了组织，

作为营救邓演达的费用。

国民党当局考虑到邓演达的崇高威望及其众多的社会关系，为防止意外，也采取了防范措施，不停地转换关押场地。邓演达他们是8月17日下午被逮捕，8月19日即被转送到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的囚室，8月21日被押往南京羊皮巷的军政部军法司监狱的所谓“优待室”，10月3日再次转押到南京富贵山炮台废址内。

邓演达曾是蒋介石的战友，在创建黄埔军校时，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筹备委员长，邓演达为筹备委员。军校成立后，蒋任校长，邓曾任教育长。邓演达被捕期间，蒋介石派国民党元老戴季陶（1891—1949）、吴稚晖（1865—1953）、张继（1882—1947）分别来探监，企图说服他放弃反蒋立场，但邓演达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甚至，蒋介石亲自出场与邓演达见面，许以高官厚爵（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或军委会要职），条件还是要邓演达放弃反蒋立场，解散“临委会”与蒋合作。可是，邓演达仍然不为所动，两人在谈话间还发生了冲突：蒋介石问邓演达对“九·一八”有何感想？邓演达冲撞说：“那还不是你连年内战造成的！”¹令蒋别扭不堪。最后，陈立夫派李熙元见邓演达，开出获释的最低条件是要他不再写反蒋文章，邓演达说：“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

与此同时，“临委会”营救邓演达的行动也在积极进行。

8月间，陈诚从报纸上得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已决定将邓演达交付军事法庭会审，他深感不安，在信中对未婚妻谭祥说：“如报纸所载果确，我实无以慰故人”。²他拟学严重那样采取辞职的办法，来挽救邓演达，并托未婚妻设法打听邓的消息。陈诚还亲自给蒋介石致电，请为国惜才。蒋介石回复“准从宽大办理各在案。”陈诚至此心稍宽。

1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6月版《邓演达年谱合集》，p268。

2 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7月版《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P67。

8月19日夜，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有个班长悄悄冒着生命危险提出，自己与邓演达一起逃跑，被邓演达拒绝。这是邓演达被捕后最便捷的逃生计划。但邓演达担心如果自己脱逃，蒋介石必定迁怒其他十一位同志而遭杀害。

10月初，黄埔毕业生徐源圃提出，可利用他手下的亲信班长在军法司监狱执勤的机会，营救邓演达出狱。这个计划正在开始实施，不料邓演达被意外移送到富贵山炮台废址内，营救计划再次破产。

此间，宋庆龄公开呼吁蒋介石释放邓演达；陈诚也专门给蒋介石致电，请求开释他。但何应钦、何键、何成浚等人则联名致电蒋介石，坚决要求杀邓，并说“此人不除，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蒋介石的高参戴季陶也忧心忡忡地对蒋介石说：“今天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¹ 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中享有崇高威望，而此时黄埔军校毕业生遍布各地，许多人已经成为重要军事骨干。黄埔革命同学会在全国有北平、山西等6个分会，四川、南京、香港等12个支部，联系黄埔毕业生近6000人，占全部黄埔毕业生一半还多，多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邓演达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系学生的控制。

其实，蒋介石的特务机构也很厉害，早就摸清了“临委会”的底细。1931年9月9日，蒋介石致陈诚密信²中，披露了邓演达致黄琪翔信中的内容，云：

陈军长辞修勋鉴：黄琪翔与邓演达介绍到十八军工作人员，并与邓、黄有关系者，望切实查获。邓致黄函等证据中有“已找出极好能手，在十四师大规模的进行”一语。望详查，速复，中正。廿年九月九日。

1 《邓演达年谱合集》，p269。

2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200-00061-337。本札无标点，为作者所加。

蒋介石在信中所引“已找出极好能手，在十四师大规模的进行”一语，系出自1931年6月22日邓演达致黄琪翔的信函。这说明，“临委会”内部出现了叛徒，或者这个人本来就是蒋介石的一个线人，而且是“临委会”的高层骨干。不然的话，不可能看到原信。

蒋介石感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才痛下决心，杀邓！

1931年11月29日夜间，蒋介石的少将卫队长王世和（1899—1960），也是蒋介石之侄，奉命亲自行刑。王世和带领一个排的兵力，谎称要把邓演达移居汤山，当汽车行驶到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诡称汽车抛锚，请邓演达移步下车。当邓演达刚走出车门，向前走了数步，身后枪手即扣动了扳机。这位叱咤风云于一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即应声倒地，年仅三十六岁。

处决邓演达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概不知情。半个月后，12月19日军事法庭判处邓演达死刑的消息才见诸报端，人们以为邓演达还活着，正在等待执行。

以前有一种说法：邓演达之死，是出自第十八军军长陈诚的出卖。这种说法找不到历史依据。

事实上，当陈诚于12月19日获悉邓演达被判死刑后，立即致电蒋介石，以自己“赴京戴罪”来谋求最后的挽救。陈诚的电报原文¹如下：

限即刻到南京总司令蒋：亲译。八月间泽生（邓演达）被逮，曾奉梗亥电请为国惜才，贷其一死，当即蒙复回廿五参电，准从宽大办理各在案。顷据确讯，泽生兄经军法司判死刑。人亡国瘁，痛彻肺腑，猥以微贱，久承嘘植；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江西匪乱犹炽，自宁都陷后，益形猖獗，请飭朱（培德）主任速莅江右主持。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急不择言，弗乞睿察，并候示尊！职陈诚呈效已。

1 台湾“国史馆”《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 008-010101-00001-026。

第二天，即12月20日，陈诚再次致电蒋介石¹，为邓演达求命：

限即刻到南京总司令蒋：亲译。泽生事，蒙以不可为私情而忘公义切责，敢不凛遵。惟职之出此，全为革命前途著想，非尽为友谊。职久承嘘植，论私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钧座。而职追随钧座革命数年，无时不勉为一士之谔谔，殊未敢丝毫上干以私，久隶帡幪，当承睿察，而于泽生处死，独千干以为不可，妄附古诤臣之末者，盖一为国家惜才；二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钧座继先总理之宽大也。万祈俯赐采纳，贷泽生一死，则职有生之日，即报答钧座之年，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职陈诚呈。

陈诚这两封电报可鉴，为救邓演达免于一死，他甘于用自己“有生之日，即报答钧座之年”，其言、其意、其情，可鉴日月矣。然而邓演达已死，一切皆枉然。蒋介石复电陈诚称：“今既证实泽生有叛党乱国之罪，而不能伏诛，则纪律不张，何以革命？望勿以私害公，为友忘党”。² 蒋介石不准陈诚辞职。

除了“临委会”、陈诚等在全力营救邓演达之外，社会各界也在纷纷呼吁蒋介石释放邓演达。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回国，抵达上海。8月24日，上海《字林西报》刊登了宋庆龄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宋庆龄公开表示自己不是“临委会”的人。她的政治见解仍然与1927年7月14日的声明相同。³ 宋庆龄的谈话，想与邓演达保持距离，因为在此之前，一直有谣言紧追着这位革命领袖的遗孀，一会儿谣传她将与陈友仁结婚，一会儿又有造谣她与邓演达恋爱，⁴ 这种花边新闻令宋庆龄感到快要窒息。而释放出宋庆龄与陈友仁恋爱谣言的人，

1 台湾“国史馆”《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 008-010101-00001-027。

2 台湾“国史馆”《事略稿本》第12册，P475。

3 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宋庆龄选集》上卷，p82。

4 朱玖琳文章《大革命失败后的宋庆龄与邓演达》，p82。

居然就是宋庆龄的一奶同胞大姐宋霭龄。¹

但是，宋庆龄始终没有放弃营救邓演达，一直在进行秘密工作。

宋庆龄通过自己的渠道知道邓演达被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1月25日，她从上海乘火车来到南京。一下车，在孙中山侍卫副官马湘和范良的陪同下，来到南京郊区的中央军人监狱。监狱长叫胡逸民，是北伐战争期间邓演达的部下，他私自为宋庆龄探监开了绿灯。在监狱长胡逸民的办公室，宋庆龄与邓演达见了面。邓演达垂泪说：“夫人来看，我死而无怨了！”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下令撤了监狱长胡逸民的职务。²

1931年12月14日，宋庆龄又跑到南京，当面对蒋介石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

蒋介石沉默不语。

宋庆龄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

蒋介石这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

宋庆龄闻讯后怒不可遏，一手把茶几掀翻，蒋介石赶紧逃上楼去了。³

邓演达去世后，“临委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党员们纷纷离开上海，分散到各处躲藏起来。社会上许多人也都认为，邓演达的死，相当于拔掉“第三党”的大旗，“第三党”到此休矣。这一时期，“临委会”跌落低谷，其主要任务已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转向了稳定党的组织。

那时“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不久，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反日高潮。东北丧失，少帅张学良也被人唾骂。

就在这危急关头，黄琪翔没有被吓到，而是挺身站立出来。

1 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宋庆龄画传》，p82。

2 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宋庆龄画传》，p121。

3 樊振编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史（1930—1935）》，未刊本。

经“临委会”商议后决定，由黄琪翔负责党的全面工作，成为自邓演达之后“临委会”中央的领导人，继续领导同志们坚持不懈的反蒋斗争。国民党中统的调查报告称：“民（国）廿年邓演达被捕，第三党瓦解，谭平山、徐谦等先后宣告脱党后，（黄琪翔）仍作困兽之斗。”

黄琪翔夫人郭秀仪说：“那时因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第三党的事主要由他负责。当时蒋介石也想加害于他，全凭他为人机警，逃出了特务的围捕，才得以幸免。”¹

黄琪翔最先着手的工作，除了稳定党的组织之外，就是为邓演达编印《邓演达遗著》。他们将柳亚子、彭泽民等人所写悼念邓演达的诗文，汇编成《邓演达纪念集》，还创办了《演化》周刊……

为了出版、宣传邓演达这些闪烁着理想光芒的文字作品，黄琪翔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坚信，邓演达的生命可以被蒋介石剥夺，但他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一定会传遍大江南北，永垂青史。

邓演达所缔造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是如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5年该组织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再度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大多数的时间里，人们仍习惯称呼它为“第三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中国民主生活中的八个党派之一。

1 郭秀仪文章《往事拾遗》，载《流金岁月——郭秀仪传》，p63。

四、一见钟情郭秀仪

1931 年秋天，黄琪翔的广东同乡、时任上海苏浙皖区统税局江苏省烟酒分局长曹鏊先生在上海请客吃饭。黄琪翔就是在这次聚会上，认识了终生革命伴侣郭秀仪女士。秀丽端庄的郭秀仪那时年方 20 岁，正是含苞待放的人生花季。她是曹鏊先生的干女儿。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郭秀仪的情况：

郭秀仪，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11 年 5 月 2 日出生于上海，系名门之后。郭秀仪自述：“我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祖母是中国最早、最大的买办、上海招商局第一任督办徐雨之的胞妹。”¹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人。他是中



上海《良友》画报第六十期封面
人物：郭秀仪。

1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版《流金岁月》，p63。

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控制着中国茶叶的出口，因此被称为“近代中国茶王”。他是中国早期 69 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之一。¹

郭秀仪祖母徐莲的侄女中，出了两个近代名人：一个叫徐宗汉，就是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黄兴的夫人。按家谱的辈分算，黄兴还应该是郭秀仪的姑父；还有一个叫徐婉珊（徐润之女），是我国早期的女教育家、上海著名的启秀女中创办人，也是郭秀仪的姑姑。

郭秀仪的父亲郭侣庭，早年丧父，在舅父徐润的关照下做起了茶叶生意。但郭侣庭是位本分的生意人，其经营规模不大，算是一般的富裕家庭，过着小康的生活。

郭秀仪的母亲刘苟妍（？—1933），生育八个子女，三男五女。郭秀仪排行第七，最小的是个弟弟。1911 年郭秀仪出生时，正巧是她舅公徐润去世的那一年。更为不幸的是，郭秀仪的三个兄弟和大姐、三姐先后去世，令母亲刘苟妍痛不欲生，整天以泪洗面，身体一下子垮了。

性格刚强的郭秀仪忍住悲伤，一直劝慰母亲，甚至在母亲面前发誓，说：“您不要过于悲伤，哥哥弟弟去世了，您就当我是男孩子吧，我会孝敬您的。”从此她就要求自己像男孩子一样，创建事业，支撑家庭。²郭秀仪的小女儿黄平也说，“我的外婆有三男五女。不幸三男二女先后夭折，因膝下无子而悲哀。妈妈安慰她说：‘您当我是男孩子好了。’她说到做到，从文艺女校毕业后，放弃了继续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到上海苏浙皖统税局工作，

1 徐润不仅是中国的茶叶大王，他还是上海的“地产大王”。1884 年，徐润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达 200 多万两银子，从而拥有地产 3000 多亩，其中 300 多亩已建房子，共建有洋房 50 多所、其他类型房屋 2000 多间，每年可收租银 12 万余两。他先后和华商、外商合创了上海地丰公司、宝源祥房产公司、业广房产公司、广益房产公司、先农房产公司等。除此之外，徐润还投资矿业，首创中国保险业等。中法战争的爆发，使徐润的房地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但他并未丧失信心，仍然关注房地产业的动向，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又在上海、天津、塘沽、滦州、北戴河等地购地建房，炒卖地产获利甚丰，新建成的房产每年收取大量租银，其财富十分可观。

2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流金岁月》。

承担起赡养母亲和两个姐姐的责任。”¹

1926年，郭秀仪就读上海文艺女学，那时她15岁。在校期间，郭秀仪出演著名话剧《少奶奶的扇子》，女扮男装剧中的男主角，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当时的报纸也有很多报道，如上海流行的一些妇女刊物《妇女生活》、《图画时报》等，均刊登过她的雅照。上海《中国摄影学会画报》第286期上，刊登了一幅郭秀仪双手向后拢秀发的半身近照，照片说明中说：“文艺女学高材生郭秀仪女士”，可见其学习成绩颇有声名。

上海文艺女学的学制是两年，郭秀仪从1926年入学，于1928年夏天毕业。

有趣的是，在这些老照片中，还发现郭秀仪早年身穿男装的几张照片，尤其是1929年12月22日《图画时报》头版，刊登了8位上海淑女的雅照，唯独郭秀仪一人身穿男式西装，独自伫立在草坪上。

时任上海苏浙皖区统税局江苏省烟酒分局的局长曹鏊先生²，与郭秀仪的舅舅是好友，与其父亲郭侶庭也熟悉，平时对郭秀仪颇照拂，于是郭秀仪就认了曹鏊先生为干爹。曹鏊女儿曹玉航回忆说：“记得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秀丽大方、亭亭玉立的姐姐。全家自祖母以下，都高兴万分，热烈欢迎这位明眸皓齿的丽人。她就是和蔼可亲的秀仪姐姐。”“过了不多时，在双方家长的赞许下，秀仪姐成为先父母的谊女。当双亲设宴介绍仪姐和亲友见面时，四周充满祝贺及赞美声。此后，这位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的仪姐，常来我家，为我们带来更多欢乐。”³

郭秀仪就是在曹鏊先生引荐下进入统税局工作，任务是收取苏浙皖地区的印花税费。统税局工作是个体面的职业，工作环境

1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清风见兰·序》。

2 曹鏊（1890—1967）广东人，无党派。1917年北京大学法科毕业，曾在天津铁路部门任职，后就任广东新会中学校长。上世纪二十年代来到上海，任江苏省烟酒统税局科长，分局长。抗战胜利后，回广州做律师、广州图强助产学校总务主任。1949年后任广州文史研究馆馆员。1967年病逝。

3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流金岁月》，p246。曹玉航文章《我所认识的秀仪姐姐》。

优越，劳动强度不大，薪酬也不错，与他们打交道者，非富即贵，所以在社会上很吃香。

天生丽质的郭秀仪还上过响当当的《良友》画报封面。¹虽然出生在一个较为死板的传统家庭，但她毕竟生活在开中国风气之先的大上海，又是文艺女生，所以，在郭秀仪身上展现出传统与时尚的特质。她不像别的同龄女子那样，只会沉湎于个人的小天地里，小资小调，而她却常常能够超越自己的闺阁视线，联想到自己身处的社会和国家。郭秀仪早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从健美到健美》，就能够明显地展示这一点。从她笔下的细微处，可以窥见她忧国忧民的思想倾向。

这篇文章短小有趣，不妨收录于此。其文曰：

一个女人的天性生来便是爱美的，从大裤脚，短旗袍，一变而为长袍子，短袖子。每一个转变无非是为了要趁时，其他的意义是没有的。但是健而美的体部的发育，却素来没有注意到一只半缠了的脚，带有病态的步武，从头上一一直“直”到脚下的线条，没有标准，也没有健态，在美的条件上变成了极大的缺陷，但，一部分享着都市生活的妹妹们，受着“洋化”的侵袭，渐在大奶、天足上下功夫“健美”虽称渐备，但有时因为“太”注意于衬映她的“健美”，不惜父兄或丈夫的金钱，大买其西洋的衣料、手袋、皮鞋等，美虽美矣，可是太不经济而忘了“俭”字，把国产品倒弄得一点不能进展，于是列强各国都趁了这个机会，把大宗的货品整千整万的运到中国来销售，最近据海关报告进口货的额数较去年又增加了四分之一强，我国每年输出的现金，可想以见。

这种不景气的现象倘再延续下去，那便非常危险，也须到我们的子女手里，可怜的中国已不是我们的领土了。

从上面说的可知“美”是天性，而“健”又不能不讲，因为有了健康的体格，才能生育出健康的小国民，但是一

1 《良友》画报第60期封面。

方面也不能因为求“健美”之外表而太事浪费，须知虽是一件布衣、一双布鞋，只要式样合乎时代，就是朴实无华，也不能稍减我们的“健美”，因为美的条件，绝不仅是无谓的装饰品所能补充的，所以现在社会的姊妹们除注意“健美”外，应格外的注意“俭”的“美”。

虽说女子爱美好打扮是天性，可是郭秀仪从女性的衣着打扮上，却能够联想到国家“海关报告进口货的额数”，发出“国产品倒弄得一点不能进展”的哀叹，甚至还联想到如何制造“健康的小国民”的问题，的确襟怀宽广。这说明她在关注女性爱美的天性之外，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确实有别于当时一般女性的视野。这篇文章至少发表过两次，后来也见《良友》画报再次刊登。

郭秀仪通过曹鏊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黄琪翔将军。此时黄琪翔年纪 33 岁，正可谓风华正茂。

北伐战争结束，即 1927 年 6 月，黄琪翔荣升为第四军“铁军”军长，年龄还不到 29 周岁。年纪轻轻，将星闪耀，成为举国瞩目的军界骁将，还多次出现在《画报》的军事报道里。这位年轻的中将军长，并非凶神恶煞般的武夫形象，还被媒体称为当时的“四大美男”之一。¹ 民国著名记者陆铿在其《铿锵集》中说：“黄（琪翔）长相挺拔，气宇轩昂，在（20 世纪）三十年代曾与汪精卫、顾维钧、梅兰芳并称为‘中国四大美男子’。”

让郭秀仪不可思议的事终于发生了。在曹鏊组织的这场饭局上，表面冷静的黄琪翔和郭秀仪并没有怎么说话，而在之后的几天里，黄琪翔却向曹鏊表白自己对郭秀仪已是一见钟情，而且从曹鏊那里索得郭秀仪的电话和地址，随后以军人的果敢，发起了对爱情的“猛攻”。这的确让情窦初开的郭秀仪未曾料想，又措

1 中国人好事，喜欢评选什么几大美女美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乐此不疲。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西施、赵飞燕、貂蝉和杨玉环，已成定论；古代的四大美男，是否是潘安、宋玉、兰陵王、卫玠也没有公论。而关于民国的四大美男，更是没有确切的说法。有人说，民国的四大美男是汪精卫、周恩来、梅兰芳、张学良。凤凰卫视中文台曾经做过一档节目说，北伐期间的黄琪翔与周恩来、叶剑英、汪精卫被人并称为“中国四大美男子”。

手不及。

郭秀仪最初未敢轻言答应黄琪翔的追求。她曾当面告诉黄琪翔说，“我是终身不嫁，以陪伴母亲的。”¹但是，她又答应了与黄琪翔交往的请求。当时男女约会，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新鲜花样，无非是看电影、喝咖啡、去舞厅、吃西餐等，可在那个时代里，确已是十分新潮的社交活动。郭秀仪与黄琪翔交往，她总是拉着自己最亲近的小姐妹作伴，不给黄琪翔与自己独处的机会。郭秀仪的小姐妹、同事陈素心女士后来回忆说：黄琪翔追求郭秀仪时，自己就是当时的“电灯泡”，很多次都是由她陪同着郭秀仪去与黄琪翔会晤，一起去喝茶、跳舞。在黄琪翔如同旋风一般的进攻中，郭秀仪最终还是坠入爱河。

黄琪翔与郭秀仪的爱情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强大的障碍来自于郭秀仪的家人，以及她本人对母亲的许诺。反对这桩婚姻的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郭秀仪自己的心里障碍。

郭秀仪家本有兄妹八人，在1931年相识黄琪翔的时候，只剩下姐妹三人，即二姐郭秀华、四姐郭秀容和郭秀仪本人，此时姐姐已经出嫁，而母亲刘苟妍的身体极差，眼睛几近失明。郭秀仪一直表示，自己将终身不嫁，目的就是为了侍奉母亲。所以，郭秀仪出于对母亲的孝敬，她的确没有嫁人的思想准备。直到1933年母亲去世，郭秀仪才最终答应与黄琪翔的正式恋爱。郭秀仪说：“我母亲病逝以后，我们搬去了舅父家居住。黄琪翔和我舅父是朋友。他有时会来看望我们。相处日久，情愫渐生。”²

第二，黄琪翔已是两个儿子的父亲。

广东客家人有养童养媳的习俗。这种包办婚姻，通常是穷人害怕娶不起媳妇，而为孩子提前做好了预备。童养媳的作用，不仅可以为家庭繁衍子嗣，还是农家的重要劳力。黄琪翔的长子黄

1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流金岁月》，p64。郭秀仪自述《往事拾零》。

2 《流金岁月》，p64。郭秀仪自述《往事拾零》。

浩明生于1921年，就是黄琪翔与其老家的童养媳所生。此外，黄琪翔还曾与一位上海女性同居，生育了他的次子黄正明。

以郭秀仪的性格、家庭背景和她的思想观念，不可能让自己甘当小妾的地位，所以黄琪翔在没能妥善解决好这一家庭问题之前，郭秀仪决不会答应走进他的生活。

第三，黄琪翔是一位危险人物。

黄琪翔的秘书王大鲁¹说：“在接触中，她（郭秀仪）感到黄琪翔为人光明磊落，朝气蓬勃，事业心很强，对他进行的革命工作充满信心，渐渐地对黄琪翔产生了爱慕之情。但他们的交往受到她二姐的反对，二姐认为郭秀仪与倾向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人交朋友，全家都要受连累。”这段文字来源于王大鲁先生所写的《流金岁月》，郭秀仪生前审读过此文，应该真实无误。

郭秀仪二姐郭秀华的意见没错，当时的黄琪翔将军的确是个危险人物，已经被国民党通缉，极可能因此连累到郭秀仪的家人。

最终，20岁的郭秀仪冲破了这些障碍，不畏艰险，与黄琪翔悄悄牵手，正式开始恋爱。

曹玉航回忆说：“1931年秋，仪姐由先父介绍，与北伐名将黄琪翔认识。琪翔兄不但是位身材魁梧、器宇轩昂的武将，又是位满腹经纶、风度翩翩的君子，真不愧有儒将的美名。同样的，秀仪姊秀外慧中、仪容端庄，名如其人。当时追求者众多，各界高层人士都有，但仪姊对他们未加重视。只有对这位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的儒将特别垂青。经过一段时日，二人过从渐密，双方爱慕加深。关心他俩的亲友，都希望他俩早日传出喜讯。”²

黄琪翔和郭秀仪走到一起，相亲相爱，让许多人感到惊羨。郭秀仪的好友、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回忆说：“我记得郭秀仪年轻时，花容月貌，非常漂亮；黄琪翔则高大魁梧，十分英俊，丝毫不像一般广东人那样瘦小枯干。他们俩站在一起，郎才女貌，犹

1 王大鲁1951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此后即为黄琪翔的秘书。

2 《流金岁月》，p247。曹玉航文章《我所认识的秀仪姐姐》。



青年时期的郭秀仪。1937年摄于上南京。

如鹤立鸡群，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¹

郭秀仪的性格热情开朗，乐于助人。她是曹鏐的干女儿，而对待曹鏐的儿女们，她像亲姊妹那样予以关心和照顾。

“一·二八”事变²在上海发生后，著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军轰炸，夷为平地。上海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抗日热潮。曹鏐的女儿曹玉航当时是上海“广东公学”的在校女生。她们的学校紧邻上海商务印书馆，也被日军的炮弹炸成了废墟。战事平息，校方为筹款建校，发给每名学生募捐册，拜托学生们向社会募捐。曹玉航灵机一动，就跑去找干姐郭秀仪帮忙募捐。

郭秀仪义不容辞，便领着这位小妹妹，坐公交车去找熟人募捐。这时已经到了夏天，酷暑难耐。曹玉航说：“第一位友人陈先生，慷慨解囊，写下捐款300元。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我真的以为眼花看错了！接着又有几项捐款，各有一二百元或数十元不等。一天之内，有此成绩，真是喜出望外！”³

1 《流金岁月》，p194。李吴菊芳文章《关于郭秀仪的两三事》。

2 “一·二八”事变，1932年于中国上海发生，是日本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支援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自导自演引发的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

3 《流金岁月》，p247。曹玉航文章《我所认识的秀仪姐姐》。

五、“临委会”总负责人

1931年年底，邓演达牺牲导致“临委会”的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挫折，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殊死斗争也已发展到白热化关头。黄琪翔成为“临委会”新的领导人，责任也随之加大。为了重新树立党组织的威望和形象，他必须全力以赴，所以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巨。

是年的上海《社会新闻》报道说：“昨日有人在（上海）霞飞路见黄（琪翔）拥坐包车，向西疾驰，不及招呼，想见其忙。”其猜测的原因是：“邓泽生（邓演达）死后的第三党，本已四分五裂，各寻生路矣。但有一部分人拥黄琪翔欲重振旗鼓。”“于是黄（琪翔）乃为之大忙。先至港谒某先生，然后回沪与代理人计议，在经济上已大有办法。”¹

黄琪翔主持“临委会”中央工作后，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和机密规范，如果“临委会”地方组织要发展新党员，必须要有两位老党员的介绍，同时还要通过组织的认真审查。新党员大部分是从老党员的可靠同学、战友、朋友、亲戚中挑选而来。在进行党员之间的沟通中，时刻提醒大家要保持警惕，以防止特务和叛徒对组织造成伤害。在上海“临委会”地方组织中，党员之间通知

1 1932年《社会新闻》第一卷第20期。



“第三党领袖黄琪翔”。原载：1933年，第83期《良友》。

开会，或者交换情报时，都要用药水写在白纸上，只要用火稍微一烤，字迹就能够显示出来。如果遇见突发情况，可以随即随地把这些信件烧掉。

此时，国民党负责侦缉、分化、抓捕“临委会”人员的特务组织是军统。蒋介石和戴笠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军统上海站站长吴乃宪，企图用他来对付“第三党”¹。吴乃宪（1899—1979）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与陈赓为同班同学。1930年在上海参加“临委会”，同年12月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

1931年2月入中央军校政治特训班受训。7月派往上海参与逮捕邓演达。11月加入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查组（组长戴笠）。

黄琪翔以身作则，对安全工作十分上心。此时负责黄琪翔交通联络工作的老交通员主要有两位，一是骆众亲同志，他是自邓演达以来一直担任此职，另一位是杨心如同志。有一次，杨心如来到黄琪翔家，让刘清云上楼去打个招呼。刘清云是黄琪翔表弟，当时也住在黄琪翔家里。刘清云就上楼去敲黄琪翔的门，“他（黄琪翔）问刘清云什么事？刘说，有人找。黄琪翔非常机警，一手握着白朗宁手枪，一手将门敞开，远远望见是杨心如同志，才要刘清云、杨心如上楼。”²从刘清云描述的这些细节上，我们不难感受到在邓演达牺牲之后，“临委会”成员在工作中所承受的巨大危险。

1931年12月16日，“临委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全党“要在怨愤、惨痛中接受邓同志的遗教，坚实我们的团结，整

1 魏斐德著《间谍王》，新星出版社2017年2月第二版，p181。

2 《黄琪翔传》p64。

齐我们的步伐，一致携手踏着烈士光荣血迹前进，消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我们神圣的事业。”¹

“临委会”地方组织主要集中在上海、北平和广州三个地区。在《中央通告》的号召下，各地地方组织立即行动起来。

在上海，“临委会”地方组织发起了“行动周”活动，党员三人一组，深夜到福煦路、霞飞路、静安寺等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内容有“打倒蒋介石”、“坚决为邓先生报仇”等。或者，在南京路三大公司的天台上、各个电影院里，抛撒传单。传单的内容是揭露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等罪行。1931年冬，上海市的地方党组织改选漆其生（1904—1986）为负责人，这时章伯钧从汾阳带回了冯玉祥资助的两万元经费。党组织就利用这笔钱资助和创办了《学术月刊》、《国际文化》、《民众三日刊》等进步刊物，宣传反帝反蒋，同时，还编印了《邓演达遗著》和邓演达纪念集的书籍。黄琪翔亲笔为这些书籍题写了书名。

在北平，“临委会”地方组织也组织了张贴、邮寄反蒋传单的革命活动。“临委会”派周惠生到北平召开北方区负责人会议，商讨邓演达牺牲后的行动计划。1931年12月，黄琪翔亲自前往北平视察工作。当时北平的党组织未受到破坏，每个小组大约五六个同志，每周坚持两次组织生活。黄琪翔到达北平后，勉励大家继承邓演达先烈的遗志，继续奋斗，还就北方区未来的发展给予了指导。北平的组织后来吸收了苏体元入党。苏体元曾经是冯玉祥的旧部，任过军长，当时有旧部4000多人，因此凝聚了一部分武装力量。1932年11月29日，北平党组织还举办了“邓演达殉难周年纪念”活动。北方区的党员同仇敌忾，热情高涨。

在广州，黄琪翔于1931年底派万灿（1901—1973）、郭冠杰（1882—1951）、杜冰坡（1893—1958）、郭一岑（1894—1977）、詹显哲等成立了南方委员会，以万灿为负责人，重建“临委会”地方组织。南方委员会陆续在中山大学成立三个小组；在

1 《黄琪翔传》p60。

岭南大学成立一个小组；执信女校成立一个小组；另外还成立了青年小组，主办《学生报》。他们把工作的中心集中在开展学生运动上，并在珠江上弄了一条船，每周进行一次组织生活，对新党员进行轮训。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还发展了彭泽湘（1899—1970）、李伯球（1904—1986）、郭翹然、曾伟、李义荣、黄桐华、陈柏霖等一大批骨干分子，使得南方地方组织的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社会普遍认为“临委会”即将终结之际，黄琪翔挺身而出，作出了贡献。当时的《青年评论》还发表文章《黄琪翔唱独角戏》，说自邓演达去世后，失了靠山，在“第三党”内“黄琪翔唱独角戏”云云。¹可是一年之后，在黄琪翔与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奋斗之下，“临委会”不仅没有解散，而且日趋活跃，成为当时中国民主政治舞台上一支发挥着独特影响力的党派。“临委会”所取得的这些成绩，黄琪翔起到了首要的作用。

有一阵子黄琪翔在上海消失了，实际上他去了香港，然后转道去福建，参加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福建事变”，简称“闽变”。

“福建事变”的起因，要从“一·二八”事件说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率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进驻上海，警备京沪。“此时，（黄琪翔与蔡廷锴）在上海又比邻而居，时相过从，对当前形势经常进行研讨。在蔡廷锴找黄琪翔商谈对策时，黄琪翔力主抗战。两人都认为，不抗战不足以图存；不反蒋不足以言抗战。”“何应钦则电告蔡廷锴‘退出上海市区，以免与日军冲突’。”²

1932年1月28日，日本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第十九路军即奋起迎战抵抗，因而成为在全中国声名大噪的抗日军队。日本多番增援上海，形势越来越严重。黄琪翔说：“由于它（第

1 1933年第32期《青年评论》。

2 《黄琪翔传》，p65。

十九路军)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抗日运动,没有动员群众参加,也没有坚强正确的政治领导,在蒋介石的政策之下,很快地就失败了。十九路军虽然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谴责,认为它‘不服从命令’。”¹ 蒋介石为应付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的局面,派出中央军编成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到上海增援,共同抗日。但蒋介石的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假意应付事态,避免中日大规模开战。蒋介石还派出国民政府代表郭泰祺(1889—1952)和日本谈判,于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

郭泰祺时任外交部政务次长,3月18日,他以国民政府首席代表身份赴上海英领事署参加中日停战会议,议定《上海停战协定》,也叫“淞沪停战协定”。由于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驻军,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临委会”的党员因此发动学生、工人进行抗议。5月3日,数十人涌入郭泰祺住宅进行质问,情绪激动间,有人将准备好的银元以及桌上茶杯等物品朝郭泰祺砸去,他躲闪不及,额眉为银元所伤,鲜血直流,被送往医院救治。这一活动的领导者就是“第三党”人严正。²

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马上对“违令”的十九路军进行“整肃”,下令该军3个师分别遣往皖、鄂、赣三省“剿共”前线,参加内战。这项命令可谓一箭双雕,企图让共产党的军队来消灭他们。这就引起了十九路军的极大愤慨,于是准备发动起义,宣布独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这次打错了。

前往“剿共”的第十九路军,最初在福建与红军作战中取得一些胜果,但在1933年6月间,彭德怀的红军第三军团主力东进,猛烈打击了十九路军区寿年的78师,使其损失过半。黄琪翔十分关注此事,他在上海寓所约集章伯钧、彭泽湘、麦朝枢(1896—1973)等会面磋商,大家一致认为:“十九路军只有和中共取得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黄琪翔传》, p65。

联系，商谈合作，反蒋抗日，才有立足生存之可能。”黄琪翔回忆说：“此时蔡廷锴和我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他经常到我家里来谈论政治有关问题，希望在政治上找一条出路。我建议他要重新和共产党搞好关系，才能谈到抗日，但这就必然会受到蒋介石的注意，要冒一些危险。蔡廷锴深知‘剿共’必无结果，他和陈铭枢、蒋光鼐商量，都认为剿共则不能抗日，要抗日则必然联共。于是他们就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陈公培前往江西苏区取得联络，相约共同行动。”¹

这位和谈特使陈公培²就是“临委会”的元老。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之前的1920年夏，陈公培就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开始追随邓演达。

1933年10月初，在香港李济深的家中，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1898—1966）等人秘密开会，正式决定到福州组织反蒋抗日政府。³黄琪翔与“临委会”另一负责人章伯钧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议讨论了军事、外交、政治、财政等有关问题。随后决定在香港参加事变的人员，分批次乘船至福州。各方紧锣密鼓地为“事变”工作展开前期活动。

1933年10月10日上午，黄琪翔和陈铭枢在福州去拜访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3）和陈诚。表面上，他们是在叙旧，实际上是探风。下午，黄琪翔和陈铭枢俩人又一起来到厦门。⁴于此同时，陈公培携带蒋光鼐的亲笔信，悄悄潜入福建前线与红军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陈公培（1901—1968），湖南长沙人。1919年在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1920年夏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因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押送回国。1921年底赴海南省，建立海南党组织，创建琼海师范学校并任校长。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发起组织火星社。曾参加两次东征。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教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与中国共产党失去联系。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代表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任李默庵部参谋长。后寓居天津、上海等地。建国后，任政务院、国务院参事。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3 团结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刘红著《蒋介石大传》，p831。

4 1933年10月12日《申报》。

联络。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彭德怀于王台与陈公培举行会谈，并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进行谈判。10月下旬，第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临委会”的徐名鸿（1897—1934）等代表第十九路军抵达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待。通过双方努力，取得比较一致的共识，从而划



李济深

分好“国界”。10月26日，徐名鸿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潘汉年（化名潘健行）正式签署了“外交文件”（初步协定十一条），即《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发动事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蔡廷锴渴望得到“临委会”的支持，热切欢迎他们加入反蒋大联盟。为了向“临委会”领导人黄琪翔表示诚意，请他安排政治上可靠人士来担任十九路军军部特务团团长，恰巧此时“临委会”党员周士第¹来找他，黄琪翔就推荐周士第（化名周力行）担任这一职务。1931年周士第因参加“临委会”的反蒋革命活动而在西安被捕，后经宋庆龄等人营救，于1932年春获释。周士第出狱后为寻找组织，于是来投奔黄琪翔。

黄琪翔回忆说：“蔡廷锴那时为对我表示信任起见，还要我给他介绍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充任他军部的特务团长，周士第就是我那时介绍到十九路军去的。周士第原是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人，失败后到了上海，在邓演达领导下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邓演达被捕后，他（获释后）便找到了我，要我给他指示出路。恰好蔡廷锴向我要人，我就

1 周士第（1900—1979），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等职，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参谋长，红2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太原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1953年2月至3月任军委防空军司令员。1955年5月至1957年5月兼军外训练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把他介绍过去了。”¹

黄琪翔还派吴建东、戴剑青秘密赴北平，任命不久前被吸收入党的原冯玉祥部军长苏体元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苏有旧部4000多人，黄琪翔令苏体元尽快率部渡过黄河，到鄂皖边区待命。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六、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中旬，福建事变前夕。当蒋介石得知福建省主席蒋光鼐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与各界人士秘密接触的情报后，已经觉察到十九路军有兵变的迹象，于是派专人持亲笔信飞抵福州，邀请蒋光鼐、蔡廷锴同去南京“面商国事”。蒋、蔡两人均未去。一计未成，再生一计。蒋介石单独塞给蔡廷锴50万元巨款支票，企图拉拢蔡廷锴，以期达到分化蒋、蔡关系的目的，也未得逞。最后蒋介石派出了自己的座机，由美籍驾驶员史密斯驾驶专机到福州，想强行接蒋、蔡去南昌一叙。¹

蒋光鼐和蔡廷锴当机立断，果断扣留专机。同时电邀在香港和各地的民主人士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陈友仁、徐谦、余心清等共赴福建的省会福州，共举义事。

11月18日，蒋光鼐、蔡廷锴在鼓山召集各军长开会，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叶挺、李达（1890—1966）、徐唐等均参加了会议，讨论起义具体事项。

会议上，大家议论纷纷。各军军长忧心忡忡，认为十九路军的兵力过于分散，一旦蒋介石兴兵讨伐，他们难以御敌。

李济深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就用广东话大声说：“丢那妈！”

1 团结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刘红著《蒋介石大传》，p831。

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意思是拼了算了。

十九路军第一军军长沈光汉（1887—1972）则说：“关系七八万将士的生命呀！爱惜光荣的十九路军，不到最后不能发通电。”

黄琪翔沉着地表态说：“今日之事只有备战一途，过去阎（锡山）、冯（玉祥）反他，讨伐打到底；如今我们联共反他，蒋必全力来犯。与其不战而屈，不如战而败！干革命成败利钝在所不惜，为千秋后世计，应立下决心，速即发出讨蒋电，以争取外援。”黄琪翔的讲话，起到了推动作用。

陈铭枢随后发言，声泪俱下地说：“我愿就缚，请缚我送南京请奖去！”

蔡廷锴这才下定决心，说：“我蔡某随诸公起家才有了这个十九路军，好吧，生死与共！”随即下令通电反蒋。¹

11月19日，福州宣布实行戒严。

20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临委会”黄琪翔等部分势力，在福建福州南公园体育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大会主席团推选了黄琪翔为大会主席团的总主席。“福建事变”正式爆发。谢维汉是当事人，他当时就站在主席台的边上，对主席台上的人物和动态观察得十分清楚，所以他撰写的回忆文章真实而生动。

谢维汉回忆说：

是日，初冬的福州，碧空无云，阳光普照。清早，党政机关、团体和部队，一队队走向体育场，把体育场挤得满满的。8时半左右，主席台上陆续出现来自各地的各界领袖人物。大会于9时开始，主席团执行主席黄琪翔首先致开会词。他以洪亮的声音，坚定的语气，向到会的代表、群众和部队，庄严宣布召开全国各界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

1 以上资料见《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一期，李以勋文章《黄琪翔将军在“闽变”中》。

理由和使命，历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罪恶，发出了反蒋抗日的信号。他指出外辱日亟，非抗日无以救国，非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无以实现全民抗战。当他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全场一致同声呼喊，声震长空，群情奋激，出现一次又一次的高潮。

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将军，用他惯熟的粤语（适合于广东人占绝大多数的十九路军官兵），愤怒控诉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和压制十九路军抗日救国的罪行。他用尖锐的词锋，激动的态度，充分表达了十九路军的抗日救国的意志和讨伐蒋介石的决心。

冯玉祥将军的代表余心清在讲话中历述冯将军抗日救国的主张，赞成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主张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大革命时代，以收回汉口英租界而闻名，有革命外交家之称的陈友仁，因不习惯用普通话演讲，他请黄琪翔转述了他的意见说，大革命功败垂成，是蒋介石背叛革命；日本敢于侵略中国，是蒋介石畏缩媚外和压制抗日所致。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抗日救国，拯救国家民族。

福建省党部负责人陈耀焜（肇英）在讲话中以亲身的经历，揭露了陈果夫、陈立夫一伙官僚党棍把持国民党的腐败情况和借党营私的罪恶行径，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压制人民、损害国家民族利益，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是国家民族的罪人。这时黄琪翔举手高呼：“打倒中国国民党”，台上、台下又是一阵愤怒的口号声，使整个会场，沸腾起来……¹

身为主席团的主席，黄琪翔在政府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讲道：“在蒋中正厉行黑暗的统治，蹂躏人民权利的政治环境之中，我们革命的同志受他的压迫摧残简直没有一些

1 《纪念黄琪翔》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谢维汉文章《回忆黄琪翔同志二三事》，p68。

集合（会）、言论自由的。今天在这里与会的份子，都是各地的民众代表。我们是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共谋如何拯救中国危亡的，所以今天大会意义是非常的重大。中国今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已达极点。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及蒋介石走狗操纵政权的局面下，丧权失地的事不知多少，使中国的危亡日益加迫。今天各省的代表临时集於此地，为民族打开出路而奋斗，这是我们大众最快慰的一天啊！”¹

黄琪翔还指出：“我们代表大会是本着中国人民的生存要求、谋中国之自由独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先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中正和他的御用的南京国民党系统南京政府。从今天起，我们是走上新的革命的路线。这此算是我们的革命的策源地。我们应以加倍奋勇的精神，努力迈进，完成革命的要求，这个便是今天大会最重要的意义。”

由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余心清代）、黄琪翔、戴戟、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等 11 人组成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担任主席。

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通电宣布：废除南京政府年号，改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福州为中华共和国的首都。

黄琪翔带领“临委会”在“福建事变”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福建事变”爆发之前，从 1932 年冬到 1933 年春，“临委会”即从上海派遣 60 多位成员陆续到达福建，与原本在福建工作的“临委会”党员会合，开展活动。

据统计：“临委会”中央干事会的 25 名干事，除已经牺牲的邓演达外，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罗任一、朱蕴山、李世璋、丘哲、郭冠杰、谢树英、丘学训、江董琴、杨逸棠、万灿、

1 黄琪翔的演讲辞，原载《革命之声》第一集，中华共和国元年（1933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印。



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主席團主席黃琪翔與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李深、蔡延、黃琪、何公、翁照、陳光、薩鎮、徐鎮、李章、邱國、陳耀、林植、戴夫、余載、丘哲。後排（左起）：李中、黃延、蔡翔、何公、翁照、陳光、薩鎮、徐鎮、李章、邱國、陳耀、林植、戴夫、余載、丘哲。

1933年11月20日，黃琪翔在福州召开的“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担任主席团主席。图为主席台全貌。

詹显哲等15名干事，先后参与了“福建事变”。¹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黃琪翔本人出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参谋团代主任、军事政治学校副校长等职。参谋团代主任的职权，相当于代理总参谋长。“临委会”成员丘哲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劳动委员会副主任。福建人民政府将福建省划分为四个省区，即闽海、延建、漳厦和龙汀，“临委会”成员郭冠杰任延建省的副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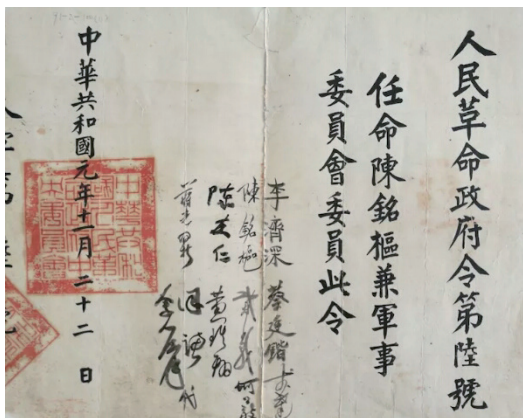
上海《大公报》刊发社论说：“观前日大会通过之政纲，显以第三党之主张占十之八九。是目下闽局，实在第三党支配之下。”²

“福建事变”事起，举国震惊。

在事变的第二天，即11月21日，蒋介石立即在南京宣布“严令戡平闽乱”，随后蒋介石发布“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指出，

1 2013年第2期《前进论坛》，樊振文章《农工党领导人提议、策动‘福建事变’》。

2 1933年11月22日上海《大公报》。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颁发给陈铭枢的任命状。

“陈铭枢李济深之徒，窃据福州，假借我十九路军名义，凑合第三党、社会民主党之反动分子，倡言联共，背叛中国国民党，反抗国民政府，组织其共产党化身之所谓生产党，与其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并警告说，“不速来归，

玉石俱焚！”¹

陈诚非常关注黄琪翔在“福建事变”中所起的作用。陈诚当时担任剿“匪”总部第三路军总指挥，坐镇南昌指挥与红军作战。11月24日，陈诚在对第98师班长以上的干部讲话中说：陈铭枢“同时接纳第三党重要分子黄琪翔，由黄分向‘土匪’领袖接洽；‘土匪’只要闽方接济他的子弹、食盐、药品，欲望不奢，所以也很快的妥协成功，订立所谓‘互不侵犯条约’。”²陈诚所说的“土匪”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部队。

11月26日，国民政府兼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在南京照会日本驻华大使，宣称：“今次福建省发生叛乱，本国政府已决定酌情作必要处置。相烦贵公使谅解并设法使贵国人民及船舶勿对叛徒提供一切军器，及其他可能助长祸乱行为之物。”³

“中华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临委会”是否还有必要存在？成为人们关注的又一个问题。因为在11月21日李济深等人已通

1 1933年11月23日《申报》。

2 陈诚《革命家的真精神——在赣粤闽湘鄂北路军‘剿匪’总部第三路军总指挥任内对九十八师班长以上的干部讲话》，见台湾“国史馆”“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 008-010301-00039-048。

3 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6月版《上海档案史料研究》，p135，“驻南京日高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电”。

电脱离国民党，宣布联合“临委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临委会”虽然是国内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反蒋力量，但它已经加入了生产人民党，所以参加起义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临委会”已无存在必要。

12月2日，“福州人民政府”主办的《人民日报》发表胡秋原的文章《何谓第三党》；3日该《人民日报》又发表《非解散第三党不可》的文章，对“临委会”提出严厉要挟。

12月11日，迫于形势需要，团结同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经过讨论之后，即在该《人民日报》上宣布解散“临委会”组织。这个决定实际上是由黄琪翔和章伯钧共同做出的。黄琪翔说：“在运动期间，陈铭枢主张组织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走第三条路线的党，要求参加运动的人都自动脱离原属党派关系和解散原有的党。因此我和章伯钧就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地位，宣布解散了这个组织。”¹

媒体高度关注陈铭枢、蔡廷锴和黄琪翔的动向，无论他们出现在各种场合，都会予以报道。

1934年1月11日，作为新组成的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代主任的黄琪翔，和蔡廷锴将军亲临前线指挥。午夜，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给十九路军总部发来电报，告知敌军蒋鼎文部已经渡过闽江；卫立煌部已过闽江口，向仙游袭来，告诫十九路军要及时防范。可是，由于参加事变的特务科长已经逃跑，红军的来电居然翻译不出来，再加上不少部队投蒋，于是第十九路内部开始混乱起来。

蒋介石率领的部队大举进攻，第十九路军不敌。“中央军一月十日克复厦门，十三日克复福州，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已随福州之克复而消灭。”²第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福建事变”宣布失败。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2 1934年1月19日《申报》。



“闽人民大会阅兵时之黄琪翔氏”，原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3号。

在“福建事变”中，许多“临委会”的骨干遭逮捕杀害。如中央委员江董琴（1888—1933）于1933年11月赴广州联络陈济棠参加“福建事变”时，被陈济棠部杀害，时年45岁。时任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农民自卫师领导人徐名鸿，曾被任命为龙汀省副省长、代省长。1934年2月19日在广东大埔被抓，旋即遭枪杀，时年37岁。徐名鸿也是“临委会”骨干。

早在1924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士第，在“福建事变”失败后率部进入苏区，正式回归红军部队，参加了长征。

“福建事变”进入尾声时，黄琪翔和蔡廷锴仍然在坚守阵地，不避危险，是福建人民政府中最后撤离福州的领导人。1934年1月上旬，蒋介石亲自前往建瓯督战，十九路军被击败，黄琪翔立即命令下属李以助带领警卫部队去保护蔡廷锴。

李以助回忆说：“蔡（廷锴）率总部人员抵白沙时，接红军

方面朱德来电，告知卫立煌敌军已向闽东南急进，要蔡部火速南撤。驻白沙之夜，敌军武装特务彻夜骚扰，黄老（琪翔）命我带队搜剿彻夜行动才保障安全。一月十三日，蔡、黄、蒋等下令全线撤退，随即乘电船回福州。十五日，得悉厦门已失守，十九路军昼夜行军，向闽西退却，抵达泉州时全军被包围，原在福州的中央政府要员则乘机飞龙岩。蔡步行至涂岭，遇卫立煌尖兵截击，被我带警卫部队击溃，我队伤亡三十多人，蔡幸而脱险，否则就当俘虏了（蔡的小车被中五弹）。”¹

“福建事变”失败后，媒体始终在追逐黄琪翔的行踪，可是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社会新闻》报道说：“闽变失败后，十九路军被改编，高级将领下野，社民党人因在港阴谋活动，为港政府所逐，最倒霉之徐名鸿且以枪毙闻，惟前第三党之参加闽变者，则全无下文。或云徐谦已病死香港，或云章伯钧已投向赤匪，独无人能知黄琪翔之行踪者。”²

其实，蔡廷锴、徐名鸿冲出闽西时，黄琪翔依然留守在漳州，藏匿在一位女同志家中。本想从厦门突围，不意国民党军很快占领厦门，黄琪翔只能留在漳州潜伏了一阵子。待戒严稍松，黄琪翔化装成苦力，昼伏夜行逃出漳州，经韶安云霄，雇一民船来到了九龙。

“福建事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历史上，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独裁的斗争精神，的确为后世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页。

黄琪翔到达香港之后，与陈铭枢、陈其尤等继续保持接触，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变化。

其一，李宗仁此间秘密访问香港，与陈铭枢、黄琪翔等联系，希望他们加入桂系的反蒋行动，并设法阻止共产党部队进入广西。

1 《传记文学》第74卷第一期，p33。李以劭文章《怀念黄琪翔将军及简述闽变经过》。

2 1934年《社会新闻》第六卷第14期。

其实，早在1930年4月，李宗仁、白崇禧就参加了冯玉祥、阎锡山等部的反蒋活动，李宗仁被推为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1930年7月，李宗仁被蒋军击败，退回广西。

在黄琪翔与李宗仁的这次会晤中，黄琪翔询问他们是否又在放空炮？李宗仁回答：当然不是。李宗仁说：蒋介石在云、闽拥兵20万，“对共匪尚无办法，如桂（军）取固守，以重兵入闽，先挫其锋，除非中央与共（红军）妥协，否则事大可为。”李宗仁最担心的是，国共再次合作，那么共产党部队进入广西，桂军必然完蛋。他希望国共继续血战，然后桂军加入打击蒋介石的队伍中，那么蒋介石一定吃不消，便“事大可为”。

李宗仁邀请黄琪翔加入桂系反蒋，但黄琪翔表示不加入。黄琪翔与李宗仁的会谈内容，已被人密报给了蒋介石。电报原文最后说：“此为极确实之谈话，至黄则不加入也。”¹

其二，电报里说：正在与李宗仁合作的粤军陈济棠，已“派安徽人李宗盛潜入江西，与共产党订约大概：一红军不窜粤，二粤军不向红军压迫，三红军另辟一路入浙江。尚有多条未详云。”还说：“查黄（琪翔）自经闽变，尚有觉悟，职因与拉拢故，（黄）对钧座自有相当同情。”²

“福建事变”失败后的某一天晚上，有个人来敲郭秀仪舅父的家门，大家为此都很紧张。母亲去世后，郭秀仪全家已搬来舅父家居住。

来者是位日本人，自称是记者，名字叫中村农夫，是专门替黄琪翔来送信。郭秀仪回忆说：“有天晚上，一位日本记者中村农夫，带着他（黄琪翔）的信来看我。信中说，他已到了福建，叫我立即离开原住处，到法租界亲友家暂住，同时要我辞去统税

1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184-040。

2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186-108。



1934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在香港合影，前排右起：杨逸棠、郭冠杰、余心清、章伯钧、李健生、彭泽湘夫人。后排右起：杜冰坡、张文、黄琪翔、彭泽民、丘学训、丘哲、彭泽湘。

局的工作。”¹

这个日本记者中村农夫，由第三党成员罗任一²介绍去福建的，在“福建事变”中充当秘密交通员。“福建事变”总部的文件信札等机要件要送往上海，均交中村农夫传递。因为中国人在上海登岸，蒋介石的特务们查得非常严，很容易出事，而特务们不敢去检查日本人，因此能保证信件的安全。

中村农夫这个日本人值得关注。在二战后揭秘的日本外务省许多秘密文件中出现了他的名字。中村农夫的身份是日本《每日新闻社》驻沪记者。1933年11月14日，他主动跑到日本驻上海

187

1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流金岁月》，p64。郭秀仪自述《往事拾零》。

2 罗任一（1897—1965）四川资中人，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国防部少将参议。1931年8月17日下午，由于陈敬斋叛变告密，罗任一与邓演达等12人一道被捕。此后经宋庆龄、冯玉祥作保营救，郑太朴和罗任一等12位人于1932年春获释。

总领事馆向日本政府报告“临委会”负责人和“福建事变”的相关情报。当天下午，日本驻华有吉公使向其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拍发了第 661 号密电，其中有中村农夫的情报。中村农夫称，他担任的角色是负责黄琪翔、章伯钧及当地第三党机关之间的联络工作，还旁听了“他们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秘密会议。”我们可以确信，中村农夫是伪装成记者的日本政府间谍。

中村农夫的这份情报，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发往日本外务省，由日本外务省保存档案至今。内容为：

1，在福州的章伯钧来电称：我看好福建独立，望速派更多斗士前来。本来，这次福建独立运动是以陈铭枢及十九路军实力派为核心的派别与李济深及第三党共同上演的联手剧，主要内容也系章（伯钧）、黄（琪翔）等第三党中坚分子策划。章、黄首先南下（黄比章早一班船先到香港，现已偕陈铭枢到福州）。我旁听了他们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秘密会议。黄（琪翔）当时背对着邓演达灵牌，反蒋意气强烈，向与会者展示了对蒋之深深怨恨（陈铭枢尤其表现出要突袭蒋介石之意气），可见他们预期该运动很有成功希望，但也不少对客观情势悲观的材料，如十九路军在福无人缘，当地军队与共军之关系，以及财政困难等。

2，已内定独立成功时分别由李济深任政府主席，陈铭枢任国务总理，蒋光鼐任省主席，蔡廷锴为省司令（黄琪翔任讨蒋军前敌总指挥）。进福建时也许会以胡（汉民）接替李任主席。另外，第三党中坚分子也有人主张，为博取民心应避开胡、李等旧式人物，拥立宋庆龄任主席。然宋或许不会轻易答应。

3，已内定由陈友仁任外交部长，但上述独立运动者都因福建实情而担心日本对独立之态度。故鉴于对民众之立场及对蒋之关系，独立时可能会标榜攻击帝国主义，然其内心也许很想获得日方的理解吧。

4，本人未闻有关美国援助该运动的传言。另外，尽管与广东方面尚无很深谅解，然因粤军内有几名黄（琪）翔

旧部，故广等方面可能会采取中立态度。作为本运动的同情者，孙科事实上在从旁援手，但不清楚宋子文与该运动关系究竟如何，或许他会因宋庆龄之关系多少给些资金吧。¹

黄琪翔对于中村农夫的日本间谍身份，可能不察，或者是察而不露。黄琪翔可以利用中村农夫的身份，向日本政府传递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要求。

黄琪翔在通过中村农夫转交给郭秀仪的信中说：因为“福建事变”的失败，自己将逃亡到香港，只在香港暂住数日后还将流亡去德国。黄琪翔在信中叮嘱郭秀仪：让她马上搬家，离开原住处进入法租界，到他的一个朋友家暂住。还让郭秀仪立即辞掉统税局的工作，以免留下后患。在成为黄琪翔恋人之后，郭秀仪已经大体了解了他所从事的危险工作，于是按照黄琪翔的要求，一一照办。

在信中，黄琪翔还希望郭秀仪能够在自己前往德国之前到香港一聚。

郭秀仪没有犹豫，马上在上海订了去香港的船票。在其姐夫的大嫂陪同下，俩人匆匆赶到香港。黄琪翔当时住在香港的朋友家，便安排郭秀仪和大嫂住进了旅馆。这对恋人在香港相聚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黄琪翔所坐的海轮已经抵达了香港。在香港维多利亚码头，郭秀仪把黄琪翔送上了轮船，然后悻悻然返回了上海。²

黄琪翔说：“我是1934年夏天到达柏林的。那时德国正是希特拉（勒）统治时代。”³到了德国，把生活进行了一番安顿后，黄琪翔慎重其事地从柏林给郭秀仪发来一封信，正式求婚！并在信中邀请郭秀仪前往德国，与他在一起共同生活。

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黄琪翔在福建事变之前，曾向蒋介石提

1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6月版，p119，“驻华有吉公使致广田（弘毅）外务大臣电”，第661号，发自上海。

2 郭秀仪文章《往事拾遗》，见《流金岁月》p64。

3 黄琪翔《我的自述》。

出过出国的请求。

最近出版的《陈诚书信集》中，披露了其中的秘密：在福建事变之前，黄琪翔曾经向蒋介石表示要出洋德国，而且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许，但因为黄琪翔参加了福建事变，蒋介石变卦了。

1934年5月24日，陈诚由江西“剿匪”前线来到了省城南昌，在熊式辉家吃过晚饭后，即谒蒋先生，商谈军官训练团诸事宜。其间，蒋介石与陈诚的谈话中也讲到了黄琪翔。

陈诚在当晚致妻子谭祥的信中写道：“（黄）琪翔出国问题，委座意须待琪翔有表示，方能送其出洋。因为在闽变前，琪翔曾有此要求，委座亦已允许，结果至闽叛变，委座以其无信也。”¹

这件事还说明，在福州事变之后，陈诚与黄琪翔还有联系，也知道黄琪翔此时尚未出洋。可见，此时的陈诚已是蒋介石与黄琪翔之间的一座联系桥梁。

¹ 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7月版，《陈诚书信集》，p277。

七、将军的新婚

1934年7月，年轻美丽的郭秀仪独自来到远洋邮轮的甲板上。她开始眺望太平洋。浩瀚的太平洋，天幕低垂，碧波荡漾，一望无际。

郭秀仪此次去德国，目的是与黄琪翔结婚。此时她母亲过世已有段时间，郭秀仪的思亲之痛逐渐平复，再也没了牵挂。而对于黄琪翔、郭秀仪的婚事，父亲郭侶庭和舅父都表示同意。二姐郭秀华见小妹早已表明非他莫嫁的态度，也就不再反对。

这艘名叫“康德罗素”的意大利邮轮非常有名，翻译为中文叫“红伯爵号”，在上世纪三十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大船之一。它从香港启程前往欧洲，需要十余天的航程。为了排解旅途的劳顿和寂寞，“康德罗素”邮轮为客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在“康德罗素”邮轮举办的选美活动中，郭秀仪被评选为“康德罗素小姐”。一夜之间，她的房间内外已经堆满了热情乘客送来的鲜花，着实让她吃惊不小。

郭秀仪回忆说：“年仅22岁的我便乘上‘康德罗素’号邮轮，只身赴德。我在船上被选为‘康德罗素’小姐。为此在头等舱举行了舞会。我收到了许多花篮。当时我不肯出席，后来在中国驻汉堡张领事的陪同下，才参加了。舞会非常热闹。大家都想请我跳舞，我说不会跳；他们又向我敬酒，我说不会喝。敬酒的人只

好对着我喝了，以示敬意。”¹

恰巧在同一艘船上的中国军官，名字叫程思远（1908—2005），是李宗仁的秘书，后来成为了新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当初程思远见这位“康德罗素小姐”，惊为天仙。半个世纪之后，在致郭秀仪的信中，程思远先生满怀温情地回忆起初见她时的美丽。程思远说，“我们从香港乘 CONTE ROSSO 去欧洲，船上留学生看到您风度，无不倾倒，及到威尼斯，我经过同乡韦永成介绍，才知道您是黄琪翔夫人（韦也是从德国来）。老友永铭肺腑。”²我们可以想像，那时的郭秀仪有多么光彩照人。

到了意大利威尼斯港，专程从柏林赶来的黄琪翔，已经在码头上翘首等待。相别半年，对于有情人而言，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胜似三秋那么漫长。

程思远在威尼斯码头上第一次相识黄琪翔。他们聊得很开心。郭秀仪后来回忆说，“他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程思远此次去意大利，是为了到罗马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业。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港口城市，是世界著名的水上城市 and 历史文化名城，聚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纷繁精华。据说，上帝将眼泪流在这里，让它变得更加晶莹和柔情，就好像一个漂浮在碧波上浪漫的梦。在这座花园城市里，其建筑、绘画、雕塑、歌剧等，美轮美奂，名闻遐迩。

郭秀仪自小对艺术有着特殊的爱好，在上海就读文艺女学时，对表演和绘画情有独钟。如今到了梦幻一般的威尼斯，开心得就像只飞出了樊笼的快乐小鸟，到处是她看不够的旖旎景致。她依偎在心上人的怀里，坐在类似小舢板的贡多拉船上，在水城的柔波里，听着意大利人唱情歌。黄琪翔就陪着她，在威尼斯住了大约一周时间。

1 郭秀仪文章《往事拾遗》，见中国文史出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流金岁月》p65。

2 摘自 1998 年 11 月 15 日程思远致郭秀仪信函，见《流金岁月》，p193。



1934年7月，郭秀仪自香港登船，独自乘坐意大利“红伯爵号”邮轮前往威尼斯。在威尼斯码头刚下邮轮时，与黄琪翔将军的合影。

回到柏林，他们所做的第一件要紧事，举办结婚仪式。郭秀仪说：“回到德国后，我们举行了简单然而隆重的婚礼。黄琪翔对我说：‘我的爱情和事业都寄托在你身上了。’”¹

婚礼之简单，那是因为黄琪翔租赁的房屋地方不大，设施简单，条件有限；说隆重，是前来贺喜的人很多。黄琪翔许多“临

1 郭秀仪文章《往事拾遗》，见《流金岁月》p65。

委会”战友如连瑞琦等因“福建事变”流亡国外，当时也在柏林。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留学生领袖、共产党人朱江户、许德瑗，正忙于领导“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需要黄琪翔的支持，所以与黄琪翔的关系非常亲近。这些人都前来祝贺将军的新婚之喜。

婚礼上吃的是西餐，比起中餐要简单很多，再摆上几瓶酒，也就差不多了。客人们各尽所需，各得其乐。

郭秀仪此次在德国柏林生活了两年多时间。按照郭秀仪自己的话说：“我是第一次去德国，生活了快三年，就学会了三件事，一是德语，二是开车，三是打枪。”

那时她还很年轻，十分好学，于是她开始旁听为留学预科生举办的德语培训班。德语的发音与中国话有很大的不同，很难学，后来她还为此请了德语的家教老师。好在黄琪翔也会德语，而且身边许多留学生的德语说得都不错，也都成为她的老师。两年之后，他们回国参加抗战时，郭秀仪的德语口语已经相当流利。

德国汽车制造业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此时郭秀仪也迷恋上汽车，开始学习驾驶车。

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汽车算顶尖级的奢侈品，非大富大贵人家根本买不起汽车，而且坐车的人基本不会开车。因为限于手动挡汽车的制造技术，无论你驾驶汽车还是维修汽车，程序十分复杂，所以汽车司机是一种专门的职业。相比之下，在德国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就方便了许多。那里汽车很多，会开车的人也很多，只是学费不便宜。

郭秀仪在柏林不仅学会汽车驾驶，而且考取了国际驾照。这对于当时中国女性来说，非常罕见，全中国能够拿到国际驾照的女性，真是凤毛麟角，而她的夫君黄琪翔也不会开车。黄琪翔拿到汽车驾驶执照时间，是1944年，那时他已是美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是美国人给他发的驾照。

也是在德国期间，郭秀仪还学习了一门特殊的本领，那就是

射击。当时柏林郊区有家射击俱乐部，她是这个俱乐部里第一位中国女会员。教授她射击的老师，也是德国人。

关于郭秀仪在德国学习射击这件事，她晚年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从未提及，而是在1992年间，本书作者去看望她的时候，郭秀仪本人亲自告之的。我当时做了记录。¹

黄琪翔说：“我是于1934年夏天到达柏林的。那时德国正是希特拉（勒）统治时代。我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希特拉（勒）的独裁统治是极端厌恶的。眼看到当时蒋介石派了许多留学生到德国学习，更觉得不满，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大约在1935年初，中国红军开始远征（长征）后，国内抗日高潮开始到来，留德学生中一部分进步分子，在当时成立了一个‘中国留德华侨抗日联合会’。这个会的负责人朱江户和许德瑗来找我，要我参加该会组织。”²黄琪翔与德国留学生们的关系密切，其目的是在团结他们，发现人才，以便为今后的中国革命输送骨干力量。

身在德国的黄琪翔，一直在从事着反蒋活动，可是这不影响他与蒋介石亲信陈诚的联系。此间，黄琪翔致陈诚信札多封，其中一札，至今保存在台湾“国史馆”。³这是研究黄琪翔历史的重要文献。

《黄琪翔来函》：

辞修：三月中曾托剑灵代寄你一函。谅必早已收到。

1 1992年间，本书作者去灵通观郭秀仪家看望她老人家，闲聊时，她说起自己在德国的往事。我感觉很重要，随手找了个白纸信封，简单记下了几个关键词。据此记录，我回忆起当时她跟我谈话的内容。她说，1934年7月到1936年10月，自己第一次去德国，两年多时间，主要做了三件事：1，学习德语。她参加的是德语学习班。回国时，郭秀仪的德语口语已经相当不错了；2，学习射击。当时柏林郊区有家射击俱乐部，她是这个俱乐部第一位中国女会员。德国老师教的；她在欧洲买过一支勃朗宁女士袖珍手枪，极漂亮，枪柄上是珐琅彩的花卉。抗战时，她去前线时一定会把这支手枪随身带着。如果出现意外，就是她一旦要落入日寇手中时，便准备用这把手枪自杀。1949年，郭秀仪在香港，把自己位于香港的楼房等所有家产都变卖了，还是舍不得这支她心爱的勃朗宁女士手枪。随后，她追随丈夫来到了北京的路上，丢掉了；3，1934年，她在柏林时，就已经学会了驾驶汽车，并考取了国际驾照。

2 黄琪翔《我的自述》。

3 台湾“国史馆”《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008-010108-00016-075。

此后虽屡次写信给你。每苦于头绪纷繁，无从说起。时间过得飞一样快，到了现在，又是半年。世界和中国，不知在这时间当中发生了多少变化，而我自己还躲在国外过偷闲的日子。想到读书毫无心得，真不知何以告慰故人！

所谓现代文明中心的欧洲社会，是时刻都在奋斗中过生活。在绝对个人利己主义信条之下，有些人以做强盗为最高无上的道德行为，有些人为保障自己生存而亦丝毫不肯让步。在你枪我刀的对抗之下，展开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阵容，同时也就展开了历史演化的前路。欧洲社会无疑的是在期待着重大的转变。

世界经济恐慌一直延长到现在无法解决，欧洲任何国家不能例外。现在他们急不择食逢人便噬的时候了，重新分割世界的二次大战，必将无法幸免，唯一难以解决的，是如何形成战线的问题。明白点说，是帝国主义者中间自相残杀呢？还是他们共同连合形成反苏联的战线，一举扑灭苏联以便自由分割殖民地？一切欧洲现时的政治活动，都是以上列问题为中心，而帝国主义者主观上的期望，当然又是以后一条路为上著。但是，最近因为意大利和亚比西尼问题的发展，使英国感觉到世界帝国地位的动摇，不能不著著调兵遣将。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突然尖锐，苏联反而置身度外，则又有走第一条路的趋势。到底前途变化如何，我们只有等待事实去证明。

对于中国问题，我现在正虚心研究，不敢说有心得，但我觉得中国在过去虽然曾有伟大的历史和文化，而现在则不容否认它已为世界文化所支配。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如何把中国从殖民地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工作，那末，一切旧文化的保存与新文化的介绍，都要利用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方面去。就是说，不管旧文化也好，新文化也好，能够利用它来反抗帝国主义便是好的，要得的，反之则当排除。因为横在我们面前的危机，是帝国主义势力不推翻，则中国永远不能逃出其殖民地的命运，更谈不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保存。

对于日本问题，我以为不是和日本开仗以后，中国有

没有胜算的可能的问題；是不和日本开仗中国还有没有存在的余地的问題。自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来，我相信曾经有不少的在朝与在野志士想尽种种办法，企图为国雪耻，结果练兵落空，买舰落空，振兴实业也是落空。这些责任问題，一直到现在都闹不清。一言以蔽之，还是整个中国人不中用！为什么中国人都不中用呢？因为多少千年传统的经济生活和思想，使他们不管事，乐天、安命、知足等等，所以打仗是军队的事，是做官的人的事。老百姓是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这种思想，现在还支配着大多数群众的心理。你想和一群有组织有训练的强盗相遇如何来抵抗呢？中国现在是站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它要不顾一切，起来反抗强盗的侵略。它的失败，是短期的失败，是军队方面某种程度的损失，（当然不是不可以设法减少的）而其成功是长期的成功。就是说，无论如何，日本人绝无能力可在短少时期当中把中国整个地区占领，而在流血斗争、你死我活的战斗当中，大家已经醒觉起来，期以十年苦斗，相信最后胜利必归我们。

听说你近来对于抗日问題，颇热心研究。我希望你不要单从军队方面着想，也不要从上海会失、南京会丢这些问題着想，然后才能想得通！否则你们终不能逃出当年奉军的故事！

我的生活如常，无善足告。对于将来接济问題以及对于我个人行动问題，你倘有意见，愿加接受。

此致秋祺。

琪翔八月二十四日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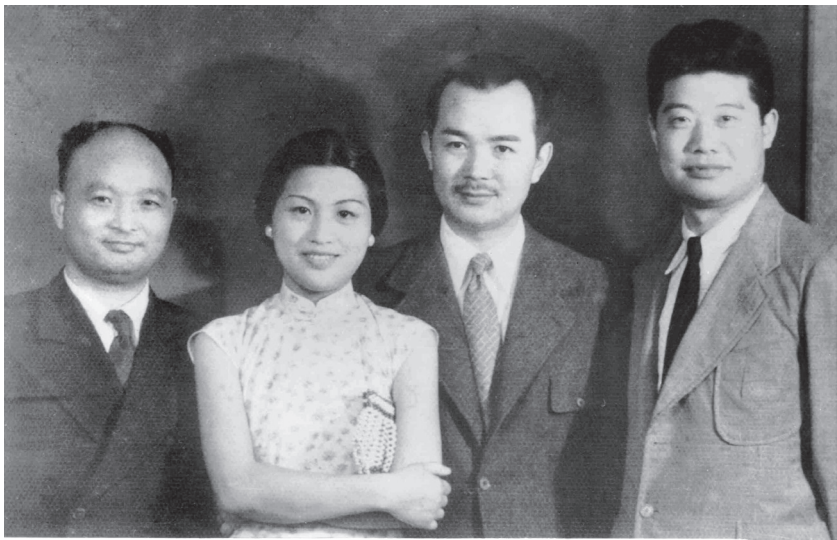
黄琪翔的这封信，写于1935年8月24日。

此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39年9月1日）约4年时间，距离点燃中国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件（1937年7月7日）约两年，黄琪翔却能够如此精准地判断出战争的走势，即使到了今天，距离他写下这封信的时间已经八十余年，我们仍然为此拍案称奇。

之前，我们所知道的是，黄琪翔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读过他在抗战期间所著的军事著作，也认为他是一位少见的军事理论家；然而在今天，当我们阅读了这封短短的信札，却有理由确信，他也是那个时代里罕见的战略家。

他用自己锐利的眼光，洞穿了时代的迷雾，梳理出世界大战的发展路径，特别是他提出“中国现在是站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它要不顾一切，起来反抗强盗的侵略。它的失败，是短期的失败，是军队方面某种程度的损失，（当然不是不可以设法减少的）而其成功是长期的成功。就是说，无论如何，日本人绝无能力可在短少时期当中把中国整个地区占领，而在流血斗争、你死我活的战斗当中，大家已经醒觉起来，期以十年苦斗，相信最后胜利必归我们。”他劝告陈诚，“我希望你不要单从军队方面着想，也不要从上海会失、南京会丢这些问题着想，然后才能想得通！”这充分证明了他睿智的判断能力。

不过，黄琪翔信中有一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黄琪翔说：“自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来，我相信曾经有不少的在朝与在野志士想尽种种办法，企图为国雪耻，结果练兵落空，买舰落



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将军、夫人郭秀仪，与连瑞琦（左一）、谢树英（右一）在德国柏林的合影。

空，振兴实业也是落空。这些责任问题，一直到现在都闹不清。一言以蔽之，还是整个中国人不中用！为什么中国人都不中用呢？因为多少千年传统的经济生活和思想，使他们不管事，乐天、安命、知足等等，所以打仗是军队的事，是做官的人的事。老百姓是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这种思想，现在还支配着大多数群众的心理。你想和一群有组织有训练的强盗相遇如何来抵抗呢？”应该承认，黄琪翔所说的以上的话，大致是事实。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设问：“为什么中国人都不中用呢？”却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中国人都不中用，问题出在所谓的“革命”目的和政治制度上。根本的原因，是“自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来”，几乎所有的掌权者，都是在为其自身的利益而战斗，人民始终遭遇奴役，并没有政治权利可以分享。这些统治者嘴上所说的“人民的利益”，以及他们振臂高呼的革命口号，实际是欺世的幌子。所以，人民采用“乐天、安命、知足等等”，其实是抵抗强权的手段而已。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也如是，最终不得不逃跑到台湾岛上去了。

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非常爱国，热衷于政治。他们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是反蒋的，主张民国政府要团结国内各种势力，联合抗日。为首的就是共产党人朱江户¹、许德瑗²等人，他们领导着“留德华侨抗日救国会”；一派是拥蒋派，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有驻德国使馆的武官替他们撑腰。这两派水火不容，斗得很厉害，而黄琪翔当然是支持反蒋派的，像大哥哥那样呵护着他们，引领着他们斗争。

1936年9月27日，蒋介石收到驻德国大使馆自柏林的来电，

1 朱江户（1908—1994）江西萍乡莲花人，是光绪和溥仪两代皇帝帝师的朱益藩之后。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和乔冠华是好朋友，回国后投身抗战，任七十军云干班上校教官，解放后随陈铭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后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2 许德瑗（1900—1972）江西九江人。1931年获法国帝雄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后入德国柏林政治大学财经研究院学习。1936年回国后，曾任北平大学副教授、英士大学教授。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委员和江西省委主任委员，江西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

称：“陈铭枢、黄少谷、黄琪翔等最近在法京召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反动分子群集，揭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口号，用意仍在推翻中央，夺取政权。”¹黄少谷（1901—1996）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34年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国际经济关系，此时在柏林。²

10月15日，“留德华侨抗日救国会”在柏林举办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大会，参加的人很多，黄琪翔是这个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与之对立的拥蒋派，实际上是大使馆的武官署，他们十分嫉妒与恐慌。武官署的人事先报告了德国法西斯政府的警察当局，举报的理由是共产党开会，于是德国警察前来捣乱。当时黄琪翔正在台上讲话，所以德国警察就以非法集会、扰乱治安的名义，把演讲者黄琪翔和组织者朱江户等人一起抓了起来。

进步的学生们群情激动，便涌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非要讨个说法。一些在柏林生活的华侨也看不惯了，纷纷加入抗议者的队伍。

郭秀仪听说丈夫黄琪翔也被抓进了警察局，就立即跑到驻德国大使馆表示抗议。声称，如果大使馆不去让警察局放人，我们就会一直斗争下去，吃住在大使馆。

在与大使馆斗争的间歇，郭秀仪悄悄给自己的德国房东打了一个电话，说，万一黄琪翔回到了家，就请告诉他一声，他的妻子还在中国大使馆呢。

其实，郭秀仪打电话回家的时候，黄琪翔已经被警察局释放并回到家里。他听说他们还在大使馆里斗争，就亲自跑来大使馆。

1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 002-090103-00016-043。

2 黄少谷，湖南南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世界日报》编辑、总编辑。1927年在李大钊的引荐下，赴西安在冯玉祥西北军任职，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处长、中将秘书长。1949年随国民党退居台湾。历任“总裁”办公室主任、“行政院秘书长”、“副院长”、“外交部长”、“驻西班牙大使”、“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司法院长”等职务。1996年10月16日，在台北医院病逝，终年95岁。临终之前，他给儿孙留下遗嘱：“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希望百年之后，能够归葬于父母坟旁，眠于故土。”

黄琪翔与大使馆的人进行交涉，指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可嘉，集会也很正当，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干涉、在背后打黑枪。大使馆的人早就知道黄琪翔将军的大名，对他也很尊敬，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大使馆在对待德国留学生的态度上，此后未见收敛，依旧针尖对麦芒。

曾任戴笠军统情报处主任秘书，后任蒋介石侍从的唐纵（1905—1981），1936年担任中国驻德使馆的副武官，上校军衔。他的《唐纵日记》对这一事件是这样记录的，可见黄琪翔领导的抗日救国会与大使馆武官署的斗争是相当的激烈：

1936年10月14日

黄琪翔所领导之抗日救国会，明日开会，邱清泉¹要我派人参加并制止之。同时，罗荣森电话，工商联合会派若干人出，分社干部也都参加。因此我电话邱清泉要他指定人来负责全权指挥，以免事权不一，步伐凌乱。

10月15日

下午八时到了，即赴 Sirgartenhauf（德文，希尔加藤霍夫酒吧名）酒吧间坐着喝啤酒，看着一个个的走进内面的会场中去。大约三十分钟，人到了四、五十人，已经宣布开会。我走进会场，主席是黄琪翔，记录是朱江户，被德国警察厅传去问话。会场中议论纷纷，有的发表激烈言论，有的提议援救，后来推举代表向警厅救援，同时赴大使馆请愿。我是很少参加这种会场，初来不免有些心里不自然。原来黄琪翔的被捕，是由武官署向警察厅交涉的结果，使馆也不知道。

10月16日

1 邱清泉（1902—1949），字雨庵。邱清泉于1933年11月升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少将处长。1934年7月前往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攻读。1935年10月完成工兵学校专业训练后进入德国陆军大学。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于陈官庄突围时被解放军击毙，时年47岁。1月19日，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因为昨晚黄琪翔被捕，抗日救国会派人向使馆请愿而致公开，决定今日在学生会重开会议。在二、三小时前，我们决定派人参加，争取抗日会的领导权，否则以武力制裁。忙了一天，总算以短时间之召集，能够集合四、五十人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因为有了雄厚的势力，在会场中占了一个优势。

10月17日

力余决事，不能事前考虑周到，所以没有一个坚定的意志和主张。抗日救国会开会的事，昨天他主张争取领导权，今天他又主张用武力制裁他们，甚至认为昨天达成的目的，完全属于失败的。我因为要维持主官的权威，心虽不赞成，也不发表言论。这里表示邱清泉的军人气概，他主张尊重力余的意见，如是又觉得强硬的压迫到底。如果黄琪翔他们不接受，便主张用武力解决。

10月18日

今天由我们在学生会召集抗日救国会扩大筹备会，黄琪翔他们没有到，由我们大会决定呈请大使馆解散黄琪翔他们的抗日救国会，并提出统一抗日战线来对抗他们的联合抗日战线。

10月19日

我对力余说，抗日救国会，如果用武力对抗，将来也许可以引起对使馆的误会，并且会引起武官署许多麻烦，晚上会议，他没有那样强硬的态度来对付抗日救国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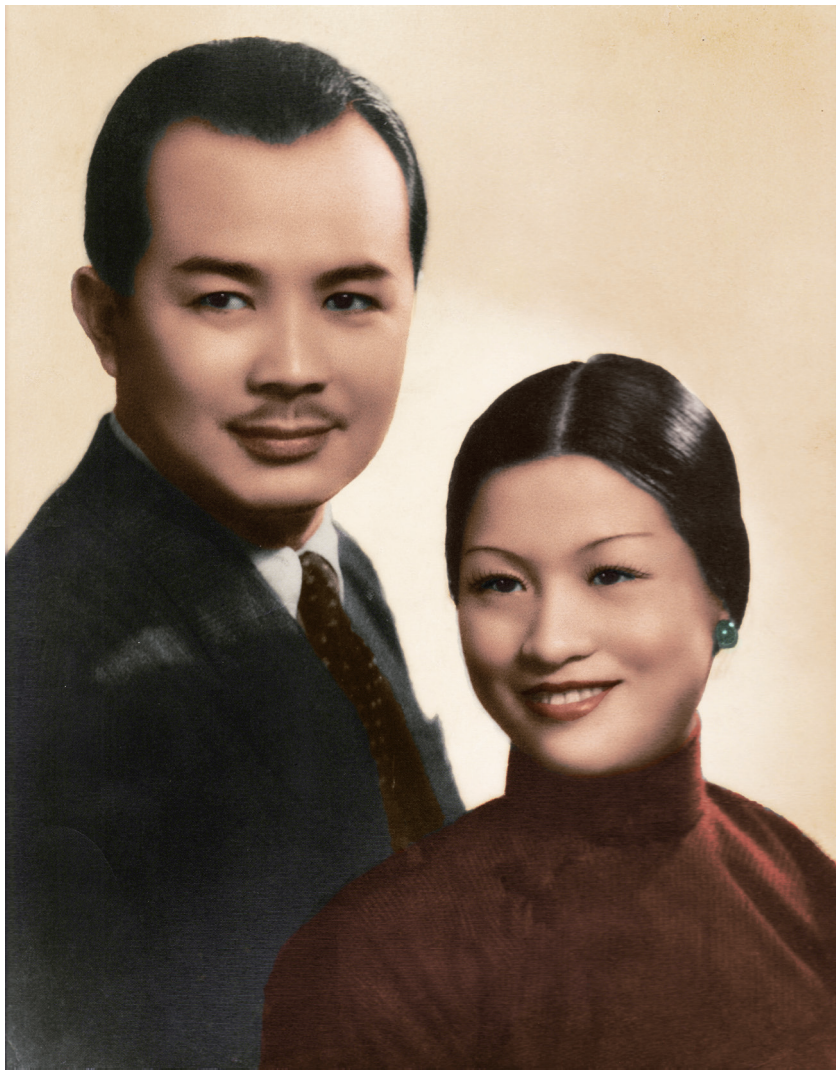
.....

12月1日

陈铭枢由法来德活动，大家决定要给他一个压迫，使他离开柏林，于是一方面发宣言，一方面准备势力驱逐。学生会的宣言简直不行，我重新写了一篇。荣森约我七时半就到那里去主持，准备势力去驱散他们欢迎陈铭枢的会

议，但我到九时才去。结果陈铭枢知道我们准备了对付他，没有来到会，而平安无事的过去了。

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大埔召开全国第二次干部会议，决定将“临委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等重要文件。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黄琪翔当时身在德国，未能参加这一重要会议，但他的同志们未曾忘记



1937年，黄琪翔夫妇回到上海后，拍摄了这张合影。

他，仍然推举他为“解委会”总书记。之后，黄琪翔回国参加抗战，因在军中任职，战事繁忙，“解委会”的领导工作实际上由章伯钧主持。

黄琪翔也从未忘却他的同志们。当“临委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黄琪翔已成家立业，在德国的开销不小，生活已是到了拮据的程度，可是他还是从自己的生活经费中挤出三千元，让郭秀仪汇给香港同仁，以表达对同志们的关心、信任和支持。

到了第二年的1936年10月，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找到了身在柏林的黄琪翔，交给他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这是陈诚将军发来的。陈诚电报的内容，是邀请黄琪翔回国效力抗战。言辞切切，态度诚恳。

黄琪翔回忆说：“我忽然接到陈诚给我一封电报，内容说：现在国共正在商谈合作，团结抗战，要我回国，参加抗战。我和陈诚多年不相往来，电报是突然的。但他以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为理由，要我回国，我觉得不好拒绝，于是我决心回国。”¹

黄琪翔此处所说的情况，恐怕并非是实情，而是有所避讳。

事实上，在1935年至1936年间，黄琪翔与陈诚有过多次通信，怎么能说“我和陈诚多年不相往来”呢？而且，黄琪翔此次返国的路费，也是陈诚从蒋介石那里要来的。陈诚邀请他返国参加抗战，给他往德国汇款在先，黄琪翔偕夫人返国在后，他怎么会感到“忽然”呢？这里似乎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作合理解释，那就是黄琪翔在写《我的自述》之际，身在文革的被迫害之中。避而不谈，显然是明智的。

1936年8月28日，蒋介石约陈诚来到峨眉山，住新开寺。陈诚将“剿匪”第一步计划，以及部队调动的部署电文呈送蒋介石，并请委座裁决成都分校事，此间还谈到了黄琪翔返国的旅费事。当天，陈诚给妻子谭祥的信中说：“委座答应先发（黄琪翔）

1 黄琪翔《我的自述》。

壹万元，分两期汇德。”¹

陈诚拍发给黄琪翔这封电报的时候，他已经是国民党的新晋上将，成为蒋介石掌管军政大权的重要心腹助手。

1 台湾“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5 年 7 月版《陈诚书信集》，p341。